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系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移居女性的情感與身體體現：

宜蘭另類農食網絡下的返土歸農

I-turn Female Farmers：

Emotion, Embodiment, and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 in Yilan

黃紫翎

ZihLing Huang

指導教授：周素卿博士

Advisor：Sue-Ching Jou, Ph.D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一月

Jan, 2023

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移居女性的情感與身體體現：

宜蘭另類農食網絡下的返土歸農

I-turn Female Farmers：

Emotion, Embodiment, and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 in Yilan

本論文係黃紫翎君（學號：D00228004）在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所完成之博士學位論文，於民國一〇九年七月十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周素德

（簽名）

（指導教授）

張明

王耀燦

宋邵玲

洪伯邑

謝辭



博士班的生涯是一場創業的旅程，從一開始入學時對於研究的探索，與各位師長同學的請益，以及進入研究田野時所碰到的每位受訪者，都是這趟旅程中重要的提攜者與啟發者。首先，我要謝謝指導教授周素卿老師，在寫作過程中給予直言不諱與寶貴的建議與督促，也十分感謝我的幾位口試委員與給予雪中送炭的老師（按照筆畫順序）：王驥懋老師，在我學位即將完成的最後一個學期，帶給我理論上的新視角，讓我論文方向逐漸清晰；宋郁玲老師，是我碩士班的指導教授，在我遙遙無期的博士學位中，給予我許多建設性與啟發性的建議與支持；洪伯邑老師，在我求學中開設的政治生態學與人文地理學地景研究讓我獲益良多；張聖琳老師，十分開放地讓我參與她的研究室與其學生的討論，讓我在研究的路途上結識了許多學界與業界在城鄉關係上貢獻良多的先行者；呂欣怡老師，在我論文投稿的關鍵階段，非常慈悲地給了我許多學術論文上重要的指導與開拓研究室野，讓我茅塞頓開，讓我抓到文章的理路，得以順利投稿完成；姜蘭虹教授，給我英文寫作上的鼓勵與溫暖；還有勞苦功高的台大寫作教學中心，給予持續的寫作建議。

回顧我的研究田野，從原先台灣中部的田野，串連至台灣東部、宜蘭，論文能夠堅持寫完，田野中遇到的每個人與受訪者，是我最大的激勵者與學習對象。如果不是因為你們踏實而堅毅的生活實踐，以及勇於堅持自己價值的膽識與常識，我想不會有這一本論文的出現。謝謝你們邀請我進入你們的人生冒險，讓我在有生之年可以見證、體會，甚至參與你們部分的逐夢人生。感謝每次換工時進入的菜園與水田，雪山山脈與地下水帶來生機無限的延續；也感動於宜蘭地區美味的農產品與發酵醃製的食物，你們串連了一大群人對於生命與自然的讚嘆；而最終要感謝的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願意接納後繼者跌跌撞撞的嘗試，已開放的心胸面對生活，願意在這挫折重重的城市與鄉土中，釀造出屬與自己的天地。這

本論文獻給這塊土地上為自己的理想而認真生活的人們，以及養育你們的水土，謝謝你們彼此的相互滋養。

最後要感謝的是我重要的朋友與支持者：淑珣、裕淇、怡紋、婷茜、良毓、Susi、芝瑩、Shiba，是我在生活中的好夥伴，陪伴我在情感、運動休閒的時光，讓我還像是正常人。最後要感謝爸媽，願意忍受單身女兒時時刻刻需要獨處跟旅行的需求。感謝大家！

中文摘要



在台灣當代的新農返土浪潮中，可以發現為數不少的農業移居社群，憑藉著在鄉村農業生活中感悟的生活，重新轉譯與反轉農業在鄉村作為糧食生產的價值，不僅在環境教育、環境倫理與永續生活上開發與賦予新的意涵，更讓人重新學習人與自然合作共處的可能。

除了農業的價值被創新開發，更有為數不少的都會女性，不同於以往的離農女性，反其道而行移居鄉村。但是在鄉村傳統異性戀結構下，女性通常在空間分工上受到傳統的規範，公共參與尚有少決策影響力。而當代多數鄉村的主流意見，仍以經濟開發的角度治理鄉村，未充分考慮到受高等教育的世代，已傾向後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移居女性來此如何安居就成為了從私領域到公領域的大哉問。

當女性移居者，透過移居鄉村生活，習得與自然共處並透過自耕自食滋養自我、甚至在鄉村與自然中自得其樂，結社共享、自處或養育下一代。「返土歸農」在以血緣為基礎的非都會生活中，更顯得社會變遷的特殊性。本研究在返土運動的政治經濟脈絡下，關注與「返土歸農」女性互動的鄉村社會，以及城鄉關係的轉變。本研究以「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作為研究途徑，透過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理解此返土實踐的動力。研究中發現，「返土歸農」女性與自然、返土社群的共處合作，在另類農食網絡的脈絡下透過積極參與環境、食安相關的社會倡議、農食教育，甚至是體制外的實驗教育，找回原先在都市生活中失去的健康福祉，並在公共領域上增加其影響力。

總體而言，受訪者透過關懷倫理的耕種方式與食材的挑選，多次表現出女性氣質。這種關懷是異質的，並非沒有矛盾。女性移居者跨越慣行農業與永續農業的光譜，表現出對社群、教育、環境和健康食品系統的關懷。女農民還將對於自然界的關懷與她們的性別或養育聯繫在一起。這樣的價值觀和實踐的這

種結合試圖聲稱，與男性主導，該方法以支配自然，將人按任務和固有的特質進行劃分，的方法不同。相反，女農民接受了人，更大的社區，農作物，動物之間的聯繫，以及環境，彌補農地流失造成的生態危害。



關鍵字：返土歸農、另類農食網絡、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關懷倫理、女性移居者、非人關係

英文摘要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motivations of the women of “back-to-the-land” migrants and sustainable smallholder farmers self-identified as “friendly farming” how they actively involved in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in Taiwan. Contemporary back-to-the-land women migrants in Yilan embody a wide spectrum of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complicating attempts to generalize their tendency for adopting farming and their later experiences in rural areas. Certain commonalities endure, notwithstanding, including a discomfort with city life and the hope of health, well-being and greater freedom in the countryside.

Drawing from interviews with “back-to-the-land” women migrants situated between a metropolitan and rural area of Taiwan, it argues that they learn to live with nature and nourish themselves by starting up their business with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Back-to-the-land" lifestyle in the rural based on blood relation, are more particular than urban life in Taiwan.

In this contex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ural society interacting with "back-to-the-land" women migra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The study uses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as a research approach, and understands the motivation of “back-to-the-land” movemen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Drawing from Foucault's ethics of self-care, these motivations express a liberatory transformation of self that is also radically responsible to others and expressive of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Feminist care ethics contributes to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by focusing upon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caring practice, and also revealing how self-care is ethically embodied and politically transformative in the case of "back-to-the-land" women migrants active in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in Taiwan.

Keywords: Back-to-the-land,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Self-care, Back-to-the-land women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i
圖目次	x
表目次	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意識	6
第二章文獻回顧	11
第一節 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	11
第二節 另類農食網絡與全球化	20
第三節 城鄉中的性別與移動/居	2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6
第一節 研究架構	36
第二節 研究方法	39
第四章 宜蘭地區的永續農業的社群與脈絡	50
第一節 自然與人文條件	50
第二節 另類農食網絡在台灣的發展脈絡	52
第三節 另類農食網絡社群組織在宜蘭	57
第四節 女性移居者在宜蘭歸土移民的類型	61
第五章 移動/居與性別：多層次的分析	63
第一節 移居推/拉力的類型	63

第二節 體現與感知：透過食物與鄉村療癒所需	67
第六章 另類農食網絡中的性別與永續生計	79
第一節 關懷/照護經濟與身體、情緒	79
第二節 性別氣質與勞動地景	85
第三節 移居中的社群參與合作	90
第三節 另類農食網絡的永續生計創建	93
第七章 結論：城鄉之間移動空間的串聯與分隔	98
第一節 疏離化的都市、親密性的鄉村：另類農食網絡中自我關懷的重新連結	98
第二節 鄉村異性戀父權秩序鬆動的契機？移動空間帶來的性別角力與挑戰	103
第三節 返土歸農中的女性政治生態學	106
參考文獻	108
附錄一：田野筆記之一	114
附錄二：紮跟理論分析的理論編碼取樣之一	118

圖目次

圖 1: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body model.....	19
圖 2: 研究架構示意圖	35
圖 3: 研究對象移居範圍	50

表目次

表格 1: 訪綱.....	39
表格 2: 訪談者資料.....	46
表格 3: 宜蘭友善耕作之個月耕種節奏.....	51
表格 4: 台灣另類農食網絡發展組織、相關政策與年代.....	54
表格 5: 推／拉影響因素.....	6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年代，也是同時承受現代性風險的年代，人流、物流、資金、文化等各種「流動」(mobility)與遷移(migration)透過全球化，帶入世界不同角落，也與當地傳統文化正面交鋒帶來改變。二戰後，政府以農養工的政策，使農業產值的大幅遞減，但也使工業產值大幅增長。台灣的經濟與產業轉型約始於 20 世紀 50 年代的冷戰時期。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從中國撤退到了台灣，並實施了土地改革，其中一個著名的改革是「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的實施，使台灣的農田從「集體所有的土地」或台灣「精英階層」轉移到「佃農」。這項土地改革，也意味著美國政府在冷戰時期在台灣推動的計劃：「自由人...是民主自由政府的天生支持者...」(Tsai, 2019; Walinsky & Ladejinsky, 1977)。大多數佃農在 1960 年代後成為擁有土地權的地主。

根據 Tsai (2019)的研究 *Farming Odd Kin in Patchy Anthropocenes* 這篇文章提到台灣土地制度的運作符合「以男性為中心的核心家庭農場」(nuclear-family farms)的小農制度(small farmer system)，但是當 1970 年代末大規模稻田機械化的推廣政策來臨，部分小規模經營稻田的家庭農場因未能轉型，逐漸在經濟規模上喪失了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台灣的企業家、尋租資本主義已經轉移至東南亞和中國，加上 1990 年代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潮流，國家將許多像是住房、醫療、教育的功能私有化，並轉移責任給家庭，成為社會安全網的一環。對於家庭農場來說，農地可以作為家庭向上流動的資本，增加家庭資本作為社會安全網的保障；到了 2000 年之後，農地的流失不可遏止。民選政府的政策開放農地買賣，使土地成為金融工具，許多地主出售農地以便支持他們子女的都市生活或創業 (Tsai, 2019)。

農地大幅流失的同時，台灣農業也開始走向多功能農業¹。而永續農業為多功能農業的其中一種，同時也是許多國家振興農業和提高農產品價值的一種方式。然而，台灣永續農業的發展因為土地制度與農業文化呈現了性別上的差異。表 1 顯示了永續農業發展的性別差異，尤其是女性在可持續農業中的種植面積比例高於男性；從 2005 年到 2015 年間，女性種植面積的比例一直比男性高 4-5%。雖然在過去的 15 年裡，男性的種植面積較女性大，但這是由於傳統的財產繼承中的性別差異所造成，土地大多由男性繼承。從 2005 年到 2015 年，可持續農業中女性種植面積持續增長的比例始終比男性高 4-5%。可持續農業勞動力的細微性別差異，成為了研究者探索返土歸農女性移民在另類農食網絡和移居鄉村地區的動機之一。

表格 1:永續農業中男性與女性的種植面積差異。(National Statistics, 2018).

	Male		Female	
	cultivated areas		cultivated areas	
	(Hectares)	The percentage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	(Hectares)	The rate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
2005	379,870	7.93	57,032	12.13
2010	3667,523	8.77	61,951	12.80
2015	391,780	10.07	766,29	14.13

在這個背景下，台灣戰後歷經急速都市化，大量人口由鄉村遷移到都市定居並尋找工作。大約在 2010 年後這樣的遷移出現轉折，都市地區人口開始減少，都市外圈人口多於都市中心 (劉克智 & 董安琪, 2003)。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觀察到有愈來愈多逃離都市的「島內移民潮」訴說著自己放棄都市職業搬到鄉村或山林，像是《女農討山誌》、《半農半 X 的生活》等等書寫。許多訊息教導著大眾如何找

¹ 多功能農業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或多功能性 (multifunctionality) 指的是除了糧食衣物生產之外，農業還可以生產不同的非商品產出，非商品產出包括如景觀、鄉村經濟活力、國內糧食質的安全、文化資產及生物多樣性的保存等(李承嘉, 廖麗敏, & 陳怡婷,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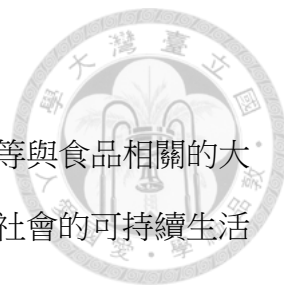


地、學習小規模生產蔬果或稻米、安頓經濟來源、評估自己的生活需求和時間安排，朝向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邁進。這樣移居者中，許多人選擇以實際勞動的方式與自然親近，以實踐友善自然的農耕與生活方式進入鄉村，其中有對自我健康的重視，以及對於飲食安全的堅持。從事農耕的同時，往往也堅持著至少無農藥、無化肥等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來栽種。

而近 10 年來更有因為種種不同原因出現的社團如：「倆佰甲」、「小村六戶」等等此類「生活風格社群²」的移民社群出現。在本研究終將這樣的遷往鄉村的移民，命名為「農食生活風格組合」。她們在生活上，親近土地與鄉村，並承租土地耕種水稻或蔬果，飲食上達到部分的自給自食，農作生產剩餘則透過網路、農夫市集或商店販賣；生計上可能結合自己的專業與農業生產達到生活平衡。在這樣看似結合專業與農業生活風格的移居生活中，當下的台灣鄉村社會，正接納著這一群帶著「理念」移居鄉村與務農的這群移居者。

相對都市而言，台灣鄉村仍是以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文化價值觀，構成生活中主要的運作邏輯。當這些島內移居女性搬遷到鄉村，為的可能是自己的健康、尋求更自由但是更為綠化的空間、或是孩童的飲食健康與教育。當這些帶著不同目的來此、具有高度能動性的女性。一方面，她們自都市而來，如何與鄉村中的農業、山川、農作物相處，並藉此修復與療癒，轉化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鄉村中傳統的性別分工的秩序，從土地、公領域的公共事務，到私領域的家庭運作，皆有其固有運作模式與權威，這些自然與社會資源也依賴著過去權威性的模式所運作。當這一些接受現代教育與專業訓練的女性，如何與這樣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協商與

² 生活風格社群：孫治本 (2004)cc 指出網際網路使用的普及，強化了「生活風格社群」的形成。使得原本四散各地、卻具有相同生活風格的認同者，得以跨越距離與國界的障礙，在虛擬空間中互動串聯，共享其生活風格，甚至是藉由網聚等形式將虛擬世界中的社群關係延伸到實體世界來。他認為，透過消費行動或嗜好認同所形成的生活風格社群，他們不只是單純的參與了消費，透過購買獲得商品，認同者自身與彼此之間的行動同時也是一種生產行為，他們對特定生活風格的喜愛與投入更創造了相關的文本、評論、或是進而生產同人誌的週邊商品，兼具了消費與生產的角色。這樣的研究主體，在近年來有許多關注在農耕社群、或是移民群體上。



共存，是本研究所關心的。

在人類歷史上，女性一直負責食品供應、關照甚至植物種植等與食品相關的大部分工作。在當代，他們展示了超越傳統農業和男性主導的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生活和經濟的社會和政治方面(Allen & Sachs, 2012; Liepins, 1995; Parker & Morrow, 2017; Sachs, Barbercheck, Braiser, Kiernan, & Terman, 2016; Shisler & Sbicca, 2019)。根據不同國家的永續農業調查，美國 22% 的有機農場由女性經營，加拿大三分之一的有機農場主是女性(Jarosz, 2011)。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社區花園或農田里為自己和社區種植農作物和蔬菜。通常，參與 AAFN 的人選擇從超市、農夫市場和當地商店獲取食物。然而，有些人搬到農村地區租用農地、實行可持續生活、接受可持續教育並支持當地的糧食政策；這些有時被稱為「返土歸農者」(back-to-the-lander)。自 1960 年代以來，返鄉移民一直是西方社會的一種趨勢，反映了不斷上升的移民和流動水平，挑戰了傳統的城鄉區別和農村觀念。21 世紀的性別關係，也在全球與城鄉互動中鬆動台灣傳統社會。

在華人的父系文化中，尤其是台灣鄉村地區，男性時常是家庭財產土地的主要繼承者，尤其兒子的角色更是一種父系傳承的象徵。正如 Whyte (2005)就曾指出，相對於中國，台灣在家庭價值觀上，更深刻地持續維持了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由傳統父系社會中為其設定好的角色扮演。農業勞動中充滿的刻板印象，使得女性務農者的務農能力可能受到質疑，而 A. M. Wilbur (2012)的研究中提到有農業性質的逆都市化移民者(西方文獻裡稱為 back-to-the-land)的經驗，與其說是返回土地，不如說是「返回家庭」(back-to-the-house)，點出了女性跟隨家庭返土歸農後，家庭成為她們主要的生活重心，從事家務的時間遠大於其他工作時間的現象。

在這種回歸土地(back-to-the-land)的趨勢中，女性回歸土地表現出共同的動機，例如出於健康原因或一般家庭消費而租用農田種植當地食物，保護耕地生態，以及渴望成為參與農村的農業活動。大多數女性移民搬到農村，希望過上更理想、更可持續的生活，並依靠她們的專業知識或才能來生活或養家糊口。然而，他們返回這

片土地的最重要原因是照顧自己和他人。研究者對參與者的觀察和深入的採訪表明，人文關懷環境的互動是社會塑造的，並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





第二節 研究問題意識

在臺灣城鄉發展的脈絡下，1980年代後社會快速進行財富積累，加上都市土地取得的高昂地價成本，許多鄉村多位處於都市周邊地區，交雜農業生活模式與都市服務機能需求的生活聚落區域交錯，反應的是受到全球化不同面向驅動力影響下的現代生活方式，一方面仰賴都市所提供的便利性；另一方面在生活型態、就業的選擇中，城鄉形成更為複雜的區域性網絡關係。鄉村的現實是人口流失嚴重，政府意識到需要盡力招攬新血進入鄉村。自2006年起，農委會「新農業運動」政策推出漂鳥、築巢與園丁計畫，號召青年歸農、中年歸農，吸引了不少都會上班族、科技新貴。

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本研究把研究對象放在「返土歸農」(Back-to-the-land)的女性移居者上，他們進入鄉村生活，從事農食有關的教育、養育、烹煮製作、生態教育與土地實踐上。並在關懷/照護倫理中，討論自我的關懷/照護，並與之延伸至生態、公共的關懷/照護轉變。「照料農作物、土壤、烹製食物」只是女性自我關懷的性別實踐嗎？從私領域的自我關懷/照護在自我、他人、公共事務之間，如何打破性別界線進入公領域是本研究關懷重點。

女性移居者不僅在教育、勞動、居住、遷移以及工作型態上與在地居民有所不同，在相較於以血緣為基礎的非都會生活，更顯得其社會變遷的不同動態發展。此處的「都市」成為女性移居的出發地，也成為她們離開的推力，促使她們在後工業現代化的社會中，渴望自然、渴望鄉居，期盼人際間的互惠交流、平等互動。

「女性移居者」的性別多樣性，在鄉村的脈絡中承擔了特殊的重要性，因為都市與鄉村區的流動、性別的互動等等，這些面向與以往傳統社會的預設有所差異。同時，遷移促使了的層級間流動，挑戰了鄉村性的傳統觀念、鄉村-都市的差別，以及鄉村的性別認同與關係。「移居女性」不一定是在異性戀規範下與男性組成家庭，她們跟「社群」、「學校/教育組織」、「合作社/社區大學/非營利組織」等等有非常密切的互動與心理支持。「移居女性」也並非如此單一與男性組成異性戀家庭，

更多的是「理念型」的移居者，包含了單身、離婚、分居女性；在性向上，除了異性戀外，也包含了 LGBT(各種同志群體的總稱)。與其說「返回家庭」，不如說是這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組成的社群」。

此外，當台灣社會在 1990 年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下，女性在教育與經濟能力上的改善，在居住遷徙上獲得更多自由、在工作協調中增加話語權，而當這些移居鄉村的女性(教育良好)面對鄉間的傳統文化時，她們如何在其中安居？鄉村的居民又如何適應這樣的變化，是本研究探討由都市移居鄉村的女性，了解其本身的能動性，及其城鄉遷移的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女性移居者」在鄉村的父系傳統異性戀結構與在地社群的階層性(hierarchical)，在現實上，「他們」在地方層級的公共參與上或許缺席，並少有決策與改變的權力。但是本研究中研究對象卻在鄉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與倡議團體、農食教育、體制外的另類教育、投入參選縣市議員，甚至積極參與政府推出的農業與農村創新的計畫項目，相較以往大有不同。

本研究稱呼這群人為女性「移居者」而非定居者。主因是她們不一定在鄉村擁有房地產，平時所租賃的土地，大多為世代傳承，自身難以擁有。身分如非當地人，這些年約 30-50 歲上下的移居女性，如購買每筆農地交易價格 500 萬以上的農地，如果不是工作數十年，難有積蓄可以擁有土地。除非與在地人結婚繼承土地，或是與婚姻中的夥伴共同出資，否則擁有房產與土地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在沒有契約租賃³的情況下，時常面對搬家、換租土地，甚至是離開也是多有所見。她們移居鄉間，但卻又在城鄉之間、國際之間積極移動與學習(各種自然農法、加工產品)的女性。在交織性的脈絡下，關注到與她們互動的台灣社會，以及城鄉關係的轉變。

在研究途徑上，本研究以「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為研究途徑，探討性別做為多元組成的主體，透過性取向、教育、年齡、社會資本，

³ 鄉村農地因為在台灣早期耕者有其田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地主擔憂土地被政府充公，因此不予租賃者明訂契約。導致承租者雖有耕作事實，但卻無法拿到農民保險的資格與身分，土地也常常因為地主的自由心證，時常在無預警的狀況下被通知不續租，讓移居者在耕作土地上的心血瞬間消失，這是全職與兼職耕作宜居者的風險。



體現和參與的關懷/照護實踐(care ethic)如何在女性主義生態學(FPE)的架構下，鬆動鄉村地區異性戀霸權中的性別結構和增加城鄉互動。本研究檢視女性歸農者在鄉村社會中，協商與適應異性戀規範給定的秩序安排與角色功能，與此同時交織在現代化的都市與網絡社群的相互聯繫。

研究者在此脈絡中探索了他們的情緒、身體、健康福祉與食物、土地和社區的關係。本研究重點關注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 (FPE) 和情感轉向中鄉村地區日常生活中的性別關係、多樣化的關懷／照護組合以及與食品相關的開創性經營模式。在研究人員的田野工作之後，作者聲稱這些女性的生活經歷、健康問題和社會參與的動機受到她們的性別、家庭、專業/教育背景和城市環境的影響。通過採訪和作者在宜蘭參加的工作交流和採訪，解釋了他們在回歸土地上的行動和生活經歷，作為實踐多元化關懷/照護倫理(care ethic)的表現。

首先，從遷移的角度來看，台灣鄉村社會充滿了異性戀規範秩序，不管在土地財產繼承，或是日常事務的性別分工，透過家父長繼承、神祇的象徵下井然有序地安排難以打破；由都市遷往鄉村的遷移行動，在女性遷移的意義上，並非主流的選擇。而現實上，傳統農業的文化上，家庭和男性農民的重要性與排他性，可能成為外來女性移居生活的阻礙。

縱使有許多不利因素，研究的移居女性仍嚮往鄉村生活，顯然在都市與現代化生活中，可能涉及情感、身體與健康等等因素，驅使他們離開都市。這時她們所投奔的「鄉村」在地方與空間，與傳統上先前述及的傳統父權脈絡不同了，雖然固有的因素存在，但是在情感、價值與文化上的意義已經不同。這與鄉村產業文化的轉型則不脫關係，會在本文中詳細分析。而事實上，不僅鄉村的特質改變，遷移鄉村的居民，在性別意識、生活方式、生計模式也與在地居民有很大的差異，鬆動了鄉村社會與都市之間的關係。因此，在研究上第一個具體發問為：「本研究在『返土歸農』的面向上，探討『返土歸農』的女性移居者，透過鄉村生活與生產，在移居前後在情感與身體上發生的變化」。



其次，「另類農食網路」則在移居的過程中，扮演了移居者與在地文化、土地與自然連結的重要中介，因為「返土歸農」女性移居者與土地/自然大多有其親密連結欲望，而租地農耕，則是他們自耕自食的入門方式。自 1990 年以來，「另類農食網路」的興起與西方狂牛症、食品風險，有相當大的關聯性，焦點關注在食物生產的永續、縮短的食物供應鏈或食物本身的「品質」問題，還包括食物生產與地方在生態、文化、政治上的連結，甚至是在生計上採用社群支持型農業的方式，生產者以「永續環境的土地經營者」自居，強調多方互惠的經營理念。但是同時，另類農食網路中餵養與照料特性，很容易成為固定的性別分工，使女性服膺於傳統農鄉中性別分工角色分派，因為這樣通常有跡可循、在歷史上已操作無數次。在這樣的特性下，透過農業文化的參與，重新連結自我與土地的過程中，女性移居者還能維持初衷，在非都市地區的農鄉裡達成身心的平衡與滿足嗎？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在台灣仍相當新興另類農食網絡中，看見端倪。並提出本研究的第二個發問：「探討在台灣現代化發展下，有都市經驗與高學歷女性移居鄉村後，藉著參與『另類農食網絡』，如何鬆動傳統農食之事及勞動上的性別權力關係。」

而在這樣自我修復與尋求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鄉村文化中的農作物栽培、自製、食用與分享，經由女性移居者的照顧與取用，擴散了相當的影響力，甚至與自我之外的社群產生了連結。女性自我角色在異性戀規範空間裡，因為身為外來者的緣故，她們的非性別期待角色展演，部分特質在其中得以接受與肯定。女性在城鄉之間、異性戀規範的選擇性不/參與策略，透過與自然、農事、食物製作、社群交往中，是如何影響在地的秩序與異性戀常規，是本研究的關懷課題。研究中的最後發問為：「在台灣「逆都市化」中的返土歸農裡，女性移居者與自然、食物、鄉村生活等，不同物質與空間的互動中，除了關懷自我、提升自我的幸福感之外；如何藉著另類食物網絡中的實踐與自我關懷，擴展至公共群體的關懷。」

本研究強調「女性務農者」在城鄉遷移過程中的能動性，並以身為女性與酷兒移民者或農夫的身分，如何影響鄉村的傳統規範，並在其中再生產的過程，進而與

原先離開的都市政治經濟秩序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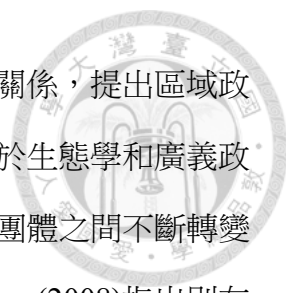


第二章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中以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切入，理解其討論內涵與相關範疇；主要回應生態女性主義的議題「女性是否在本質上與自然相似」，並討論女性關照工作(care job)與人類經濟活動的關係。筆者試圖釐清本研究中的性別角色與性別工作在女性主義里面的討論；並將地理學中「情感轉向」的研究取徑代入，以情感、身體經驗，深入性別農食研究，分析個體在面對生活壓力所致力於的健康福祉、異化勞動、生態災難、性別交織性中的調適。接者，以農業地理學中農食鏈(agri-food chain)的取徑，討論另類農食地理學中，永續農業、縮短的農食網絡、另類農食網絡(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AAFN)中地方創生與經濟地理學中的「性別缺失」。最後呼應另類農食網絡所帶來的社會生態學觀念，如何影響「返土歸農」(back-to-the-land) 的逆都市化發展。雖然 AAFN 被當作是地方創生的經濟工具，但是缺乏性別意識的處理與覺察，往往錯失返土歸農者帶來的社會動力與創造力。並由於缺乏政策反省，永續農業與另類農食網絡行程的產銷網絡，在鄉村規劃中往往淪為形式主義，而未考慮其中的性別張力與其帶來的創新與潛力。

第一節 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

本研究主要以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簡稱 FPE)作為分析架構，承襲自政治經濟生態學的分析框架。政治生態學為地理學中重要的研究領域。它的優勢在於能夠將注意力集中在當代的許多最重要問題上：貧困、社會正義、環境退化和生態保育的政治、自然的新自由主義化以及持續不斷的積累的資本、圈地和剝奪。政治生態學的概念越來越多元化，其目標包括「通過仔細分析不同尺度，檢視獲取和控制資源對環境健康和永續生計的影響，了解自然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並在「知識、權力和實踐」和「政治、正義和治理」的術語中，解釋「環



境衝突」。Blaikie and Brookfield(1987)以政治經濟論點分析人地關係，提出區域政治生態學(regional political ecology)，並將其定義為：「結合對於生態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之關注，包括社會與土地利用之間，以及社會中階級與團體之間不斷轉變的辯證」。目前為止，國內外的政治生態學仍受其影響。Rocheleau(2008)指出則在《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以及《Land Degradation and Society》這二本著作，建立政治生態學在政策上的關鍵特性，包括：

1. 多元的方法、目標、行動者與旁觀者：包括提出批判性的解釋、實際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檢驗並制定政策。
2. 整合權力關係和環境的社會、生物物理分析：綜合方法與整合分析。
3. 多尺度的分析：包括全球、國家、區域、地方、鄰里等尺度，及政策、實行、影響等層面。
4. 鄰里與地方層級的資料蒐集與實證觀察。
5. 結合結構與權益關係人的解釋鏈。

歸納「政治生態學」的文獻，則有以下內涵：重視生態學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結合；注重歷史脈絡與尺度的變化；使用多尺度與多元行動者的分析；並看中社會、政治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連結，包括相互作用的、對立的和辯證的關係。

2-1-1 源起

FPE 源自 1970 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在個人與政治的連結下，討論女性主義的感知與特質，討論人與非人、食物消費，以及肉身健康(corporeal wellbeing)中每日生活的親密場所。其理論架構出現在 1990 年代，主要是為了擴充政治生態學的內涵，將性別關係如何形塑權力與知識的批判包含在其中。1992 年在巴西里約的地球高峰會當中的女性行動議程 21，討論環境與發展議程中為了把焦點放在經濟、自然與永續生活，而出現新的倫理探討。在這本由 Rocheleau, Thomas-Slayter, and Wangari (2013)所合著的《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Global Issues and Local

Experience 》書裡，確認了將「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FPE) 做為一個理論領域和方法。

在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的取徑中，FPE 在多樣化發展的理論與延伸討論上提出了關於環境惡化、物種滅絕、工業滅絕與有毒污染等壓迫形式與自然支配之間關係的基本問題。女性主義者建立了基於關係、關懷、責任和友誼等概念的替代道德框架(Sundberg, 2017)。

FPE 在這個熱烈辯論和理論化的舞台中浮現出來。其中，生態女性主義、科學與知識論的批評，以及女性主義發展的批判，這三個分支組成了 FPE 的主要內涵，這三個分支的討論包含：

(1)生態女性主義：

探討女性在科學革命、資本主義、殖民主義中展現女性是如何在西方社會中與「自然」連結。這些研究中指出，女性由於長期受到父權體制之下的社會制度性安排與性別社會化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相較於男性，往往與自然的關聯性更為緊密。男性在父權體制下漸漸掌握生產工具與資本的積累，漸漸與自然遠離，女性則保有與自然的互動。即使是在後工業社會的「女性」，與自然的互動逐漸減少，但是卻透過扮演「生育」、「養育」與「撫育」的角色，對周遭環境的敏感度，比男性來說有較高的知覺。因此，這些關連性並非源自於女性的「本質」，而是隨著文化、社會變遷的影響而有所改變(Sundberg, 2017)。

(2)科學與知識論的批評。

Sandra Harding (1986)及 Donna D. Haraway (1991)與其他人評論父權的性別規範中把「什麼是知識？以及知識是如何生產的？」作為知識生產者的基本提問與出發點。展示了女性和其他邊緣化群體在傳統科學實踐中，如何系統性地處於弱勢的地位，這些實踐將他們排除在知識分子之外，又同時排除他們經歷或以低劣化代表他們的知識。這就如本研究中，在城鄉規劃、人口政策、產業發產、農業經濟藍圖下往往受到忽視的非婚姻狀態的女性。



女性主義者認為，歷史客觀性的主張掩蓋並保護了主導社會群體的部分觀點，其群體具體來說是異性戀、資產階級男性。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家在這些對話的基礎上研究實踐如何牽涉（再）生產和爭奪權力關係。

(3) 對於發展主義的批判

其關注在探討女性如何在規劃或保育計畫中遭受排除或剝削，女性主義的後殖民學者 Mohanty 揭露西方女性主義如何領導發展計畫，將第三世界女性同質性地描述為在西方社會的幫助下如同受害者，這種的描繪否認了女性位置(location)、經驗、知識的多樣性(Mohanty, Russo, & Torres, 1991)。例如 Carney (1992)揭露了土地使用上的性別差異、勞動義務、作物權在甘比亞上的關係連結。在國際捐助的灌溉系統與改善稻米生產的計畫中，只有「男性的國際捐助項目」，因而使婦女失去獲得土地的機會，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失去了收入。

在以上三個分支的討論外，Elmhirst (2015) 回顧了近年來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的田野以及打開新的議題與關注內涵中，將其分類成了四個相關的關注範疇：

- (1) 性別資源獲得與控制的分析反映了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的投入
- (2) 性別主體與權力的後結構理論
- (3) 物質女性主義理論周遭的人與非人關係
- (4) 圍繞在環境照顧的女性主義倫理，建議重新投入生態女性主義。

FPE 的研究，開始於這樣一個前提：「環境變化不是一個技術管理中立過程的順從，而是通過政治過程產生的，並且透過自然的代理本身產生。」 FPE 關注由複雜主體（性別、種族、階級）引起的各種形式的政治機制，包括學者，政策制定者，從業者和運動者。提供對這些政治機制進行細緻入微和反思性分析的工具，FPE 提供了一種超越政策方法的方法，方法通常與環境背景下的性別和發展相關聯，並加強那些失去權力的女性生態關懷。



2-1-2 「女性」工作與「關懷/照護」的討論

生態女性主義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女性看似對「自然」的了解和體驗，是基於在異性戀霸權規範中，女性在勞動層級的位置。而這個位置的規範與角色扮演，使男性擺脫了照顧家庭成員生活的性別責任。因此，女性關懷／照護與自然連結，有其性別結構上的因果關係。本研究則進一步，藉此檢視體現和參與的關懷實踐(care ethic)如何在女性主義生態學(FPE)的架構下，鬆動鄉村地區異性戀霸權中的性別結構和增加城鄉互動。

自 1980 年以來，關懷倫理的概念在生態女性主義與女性政治生態學中得到廣泛討論 (Gilligan, 1995)。許多研究不同意食物和性別研究中關懷/照護工作(care work)與女性氣質之間的聯繫。正如 Toronto (1993)提出的，關懷/照護不應被視為僅屬於女性的工作，除非其中的女性道德(women's morality)在傳統與意識形態的關聯性得以挑戰。以下則為相關討論：

在另類農食運動中，Jarosz (2011)認為關懷／照護倫理實踐推動了女性在 AAFN 中的動機，並且在社區經濟中至關重要。這些關懷／照護倫理實踐類似於 Gibson-Graham (2016)稱之為「社群經濟」(Community Economies, CE)，強調對人和環境的關心和培育，是挑戰商業資本主義倫理的一部分。藉由向社區和家庭提供食物，將農業作為一種關懷／照護實踐，在倫理上挑戰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及其作為「經濟的自然主導形式」的地位(Gibson-Graham, 2016)。Jarosz (2011)則關注女性農民如何在「社群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中實踐關懷／照護倫理並連接社會網絡，研究專註在於關懷／照護理中的「自我關懷」(self-care)，研究人員發現了女性在參與 AAFN 時滋養自己，以及她們的社區和環境。

在 Jarosz 的研究中，「自我關懷」(self-care)是解釋了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女性參與 AAFN 的重要觀點。我們可以發現 Jarosz 十分小心翼翼地使用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 (FPE) 和關懷倫理的關係，以避免「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t) 所主張

的「女性的工作大多跟自然的連結有關」。生態女性主義因此聲稱而遭受到猛烈批評，但她們想要表達的是由於社會結構而產生的這種聯繫關係(Gruen, 1992; King, 1989; New, 1996)很容易將與農食相關的工作（包括耕地、購買產品和提供膳食）與女性在 AAFN 中的角色聯繫起來(Gruen, 1992; King, 1989; New, 1996)。

Mellor (2006)作為一名生態女性主義學者，探討了經濟系統性別化中女性工作與經濟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表明，在男性主導的經濟體系中，對婦女的剝削與對自然的剝削之間存在實質性聯繫(Kuiper & Perkins, 2005; Perkins (Kuiper & Perkins, 2005; Perkins, 1997; Wember, 2018)。Mellor 解釋：「女性的任務是維持人類生存的運作，並維持他人健康和社群安全的基本工作。」如果女性的「照護任務」(care job)，包括育兒、家務、維持生計和社群活動成為有價經濟的工作場域，她們可能會拋棄女性的生活。女性主義經濟學認為，現代經濟環繞在有限的人類活動邊界，在這些人類活動中，和男性氣質是相互關聯的。Mellor 就「有價經濟」發表其特徵：「工作越被重視，它就變得越是男性主導。它越是必要和持續，它就越是女性主導。」在這個異性戀規範社會中，Mellor 斷言，對女性工作的分析及其在「有價經濟」(valued economy)中的邊緣化與自然世界的邊緣化(marginalization)有著實質性的聯繫。

縱然關懷倫理中的照護實踐(care practice)時常與女性主義生態學所述資本主義經濟與父權對自然的剝削交纏，就好比性別和食物之間的聯繫，很容易將關懷(caer)與女性氣質聯繫起來的關係本質化。但關懷倫理與其實踐在當代社會中有更特殊的責任，從 Jarosz (2011)到 Shisler and Sbicca (2019)以及 A. Wilbur (2014)，關懷/照護倫理被視為連接公共和私人領域的橋樑，這些研究討論了關懷倫理如何影響女性與社群的聯繫、公共領域以及後資本主義社群經濟的建設，以即強調關懷的目的在於促進關係性的連結，而非以生產或家庭等傳統規範為其目標。但其中的連接性、過程與關懷/照護倫理在實務上，仍難以脫離女性/陰性氣質與社會性別的局限，如何超脫自然與女性氣質緊密相依的過程，並從私人領域連接到公共領域，



在相關研究中少有解釋。

關於此侷限 Wember (2018)則提出其見解，「無論是通過關懷/照護倫理，還是通過正義倫理，都不能簡單將此政治進程概念化。」她認為，人們仍然陷入性別關係的二分法之中，無法克服對過度理性的排斥。她將 FPE 作為研究途徑，並擁抱「與麻煩同在」——此為哈洛威(Haraway) (2016) 所提出，探討親密關係與公共領域的相互交織。

Wember (2018)接著強調「食物」在體現性別經濟和女性主義政治生態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除了與人類生存和我們的化身息息相關的食物外，別無其他。她透露，在多倫多當地農業食品網絡的大多數女性中，食物、性別、關懷，甚至志願者文化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在她的研究中，性別和食物之間的聯繫被認為是難以澄清和解釋的。出於恐懼，她非常不願意複製性別概念，例如護理與女性氣質之間聯繫的自然化。考慮到大多數女性都參與了多倫多當地的食品網絡，許多人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 Wember (2018)發現女性的動機不僅關心他人，而且在農業中改變了他們。通過他們的新知識和身體體驗，他們感到強壯、有能力和挑戰，通常屬於男性。在她的研究中，受訪者表明這種情況與其他有機體、條件和學習社區合作。這些合作提供了一種「與非人類同居的工作和實驗方式，一方面放棄了支配自然的機械觀念，另一方面放棄了女性更接近自然的概念化。」它將農業闡明為打破傳統女性氣質理解的女性主義行為。通過農業和社區，這些體驗，如快樂、激情、創造和自我認同的感覺，為思想工作和身體工作之間的聯繫提供了空間。

在這項研究中，我的目的在於關注女性的不同性取向如何體現她們在公共與私人領域中的情感和身體。因此，我透過 FPE，檢視鄉村和都市地區的情感轉變(affect turn)來探索關懷/照護工作與陰性氣質之間的聯繫，分析其中情感、身體、關係與自然物質、文化、人際關係的交織。這個檢視也回應了 Gibson-Graham (2016) 後資本主義經濟中所提的社群經濟的建構過程，透過對人與環境的關懷/照護與培

育，使其建立連結城鄉的經濟與生活的型態。



2-1-3 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打破人類中心與異性戀常規的二元性

在「女性政治生態學」(FPE)中有更多「非人關係」(non-human relation)與「超越人類關係」(more-than-human relation)的探討，由於 FPE 對於資本主義、理性和父權主義主導研究方法的不滿，轉向環境主義的觀點出發(Harcourt & Bauhardt, 2018; van den Berg, 2018)。透過「女性新物質主義」與「後人類主義」的討論，Bauhardt (2013)強調「不再將異性戀生育的意識形態作為論述女性身體的基礎，並將人類從主導環境資源使用者的位置移開。」這樣的做法被 FPE 所採用，避免本質主義、挑戰異性戀中的權力關係，探索不同參與者之間的代理，同時考慮到性別、種族、階級、性取向、年齡和能力的差異；同時也超越二元論述，以打破人類/自然、男性/女性、北方/南方之間的主導的層級制度(hierarchies)。透過對「父權制」資本主義(patriarchal capitalism)的關注，打破自然和女性在剝削中的關係以及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並發展出酷兒生態(Queer ecology)，用以分析不同物種之間多變的關係。

而有助於打破人類中心主義的關鍵概念是「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正如在 D. J. Haraway (2013)的《當物種相遇》(When Species Meet)書中所提出的，我們事實上是身處於跨物種交織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中，而非現代性下的「大分裂」(Latour, 1991／余曉嵐等譯，2012)。大分裂讓我們容易排拒「他者」，Haraway 建議我們對於行動的思考應該由「我／物」走向「我們」；也就是，異質、多物種的「我們」正在不斷地「相遇」(encounter)，並在行動中「共同成為」(becoming with)當前所呈現的樣貌(D. J. Haraway, 2013), 2008)。Haraway 強調世俗、平凡、日常的相遇與「共同成為」，把我們的視野更進一步地延伸到塵世中共同生存的思考上。透過 Haraway，「我們更進一步地『回望／尊重』(respect)彼此，回望讓我們看清彼此之間的瑣碎綿密差異，並要求我們『回應』，『回應』(respond)，也同時

意味著擔負起對彼此生存責任的倫理要求。在這個脈絡下，不同性別傾向的「返土歸農女性」在宜蘭的鄉間相遇，她們不只和生物對話，也和遭遇在地居民、土地彼此相遇。

這就是 Haraway 所稱的「共同成為」，也就是「自然和文化交織在一起，並在內部積極地生產共同意義」。Haraway 的自然文化概念幫助我們超越了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和階級觀念。它讓我們了解人類如何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們利用自然，我們同時也是在直接利用我們自己，讓「自然」與人類的健康、福祉和未來互相連結、共同作用。

「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 的概念，意思是自然與文化並非兩種不同的東西，兩者之間的界線是互動與命名的結果，並非本質。Haraway 認為自然的意義除了由文化定義之外，也是特定歷史、物質與政治條件的交集可能結果，而文化的意義也脫離不了「自然化」的過程 (Latimer and Miele, 2013)。因此，許多的事物，用「自然-文化」來稱呼更為適合。

2-1-4 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健康福祉(bodily well-being)與身體政治生態

態

自 2001 年以來，農糧地理學和鄉村地理學的研究一直圍繞著物質(mater)或「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這種轉向也是性別、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研究的強大能量(Anderson & Smith, 2001; Sharp, 2009)。情感轉向是觀察身體、人類社會、自然資源和環境之間聯繫的批判性視角。Allison Hayes-Conroy and Hayes-Conroy (2015)斷言「身體政治生態學」(body political ecology)的重要性是「本能領域」(visceral realm)。後者是一個總稱，「身體體驗的領域是生活、感覺、感覺、發揮、休息、釋放、攝取、聯繫和變化。」在這個概念中，學者們一直致力於「本能領域」(visceral realm)包括對屬於「情感轉向」的情感、感覺或情緒的研究。它為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提

供了多種發展以身體為中心的分析手段，認真對待差異和權力。出於本研究的目的，我借用 Hayes-Conroy and Hayes-Conroy (2015)的「身體政治生態學」模型來關注替代農業食品網絡 (AAFN) 中的性別關係和不平等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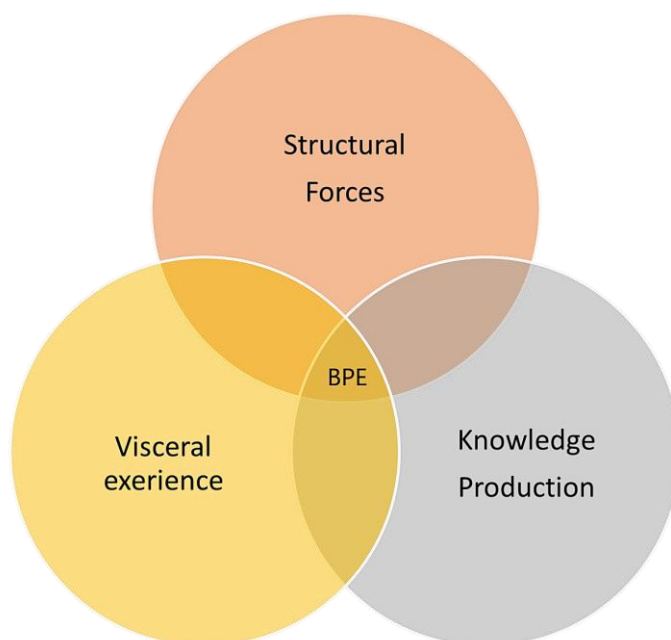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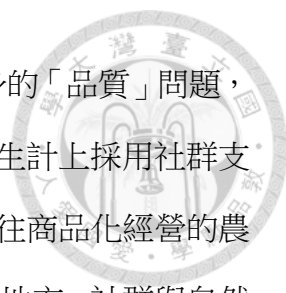


圖 1: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body model (Hayes-Conroy and Hayes-Conroy, 2015)

這個模型幫助我理解食物與身體的聯繫。它可以通過結構力、知識生產和對人類(以及超越人類的關係)理解身體健康和福祉的本能經驗，來分析人和環境的狀況(見圖 1)。通過將身體問題與政治生態學結合起來，作者理解了一切，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人體的健康和福祉上(health and well-being of human bodies)，以關注社會差異和不平等的身體和心理創傷。A Hayes-Conroy and Hayes-Conroy (2016)認為，社會差異的不均衡物質性(materiality)可以通過檢查身體來揭示 福利。本研究關注女性如何在城鄉流動和性別關係中創造知識生產。本能體驗(visceral experiences)和身體是我的研究關注。研究結果將是關於農業、非人關係(non-human relationships)和社區關懷倫理的情感和體現。

第二節 另類農食網絡與全球化

另類農食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AAFNs)在當今農食地理的討論中，



關注焦點不只是食物生產的永續、縮短的食物供應鏈或食物本身的「品質」問題，還包括食物生產與地方在生態、文化、政治上的連結，甚至是在生計上採用社群支持型農業的方式，生產者以「**永續環境的土地經營者**」，打破以往商品化經營的農業生產者角色，強調多方互惠的經營理念，將食物的生產鑲嵌在地方、社群與自然生態系統中，與都市消費者的食物認同及守護自然的元素做連結，把消費者當成是支持友善土地與自然的「股東」與支持者，透過小規模的生產模式，促使產消模式在主流大規模通路市場下的鬆動與變化。

Jarosz (2008)在相關的農食(agri-food)研究裡將另類農食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AAFNs)分為了兩個面向： 1.全球化食物體系(global food system)，以大規模機械種植、長距離的供給鏈、農企業為特色。2.另類食物網絡(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FNs)代表了區域或地方食物系統，是對於全球食物系統的回應，食物重新在地化的歷程。在 1990 年晚期的地理學 議題的討論中，關注於食物的選擇除了慣行農法的作物外，在生產空間、交易中介數與個人互動上出現另一種選擇(alternative)的趨勢(Watts, Ilbery, & Maye, 2005)，「地方」(place)在農糧生產的重要性提高，並衍生出：慢食、另類食物的地方創新、食物集區 (foodshed)、社群的食物安全、公民與民主農業、後生產主義、縮短的食物鏈、品質的轉向等概念。由生產主義轉向後生產主義思維模式，將環境倫理與環境正義、多樣化的農田景觀、優質作物等融入產銷營運中。而 Jarosz (2008)則將 AFNs 歸納為具有：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食物購買與地方的連結、承諾食物在社會、經濟、環境面向的永續生產、銷售與消費等四個特質。此外，AAFNs 所關注的是創新的社會網絡與產業連結，融合成員與網絡中；在社會生產與環境資本裡，生態、網絡與產業平衡的長久經營，強調生產與加工分配的創新，以及當中的經濟價值，與多元化的發展(Murdoch, 2000)。

本研究中，在 Wilbur(2012)的論文中，指出義大利返土歸農者(back-to-the-lander)需要依賴另類食物網絡(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AAFNs)維持生計，而 AAFNs



強調的是過往生產者與消費者間更緊密的連結或是「面對面」的交易型態，像是：農夫市集、食物雜貨店、有機訂購計畫、非現金的實物交換，以及社群支持農業等（Murdoch et al., 2000; DuPuis & Goodman, 2005; Marsden & Sonnino, 2006; Feagan 2007; Kneafsey et al., 2008）。除了維繫生計的意義外，AAFNs 往往也帶有社會正義實踐的意味，如公平貿易、環境永續、地方主義等等。檢視本研究的受訪者，他們維持生計的方式有許多種，其中的確包含以上型態，但是也並非絕對，或一定帶有社會正義的意涵。Watts et al. (2005)提醒我們另類農食網絡還是有服膺市場經濟邏輯的現實與必要性，並非如上述如此美好。AAFNs 重新定位「生產」在市場經濟中所包含的要素，透過公共健康、環境關注、及農場-動物福利等等提出消費者對於「食物」新的需求及限制而增加市場競爭力。

2-1 都市化與城鄉關係重構

在另類食物網絡在政治經濟的脈絡中，Jarosz (2008)認為都市化與鄉村重構對於另類食物網絡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由於都市化和鄉村重構的相互作用，使得「另類農食網絡」(AAFNs)被都市主導，導致發展不均。以美國西雅圖為例，另類農食網絡不一定支持所有的農民都在參與在網絡當中。都市化的成長創造了季節性、在地食物的需求增加的時候，小規模農場可能會發現他們的勞動時間反而增加許多。而由於農作物生產的永續性特質，使得食物價格提高，因此某些方面的都市縉紳化與人口的增加，反而成為了城鄉交界處農夫們的「救世主」(Jarosz, 2008)，產品主要提供給都市消費者，生產作物有偏向市場需求的傾向。

台灣另類食物網絡的發展最初可溯及至 1992 年開始成立的「主婦聯盟共同購買」為代表，推動綠色消費理念，與無毒、在地食物等等這些概念結合。在相關的銷售網絡上，自 2004 年「白米炸彈客」事件以及許多出現在社會新聞版面上的黑心食品之後，這種具有關懷社會、文化、傳統價值意涵的在地食物網絡漸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網路上的產銷平台包括了：921 地震後成立的溪底遙、年的旗美



農夫市集、台中合樸農學市集、中興大學有機農夫市集屏東環境保護聯盟&綠農的家、大王菜鋪子、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等等，而相關的農夫市集如：旗美農民市集、合樸農學市集、微風農民市集、248 農學市集、大宅院友善市集、竹蜻蜓綠市集；以及實體的社區協力型農場如：穀東俱樂部、夏耘自然生活農莊、幸福農莊等等不勝枚舉的農場，從台灣的土地上不斷冒出。等等開始，慢慢地發展出更多的銷售平台，例如花蓮的大王菜鋪子，友善土地農場方面，也發展出社區支持型農業，有許多消費者成為股東、會員、member 等等。所謂的另類食物網絡的相關平台的存在研究論文中，有關另類食物的討論中，包括梁炳琨 (2008)論述農業食物在地化、鑲嵌的討論，廖哲強，蕭崑杉 (2010)分析另類食物網絡與地方的互動關係；農夫市集的論文大多則以合樸農學市集(4 篇)、中興大學有機農夫市集(3 篇)、248 農民市集(2 篇)等等為主。

這個時期的討論，大多是將農夫市集、驗證團體、推動有機食物的非營利者，視為中介團體，促進與形塑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構通橋樑與理解，並扮演者教育者與理念推廣者的角色。在葉虹靈 (2007)、黃紫翎 (2010)、賴鳳霽 (2011)、徐于婷 (2011)、與邱元儂 (2013)等的研究中，多討論另類經濟裡食物產銷網絡中行動者與非人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形塑出永續、在地食物消費的生活策略與實踐，強調於生產鏈縮短所帶來的社群認同與在地食物生產文化的價值。除了增加消費者的認同、也讓生產者增加對於永續農業這套價值觀，以及生產、生態、生活的信心。這樣的消費場域論述與營造下，產生了人們在味覺、健康、食物風味的「身體認同」，以及非金錢交易的「愉悅滿足實踐」，透過食物的社交活動，像是協助擺攤買賣、換工、產地拜訪等等行為，交換生活經驗，也提高對於土壤、動植物的知識與熟悉度，增加上述的「身體認同」。可以從中發現，這些社群在鄉村、農作物產地所感受到的是農作環境的風土條件、在地知識所帶來的新的體驗，與過往鄉村在地居民的生活經驗與傳統價值大有不同。

上述有關於研究中，討論焦點較多著重在生產端與消費端的討論、社會網絡

的在地鑲嵌與形塑，對於身體經驗、愉悅滿足的生產方式與社交活動著墨不多。另類食物網絡如何以情感性與身體經驗，連結的城市與鄉村(生產地)是另類經濟得以運作的原因之一，但卻在一個時常淪為附帶的配角；而新農夫與新移居者，如何消費者成為生產者、甚至遷移者的生命轉換較少成為研究焦點。

2-3 另類農食網絡中關懷/照護與性別分工

有關於另類食物網絡中**勞動力的性別**討論中，焦點包含了永續食物生產、農場的組成，以及消費面的食物供應與照護工作。農夫投入小規模的另類食物生產，透過作物輪作、種植多樣性古物，建立有機的覆蓋作物與堆肥，投資更多的時間在維護土壤的健康。由於這項工作大部分是無償的，這種無償性質所增加的勞動力要求對替代生產方法的財政可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構成障礙。

2-3-1 關懷/照護工作

在另類農食網絡(AAFNs)的永續生計中，「關懷/照護工作」(care work)的類型對於 AAFNs 的生存與經濟功能來說是重要的，但因為無法估量其價值，被排除在市場交易中。另類農夫所販賣的產品通常無法賺取生存所需，因為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健康的土壤、健康的動物，或是減少對石化資材的依賴，在市場裡沒有交換價值。在許多有機農業勞動實踐的文獻中，依賴太過狹窄的勞動定義，因為永續農夫的工作在市場上並非是有報酬的。Jansen (2000)的觀點建立在女性主義學者 Jochimsen Jochimsen and Knobloch (1997)所提出的：「有關女性維護與關懷/照護的活動，這些維護或是關懷/照護的活動沒有金錢交易，像是生態服務的提供，或是家與家庭的維護。」

先前的研究顯示，在 AAFNs 中由於女性對於食物供應的關懷/照護工作自認有所責任，並更進一步地，在食物供應上，女性的投入更為勞力密集(Cairns et al.,



2010, 2013; SomCastellano 2016)。所有的活動加上準備食物的體力、心智與情緒勞動。研究者發現，關懷/照護工作的實務準備體力勞動更多於女性投入 AAFNs，尤其是以在地食物系統為主的 AFN。Bruce and Castellano (2017)指出食物供應的情緒勞動可以擴充到 AFN 的投入。AFN 可以增加投入 AAFNs 的女性身上，包括強調家庭成員的關懷/照護工作，也包含了環境、勞工、小型生產者及更多的照顧(Little et al., 2009; Som Castellano, 2017)。

然而，相關研究發現低經濟收入的女性在投入 AAFNs 時，可能會拉長時間參與(Johnston & Baker, 2005)。此外，她們在關懷/照護的工作上更為費力，在克服尤其是經濟與地理上的障礙，會增加體力勞動。Bruce and Castellano (2016)對於低社經收入女性勞動力大量的投入，提出了另一種看法。AAFNs 中投入的食物準備可以視為「第三輪班」(a third shift)，這是再生產的工作，女人在家庭投入額外的生產工作，這是女性的一種展演。這也是一種雙重負擔(double burden)不只是維護家庭的物質供應，還有提供其他社群的安定與情感支持。在 AAFNs 裡參與從各種不同的通路採購、認識農夫市集，園藝、堆肥，以及食物政策會議，社群組織，或是更多志願性團體動員(Deutsch, 2011)。這種勞動是源自於家庭的照料，但勞動也是源自於在地社群的關懷/照護，以及環境，女性超越了便利與經濟因素，投入環境與社群的照顧，這種照顧稱為「第三輪班」(a third shift)，投入第三輪班的勞動，可以影響地方與社區的福利。

在此論述中，肯定了第三輪班對環境與在地社群的照顧，但是在女性從家庭轉往在地社群貢獻的過程中，相關研究看不到轉換中的付出、衝突等等的討論，這是本研究值得探究之處。

最後，糧食安全與食農教育的推廣，在台灣 AAFNs 的脈絡中十分重要，其中的健康、營養、安全、教育面向，在政治生態學裡的新物質女性主義多有討論，尤其是關注「內在互動」(intra-actions)、內部物質、論述、人類、more-than human，corporeal 與技術的現象，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著手於更基進的，描述人-自然的權



力關係，尋找關於非人或是更多人類-自然當中人類的主宰關係。這方面就牽涉到了台灣發展 AAFNs 中，透過健康論述、生態教育等等傳播與說服更多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參與，分析與**食物**有關的新陳代謝流動、新自由主義全球食物系統、生產與消費實踐、以及性別化身體的討論。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進入關係的本體論，嚴肅以對情緒、感情、食物的面向以及進食的重要性，對於性別的分析有相當大的幫助。

2-3-2 分工與自我認同

在有關永續農業的勞動力與自我認同上， Allen and Sachs (1993)強調要求將父權、種族、階級剝削消除。這些剝削力量的維持系統，在非永續食物與農業系統為根基的情況下，強化複雜的社會關係。這些處境包括了女性的邊緣化來自於知識交換與決策角色，及農場工人的剝削等等。在真實的永續農業中，必須說明這些處境，而非將焦點關注在食物系統的擴張。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於勞工的主張在於，工作階級的剝削來自於商品鏈中榨取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是與自用價值相對的概念，指勞動者創造的價值超過自身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價值。在社會組織化中，勞工這個角色是勞工階級抵制資產階級，並且需要更多生產的社會型態。這個安排的預設的角色是工人不擁有產品的製造工具，工人受到它者，階級、資本所剝削。但是農業勞工在「家庭農場」的脈絡下，家庭農場擁有生產工具，卻大量自我剝削的狀況。

「家庭農場」是農業生產中其中一種的理想化型態，因為它的意圖是保留鄉村社區的價值，公民的美德和企業精神。然而，這種趨勢卻掩蓋了一個對女性有剝削歷史以及僱用移工的制度。女性的勞動在「家庭農場」幾乎總是隱型，並且透過女性和陽剛氣概的意識形態來服務，使女性成為「幫手」而非和男人一樣成為「農夫」。(WHATMORE, 1991)認為，「性別分工」是在農場產生的父權關係。更重要的是，「性別作為農民更廣泛的國內政治經濟中的基本結構化過程」。家庭內部和家庭之間的社會關係，特別是父權關係家庭，以及家庭農場的農場生產和再生產的活動決

定家庭農場，商品生產的過程，「這個性別制度在商品化過程中被資本剝削和改造。」這種對於性別認同和分工的規範懲罰了女性，將其認定為助手，而非農夫，透過這種邊緣化進程，他們被剝奪了獲取關鍵資訊來源和支持的機會。最近的跨學科研究表明，女性通過參與永續農業的主人/經營者比傳統農業更大程度地參與對這些父權意識形態的抵制。

有關勞動力的研究上，目前的研究發現女性投入在永續農業的勞力上大大增加，在永續農業中 Trauger (2004)發現女性農業經營者似乎更投入於永續農業之中，因為在永續農業中做為一個農夫的認同受到支持與確認。女性在永續農業中接手非傳統的生產者角色，對於工作與決策扮演著首要的責任，連結著企業發展、管理、資源分配、農作物生產、產品行銷、以及新附加價值的生意。Hambleton Hambleton (2008) 女性對於土地資源如何使用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他們更傾向為特殊試驗、個人實現來生產，並投入更多體力勞動而非更多投資在大農機裡。他們所生產的產品更為個人化與顯著連結環境，如農夫市集、他們的銷售策略是認識更多消費者。如文獻所建議的，研究者有時在永續性的原則上使用女性意識型態的信念，解釋農業中女性參與的成長；有時候爭論女性作為一個團體，有意識地驅動永續農業，而非因為經濟機會或其他結構因素參與永續農業(Pilgeram & Amos, 2015)。根據美國有機耕作基金會統計，在 Jarosz (2011)的研究中，2002 年，美國女性涵蓋了 22% 的有機耕作。而 2001 年加拿大的有機農夫則有 1/3 是女性，為數眾多的女性投入北美洲、歐洲、澳洲、紐西蘭等等的有機耕作。另類(alternative)農業作為一套實踐的方法與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允許了較少的競爭，與較少的個人意識形態，出現了全球生態意識的成長(Barlett & Conger, 2004)。男性與女性農夫同時間在另類農業的認同中有相似的價值，如獨立、自給自足、對小規模農場的承諾、以環境與社會承諾的方式提供在地社群。

Liepins (1995)在澳洲與紐西蘭的性別農耕與農業政治中，女性在農業中建



構她自己成為企業女人、農夫、夥伴，強調自然資源的管理以及傳達在育兒與照料上的主體性。更多的研究集中在西歐與美國詢問女農的整體概念，並且開始解開女性在個人傳記與農場規模中在另類農業上的多樣性 (Pedersen & Kjærgård, 2004)。

Liepins (1998)發現，女性出現的新群體中對這些意識形態「關於農業，鄉村永續性和政治上的替代觀念行動」有其行動。例如：愛荷華州的女性、食物和農業網絡，是愛荷華州一個新興女性農夫社群，由運動者、教育家和學者組織所組成。組織地目的是「在食物系統中，永續社區和環境誠信問題上聯繫並擴大女性聲音」。這個群體是因為女性在主流農業機構遭受的系統性忽視而成立，主要致力於組織，教育和改變食品體系，保護環境和保持農業的未來。組織建立生產者之間的聯繫消費者。對於涉及食物和農業問題的愛荷華女性而言，這種行動主義的公共空間已經成為賦予權力，組織和社會變革的重要空間。Hassanein (1999)在威斯康辛州永續農業社區的研究中引用網絡作為框架，促進有關生產實踐的知識交流，促進婦女的社會變革。她的研究中發現網絡模式特別有用，因為「女性表現出自己作為成功農民的能力，從而通過緩慢的文化轉型顛覆了對農業中女性角色的看法。」



第三節 城鄉中的性別與移動/居

在有關性別、遷移、流動性的課題上，鄉村的外來移民，包含了全球北方的「逆都市化」(Conterurbanization)、生活型態移民以及新來者與退休者的匯集。這些逆都市化的現象大部分是與主要城市相近的鄉村，以及中產階級家庭到鄉村的移動，為了尋找更佳品質的生活。這些貢獻經濟發展新居民的出現，在鄉村社會中已經出現了對於原居民無法負荷的住房，危及鄉村文化與生活型態，而逆都市化的現象也影響了鄉村地景的保育。

在這個課題上與認為移動/居與性別，在鄉村的脈絡中承擔了特殊的重要性，因為都市與鄉村的流動、不同性別、性向人群的互動，與以往傳統社會所預設的性別角色(異性戀、家庭)與關係上有所差異。B. Bock (2017)提到「傳統社會中，鄉村性與陰性特質(femininity)連結了固定性(immobility)，或是移動受限(mobility constraints)的性質。遷移增加的層級與流動，挑戰了鄉村性的傳統觀念、鄉村-都市的差別，以及鄉村的性別認同與關係。」這樣的變化，

B. Bock (2017)提出流動在城鄉之間幾個重要性：

(1)在日常移動中，涉及鄉村居民的需求與機會，由於 1990 年代後期，歐美國家政府公共預算的縮減，導致公共運輸的減少，影響了居民的移動。

(2)流動涉及年輕和良好教育居民的向外移動/居。這樣的現象引發了農村邊緣化和衰退的惡性循環。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主題。但是在本研究中，移出跟移入的現象是同時發生的，在人力外流的普遍現象下，這些移入者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為何，是值得探究的面向。

(3) 鄉村的外來移民。

在以上的幾點中，本研究著重的是移動/居的女性，她們可能並非出生原居地，甚至也可能是在外地工作、受教育、未/已婚而回到鄉村。在西方脈絡的探討中，外來移民是全球北方的逆都市化(counter-unbanization)、生活型態移民、返土者

(Back-to-the-lander)以及新來者與退休者的匯集。在逆都市化(counter-unbanization)的研究中，包含了返土 (back-to-the-land)的類型，此類型中的自給自足，與土地連結的精神，與本研究的移居女性最為相似，故以下討論此現象的發展與精神。

1960-70 年代的返土運動(back-to-the-land)，與北半球「反主流文化」的興起有關，這個運動反對當時的戰爭與政治氛圍，透過「脫離主流社會」的方式來表達政治主張。返土者往往有著與土地及「自然」更密切（重新）連結的渴望 (Keith Halfacree, 2007a)。所著時間點演進，Halfacree Keith Halfacree (2006) (2006) 則對 21 世紀的返土運動提出不同上世紀的定義：返土運動是依採納「鄉村」生計 (rural livelihoods) 而定的，並且須以基進的方式和土地的產生「共質性」(consubstantiality) 的關係。也就是說，返土歸農須符合 Fairlie (2001) 對鄉村定義的描述「以土地為根基...鄉村經濟...的基礎是在土地以及其產出—動物、蔬菜、礦物」，以及 Gray (1998) 所描述的「共質性」(consubstantiality) 「人類和地方的空間關係，因獨特的存在方式，於是兩者的形式彼此參與在一起，或成為共同形成的某共同實質」。而以基進的方式來達成與土地的共質性，是要達到每日生活和土地之間彼此相互構成。返土運動者往往會訴諸「自給自足」(Holloway & Halfacree, 2005)、在家教育、「低衝擊建築設計」(Fairlie, 1996)、「樸門農業」(Schwarz & Schwarz, 1998)、在地另類的景致(local alternative scene)，以及更為廣泛的連結，這些方式訴求的事更加投入與土地、周邊社群關係之間的聯繫，達成鄉村生計與土地的共質性。

相關的返土歸農類型中，Jacobs (1969)整理了歸土運動中七種參與的類型，裡面包括：

- (1) 週末農夫(Weekenders)，在農場以外的地方從事全職工作，但只要是空閒時間(週末、清晨和晚上)，就會在他們所屬的土地上進行農活。可能種些蔬菜、水果，或是穀物。台灣鄉間不少務農型態也多偏向此種，大多是父親留下的田地，為了維持農地的運作，而維持了與父輩相似的運作模式。

- 
- (2) 退休人士(Pensioners)，主要是由退休金、社會保險等等的中高齡人士，經濟充裕，可以到回到鄉村裡頤養天年。
- (3) 羅曼蒂克的緬懷鄉村者(Country Romantics)，大多從事兼職或季節性的工作，然後將剩餘的時間花鄉村裡的在工作和休閒上。台灣現階段也不乏這樣多工兼職的人，我們暫且可以將他們稱呼為「半農半 X」的生活追尋者。
- (4) 鄉村企業家(Country Entrepreneurs)，他們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大多來自不直接涉及農業的小型企業（例如櫥櫃製造、水電焊接、裝潢業者等等）。
- (5) 純粹的返土者(Purists)，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私有土地上，種植經濟作物獲得足夠的現金收入，在市場經濟中生存；或者，依靠自己財產資源與鄰居之間的以物易物關係而生存。
- (6) 微型農業生產者(microfarmers)，他們大多進行小規模、高價值、可持續發展的農業型態。通常在城市或郊區進行。他們的工作時間運用在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上，進行精耕細作。通常是具有較高市場價值的水果和蔬菜，像是蘑菇、鮮花等等。
- (7) 返土歸農的實習生(apprentices)，在其他人的農場上學習歸園田居的生活技藝，並在未來規劃移居鄉村。

以上七種類型，是歐美歸土運動發展至今，出現的多元類型。我們可以看到行動者的行動並非一致，可能是階段性的，也可能是連續性的學習狀態。這些類型在台灣目前的返土歸農者身上，多數皆有相似之處，這裡列出參考。

在當前的歐美的城鄉研究當中，歐美社會的都會人口，移往鄉村地區所發生的社會經濟重構至今至少已持續了 30 餘年，但當時的遷移，與本研究所涉及的移動/居已是大不相同，切確來說是不同於 1960／70 年代歐美社會的返土歸農。二十一世紀返土運動，反而是「**移動年代**」(an era of mobilities) 的概念(K. J. P. Halfacree, space & place, 2012)。這個概念由 Keith Halfacree (2006)提出，遷移相較於過去，已經發生本質性的改變，移動/居並非要拒絕傳統社會，將自己與主流社

會隔絕，而是強調藉由深入參與土地與農作，來實踐基進的理想，他們沒有想要拒絕傳統社會，特別不會把自己孤立於其他對土地有興趣的人們，只是「不妥協」其他和自己理念不同的人的認同（Halfacree, 2006）。以上的觀點，在本研究有許多採取相同態度的受訪者，因此在本研究中，把這群移居者命名為「返土歸農者」

但是也不可否認，有些移居者，在心理上的確有抱懷著這樣的與世隔離或是逃離的心態，進入鄉村，建立與世隔絕或是與少數人來往的生活。這個現象以單身者為多數，但是如果已經擁有小孩，則為了養家活口，則必須與更多社群團體產生連結，才能發展出足夠的生計養家活口。

K. J. P. Halfacree, *space and place* (2012)根據 Sheller and Urry (2016)「新移動典範」(new mobilities Paradigm)裡提出「移動年代」(an era of mobilities)的概念，提供了本研究對於二十一世紀以後，由都市到鄉村移動/居的新視角。在原有「定居生活主義」(sedentarism)解釋中，其意義是與自我照顧，以及健康相關的地定居，其主張人類生活存在著界線和本真性(boundedness and authenticity)。但是「新移動典範」的提出，挑戰了定居狀態，把關注放在那些不同尺度上的「移動」或在過往研究中，受到忽略瑣碎化的型態(Sheller & Urry, 2016)。

「移動年代」(an era of mobilities)的出現(Keith Halfacree, 2012)，宣告了移動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家常便飯。在交通運輸系統與交通工具普及、便利的支援運輸系統（如：網際網路與大眾運輸系統）之下，驅使二十一世紀的人們在不同尺度的地理範圍內移動，進入移動與地方再定位的時代，過去「移動/居」行動中涵蓋的定居主義之傳統價值觀就受到了挑戰。本研究以這樣的狀態，描述為移動/居女性的處境，既非永遠定居在鄉村的居民，也非短暫觀光旅行的遊客，她們由網際網路、工作坊、課程參與、支持社群支持農業、學齡兒童的教育需求、社會氣氛等等因素，而成為暫/定居的人，鄉村的家也並非唯一的家，返土移居女性的高度移動性，可

能使她們有許多棲居之所，並且未與都市產生斷裂的逆都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遷移。

以上所提及的型態樣貌，是本研究移居女性中，相當重要的共同特質，不管是自給自足的種植田園、低生態干擾的資材的使用等，他們與鄉村的關係，也與其他在城鄉間通勤、休閒觀光，或是退休和別居（second home）的鄉村移民（反都市化移民）有所不同。雖然農業不一定是他們的主要生計來源，但是都至少會跟在地地主租田耕作，以永續農業中的各種農法種植蔬菜與稻米，食用當地種植的稻米與食材。A. M. Wilbur (2012)提到返土歸農者(back-to-the-landers)這個移民群體的基本特色是移到鄉村的移民，接受以永續農業種植耕種作為明顯的生活型態因素。而移居背後的驅力、情感也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移動前的社會脈絡，甚至是支援移動的社群網絡，是女性移居者在考慮目的地時的重要影響項目。

此外，這種以土地連結的移居「生活風格」，也與鄭鈺琳 (2007)《種出綠色生活圈：志願務農者生活方式選擇與農耕生活風格社群之形成》所提出的生活類型重疊。「生活組合」的概念在德國社會學界多有著墨，強調人們「如何安排」其日常生活，以及具體的「實踐生活」。它將生產性質的經濟勞動是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與其他生活領域如：家庭休閒、消費等等結構出現代人的生活全貌，已達成自我生活的平衡。Giddens, 趙旭東, and 方文 (2002)對晚期現代性的分析提及，現代性是一種後傳統的秩序，其中個體思考「我將如何生活」的問題將日益重要。而如何生活表現在謀生過活的選擇、飲食、穿著、移動等生活決策之中，並從中獲得一種持續性或暫時性的自我認同。

我們可以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台灣鄉村生活中有不同階段的時期與特徵，大約可分為：

- (1) 國民政府遷台時期：實施土地改革政策，改變了土地所有權的結構，滿足普遍農民「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農業是此時的生活的方式和目的。
- (2) 1960~1980 年代：農業轉向工業社會。從 1962 年開始，工業生產毛額占 GDP 比例為 28.22%，超過農業的 24.97%，成為國家重要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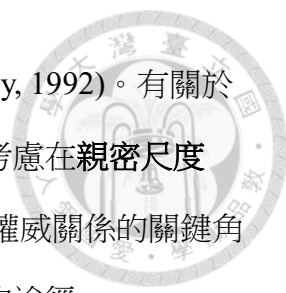
(3)1980 年代後：農業成長率低落，面臨了生產環境惡化、經濟自由化的壓力，都市擴張以及農產品競爭力的下降。

(4)1990 年代後：農業式微，1990 年之後農業轉向三生(生活、生產、生態)階段，以滿足消費為導向的多元化角色，整合城鄉與平衡農工的手段。市民農園、休閒農業出現，成為工商業社會中，戶外休閒的一種選擇，作為體驗農業、享受樂趣與健身的興趣。

在台灣鄉村移居者的類型上，近年來有島內移民的研究，有鄉村仕紳化的研究(方怡茹, 2009)，以及媒體的相關報導皆可顯示出鄉村移民出現的證據，但其性質多元，並非皆以親近土地、種植農作物為特徵。

臺灣鄉村的「島內移民潮」大多以服務業居多，譬如說經營民宿、餐廳，或是單純休閒渡假或是家庭別居、女性別居、退休移民等等型態。蕭崑杉 (2007)提到，都市人渴望回歸土地的現象，是因為帶著對都市生活的批判，他們的動機是想要創要優質的生活，希望就由勞力的付出，尋找「有目的的人生」，從務農中得到滿足，希望藉由一同參與自然、務農勞動的過程中，教導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如：感恩、珍惜、合作、分享等等，並加強親子之間的關係。對這群移居者而言，鄉村是令他們搬遷與改變的重要原因，追求的是某種生活型態的改變，並不只是單純的休閒活動(Keith Halfacree, 2007b)。島內移民對於土地或是鄉村文化不一定正面關連性，也有可能造成農地非農用、民宿氾濫、學區學校轉型成體制外學校，甚至房地產價格哄抬等等現象。

最後，有關「逆都市化的性別關係」研究中，1990 年代則著重在社會限制中的女性角色與其壓力。例如：女性由先前都市的職業經驗下移往鄉村，但在當地的影響下改變為傳統的鄉村性別角色以及意識形態(Little and Panelli (2003)。許多研究強調了性別關係與意識形態在鄉村地區的改變，以及變成與都市更為相似的性別角色(B. B. Bock, 2015)，而相似研究中也發現了在男性經驗的實質權威與控制的社群中，女性因為受到團體期待，行為舉止上內化、服務與維護社群的傳統



價值，並且在社群的關係中實踐傳統價值(Corbett, 2007; Dempsey, 1992)。有關於這個面向，本研究則以**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的研究途徑出發，考慮在**親密尺度**(Intimate scale)下進行分析，例如家計與社群。尋找社群或家庭權威關係的關鍵角色和土地使用、產權關係在結構勞動的性別分化以及鄉村資源的途徑。

在上述的研究發現下，台灣脈絡的性別關係，是否如同西方研究中的性別角色改變，是本研究的討論重點。在勞力分工上，台灣當代的鄉村在機械化普遍、網路發達的遠距作業下，是否要配合傳統的鄉村性別角色仍有許多變數與選擇。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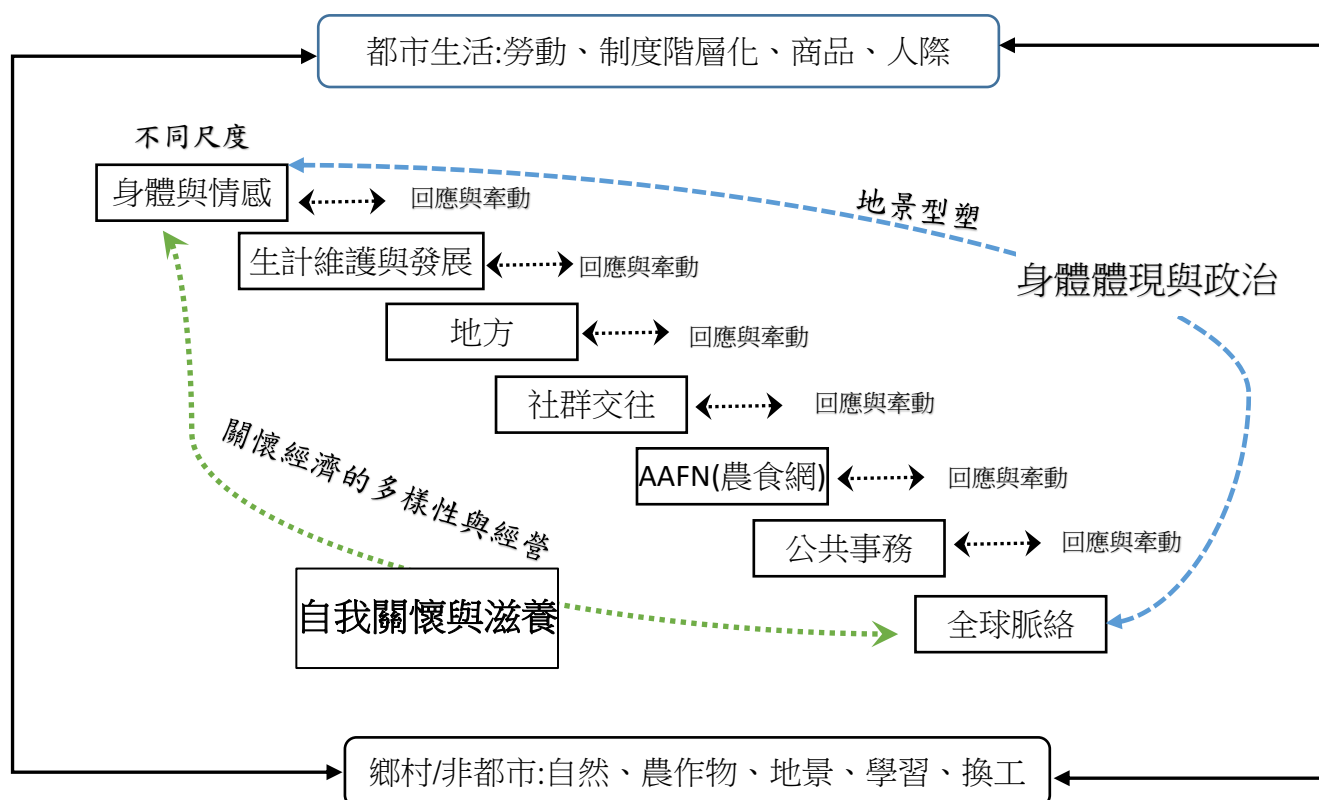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示意圖

研究架構主要以身體、在地農食生活、地方、社群與公共事務作為不同尺度的分析。

(1) 地方：食物/作物、身體、情感、照護/關懷

在地方的層次上，採用多層次(multiple levels)的分析。透過身體的女性主義政治生態(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ies of the body)，考慮了生物體之間以及人類與非人之間的情緒、種植、食物系統、生產與消費實踐。例如 J. Hayes-Conroy and Hayes-Conroy (2013)在北美邊緣社區裡的校園菜園與食物計畫研究中，提出了一個所謂的身體政治生態學，包含了結構力量的評估(在近用食物途徑中，探討政治經濟力製



造社會不平等)，知識的生產，以及決策(由人們與機制產生的食物與健康論述)，與一個關係本體論(顯示社會與環境系統的重要性)，探討這些物質如何影響，體現每日生活的情緒動態。J. Hayes-Conroy and Hayes-Conroy (2013)提出身體關係的力量包括那些傳統上與政治生態相關的力量，例如重現社會不平等的結構力量，論述和意義建構的認識論力量，以及日常物質互動中更隨意的本體論力量。在這種地下莖(rhizome)的交織力量中，人的情緒/情感能力被激勵去實踐某件事，不僅取決於她/她為產品換錢的能力，或者她/他的地緣親近性，或者對食物的了解，但在她/他的表達身體的能力，以感受到一定程度的舒適、興奮、感情、驕傲等等，受到地方、經濟和知識的影響。

最後，是有關 Jarosz (2011)提出的「關懷/照護的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A feminist ethics of care)，她在進行美國社區支持農業的女性動機研究中發現，這些參與表達了一種「關懷/照護倫理」，其中涉及她們自己和他人的滋養、人和環境的培育。Jarosz 在研究中避免照護中女性本質的聯繫，並發現女性是透過對社區支持農業的關懷工作，來照護環境和遠方的他人。這顯示在照護中，經濟不是主要動機，照護反而與社會目標相關，希望打造一個令人滿意和有意義的工作生活。

關懷/照護的議題亦為本研究中關注的焦點，圍繞著土地健康、鳥類生態與提供友善自然農作物給消費者與親友，是這些女性移居者的工作項目與生活宗旨，藉此分析討論其中的關懷/照護倫理。

3-1-1 性別中的權力關係

這個面向探討性別的權力關係，如何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女性與男性的決策以及資源如何分配，這樣的分析透過在家庭與社群中性別決策，相互交織在永續生計中。相關討論像是 Gibson-Graham 在「女性與地方政治」(Women and Politics of Place'，WPP)中檢視女性如何進入政治的鬥爭，透過地方的差異層級-以及圍繞著身體、家庭、局部環境與社群。其研究關注描述、分析，定錨在身體、環境與社群

經濟裡的性別政治奮鬥，像是「第三輪班」(the third shift)的移轉與出現，檢視這些女性透過「第三輪班」的努力突破個人與家庭的限制，進入公共領域。





第二節 研究方法

質性方法是有關蒐集非數字、強調敘述、論述、研究者的觀察、以及研究參與的感知。Creswell (2013)定義質性研究是一種基於調查的傳統，由研究者在自然的背景下建立複雜整體的圖象、分析字句、描述報導人的詳細觀點，引導研究。Creswell 也強調了質性方法論是聚焦在參與的意義與描述的過程，以此透過語言表達與說服。

3-2-1 深度訪談法

訪談的目的並不在於尋求某一個問題的特定答案，或是某種假設，主要是能夠理解他人的經歷或經驗的內在意義，雖然每個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別人，但是訪談提供了一個接近他人經驗理解的管道。

深度訪談主要是透過開放式詢問與引導自我探索，使訪談者及受訪者能在受訪者的脈絡經驗中充分理解研究焦點的意義(Creswell, 2013)。為了使這些問題有意義，受訪者必須重新檢視其生活和現今生活處境的關聯性。其中也包含對於當前生活世界的經驗脈絡檢視。在深度訪談中，根據研究問題（詳見第 xx-xx 頁），本研究的訪問大綱如下表：

表格 2：訪綱

階段	訪談問題
第一階段	1. 讓你原居地與宜蘭之間遷移的主因是什麼？ 2. 在投入「另類農食網絡」中的耕作、學習、社群/產銷中，帶給你什麼樣的啟發/理念認同是什麼？ 2.作為女性，你怎麼看待自己在環境-農業-食物-家庭裡的角色。 3.在華德福教育(依據移居者所參與的社群而有不同)中，你在農夫、食物、烹煮、與母親的角色中，所進行的工作為何，如何運作？

	4.作為女性，你如何分配在家務、農業參與、社群的勞動力的比重？ 5.永續生活以及「另類農食網絡」的空間運作在哪裡如何進行？需要經營在地(或國內、國外)人脈或社群嗎？性別與家庭背景如何影響？遇到那些困境與收穫？ 6.社會經濟狀態如何影響女性在「另類農食網絡」裡的投入？
第 二 階 段	1.要具備哪些能力，才能讓你能在鄉村安得其所？ 2.你原先是 XX 師，這個行業生涯裡怎麼讓你轉身擁抱農業生活風格社群？ 3.都市與鄉村的生活與工作型態有很大的差別，在專業與勞動力上，你覺得兩者的不同之處是？如何相輔相成。 4.你是一位 LGBT/異性戀，以你這樣的性向，在傳統父權家庭為組成多數的鄉村中 (1)在這裡生存的優/劣勢？ (2)感覺你在鄉村裡算是如魚得水，可以串連各種不同理念或性向的社群跟組織，是因為你的性別氣質屬於比較陽剛/陰柔的 LGBT/異性戀嗎？ (3)鄉村裡的「陽剛/陰柔」性格與體格或其他是否比較吃香或易於被鄉親接受？ (4)面對傳統的性別文化，你怎麼翻轉其他人對你的性別刻板印象？無法翻轉印象是否會產生不舒服的情緒，如何面對？ (5)LGBT/單身女性/離婚婦女為什麼選擇到鄉村生活？都市不是比較開放，較容易接受各種不同的身分，跟你育兒/養寵物/兼職的工作類型是否在鄉村比較有益？ 5.你的鄉村事業與生活有哪些日常的例行性事務？ (公/私領域，與土地/農業的空間)

	4.台灣鄉村或地方政治等等公領域充滿了男性政治文化，女性大多現身於非正式的政治活動，處理日常生活中更家庭或私人問題，涉及較少的公眾曝光，並與傳統的性別形象更緊密地契合。你在其中如何邀請大家參與更開放的公共領域事務與營利的「社群經濟組織」？ 5.成為「永續農業生活風格的組成」據你觀察有哪些特質？ (1)女性在社群中的任務或角色大多是怎麼樣的？女性在其中社群中的比例？ (2)這些社群的人跟來鄉村買房的都市人有甚麼不同嗎？ 6.有人認為移居鄉村有某些「反都市行為」(反資本)你認為是嗎？ 在面對像是如何與傳統父權社會(性別關係較為預定與性別分工)相處？(像是土地承租問題、緊密的鄰里關係、工作能力等等) 7.你在鄉村裡創立過哪些組織與從事的社會運動？它們跟性別、永續經濟、土地有哪些互動與連結性？這些公民運動與你的移居理念相關嗎？
--	---

3-2-2 參與觀察

本研究可透過打工換宿、參與演講、農食課程、工作坊、研討會、參與內部聚會等等方式進入田野，除了參與之外，還可以旁觀、傾聽等等，挖掘實踐和理論的真實，透過局內局外人的觀點、開放的求知過程，參與或間接參與受訪者生活的方式來收集資料。

3-2-3 進入田野的過程：進入一個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田野

本文採用「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的視角，以「生計」與「生活」作為切入視角。檢視移居女性如何為了健康與追尋自我認同，在環境與生活中轉身與遷移。檢

視生產、食物準備、消費、健康、文化，以及適當的食物權中的政治經濟關係，其中包含了再生產中選擇的權利，以及性別關係決定了誰可以照顧家庭、社群與地景。

例如在移居前，升學與工作占據了女性移居者的人生精華，因為學習專業知識，導致他們與生活相關的技能(編織、料理、木工、修理房屋等)上的生疏，但是在鄉村裡，這些技能反成為他們主要的學習與培力過程；而來到鄉村後，則時不時受到在地居民異性戀規範的檢視，例如：婚育問題。另外在生產知識上，水果、稻米等的知識，主要為在地男性老農所累積傳承，少有願意傳授給外地人，甚至女性。另外，在水稻代耕系統上，仍由代耕主負責育苗、打田、插秧、收割、烘穀與碾米等。不論是生產機器，甚至是育苗的米種，這樣的知識技術仍由在地人所掌握，外地人務農，則需服膺原有的生產秩序安排。以女性政治生態學的視野分析，更能從性別的角度，看到農村權力結構的日常展演，與對於這些秩序下，女性移居者與其打交道的精采協商與抵制過程。

進入這個擁有大量移居女性的宜蘭鄉村前，研究者約在 2011 年一次為期一個禮拜的「打工換宿」感受到這個「返土歸農」的浪潮。當時與夥伴居住的平房為女農「李寶蓮」的一棟房子，專門提供換宿的朋友。當時則由「宜蘭小農聯盟」中的 B 來管理，當時我注意到了，農場之間的協助是互相換工的、新農舊農之間只要理念上是屬於不使用農藥化肥，友善土地，大多會集結在這個社群裡。B 因為是外來的移居女性，在租賃房屋、租農地上與在地居民互動頻繁，也跟房東阿母學習作醬油、豆花一事，並且與其它女農嘗試耕種小麥、雜糧等當時在地少有的作物。B 的收成則部分提供給台北市、宜蘭市的餐廳。有了這次的經驗後，在之後的訪談中，也大多採取了「以工換訪談」的方式進行。這樣的好處在於近身、連續不間斷(約有 3 小時以上)貼近他們的工作場域，可以當場觀察到農作施作的方式與操作，以及受訪者與在地人的即時互動。而也因為我來自外地，受訪者時常會與我聊一些無法跟當地社群或居民聊天的話題，例如：新移民小農社群圈的一些衝突、在地鄉親在性別上的玩笑，甚至是工作進度的難題等等。有時候面對的是獨自育兒的女性，

我也會幫忙照顧他們的小孩，這樣的過程，讓他們能夠談論較為生活的瑣事。

雖然一開始考慮過找是否採用民族誌的研究方式，長期駐點。但是由於社群間理念路線的爭辯、衝突，以及生活距離拉近後，鄉村地區人與人之間緊密相處產生的評點與誤會，在訪談的過程中時有所感。因此後來以多次、多場合的參與、多次的接觸，來熟悉研究田野。

此外，研究者也靠著自己的手工藝，受到受訪者的青睞，而被邀請作為女性移居者的老師，教授手工藝的技巧，例如編籃子、網袋等，由於編織的時間需耗時 5-8 小時，研究者須前往 2 次以上。在教學的過程中，大多是一對多的教學，也因此認識更多的移居者，與她們閒聊。在其間大家也更願意揭露自己的生活狀態，例如：以往在自己的求學過程中，學校的工藝家政課時常消失，於是現在對這方面的技能有濃厚興趣；或者討論當地的社群、感情狀態、在當地食用了哪些好食材等等。發現移居者之間，雖然以前住在都市的時候互不認識，但是移居宜蘭後，雖然四散各地，仍時常聚會吃飯、學習手工藝、烹飪、製作發酵食物等等，上課地點可能是在不同移居者的工作室、住家等等。

可以感受到這是他們在移居鄉村後，重要的休閒娛樂。我也因此飽嚙在地物產的豐美，並嘗試學習製作了醃製與發酵食物，例如：豆腐乳。製作發酵品，是女性移居者的共同運動，據說是為了養身體的菌相，讓身體的免疫力提高。

女農們自製的加工食品，因為食物發酵菌落群受到溫度、季節影響，需要挑選時間，而原料就來自於自己或朋友的農作物，因此往往製作量龐大，需要多人協助。也因此讓我一窺了在地居民與移居女性的互動。

以製作豆腐乳為例，通常會請到 1-2 位在地婦女，而有 10 位左右的新農學生或幫手。我的經驗是大約早上六點左右就開始，每隔半小時左右，需要不斷翻動煮好的黃豆與糙米，讓他們散熱與均勻接受菌落，生出米麴。休息時間則常常是由參與者自產或自製的茶水與餅乾等等，聽著在地老師分享的經驗與注意事項。

另外在農作上，研究者參與過育苗、插秧與清理雜草。常常透過這個機會，觀



察移居女性與在地居民的互動。可以發現前來幫忙的大多是男性代耕業者、對友善農業有興趣的學習者等等。在性別互動上，我的異性戀受訪女性大多扮演者食物供應與土地管理者的角色；而協助者多為男性，並且呈現了較為熱情的協助者與諮詢者的角色；在酷兒的農場裡，可以發現他們在 LGBT 社群，在親子與青少年社福社群上多有經營，並且清楚地認知道他們將務農作唯一種有意識的社會運動。

在研究田野上除了進入勞動的田園外，他們常去的餐廳、假日市集、聚會場所、銀行郵局等等，也是我觀察這些「返土運動」(back-to-the-lander)人士的重要地點。以餐廳為例，可以知道他們供應的食材還自哪一位「自然農法」新農；在市集上可以看到他們大顯身手，將自己的專才展現，例如：野生酵母麵包、糕點、香草茶、攝影、醬油、豆腐乳、調酒等等，相當多手工製作的食品與工藝品。

透過不同地點的參與，讓我看到移居女性的生活樣貌，並透過較為長時間的田間勞動、手工藝教授，以及市集擺攤等等，讓我更了解到他們的工作與休閒的進行方式。

在研究中，焦點在於「移居女性」在「返土歸農」與「創建另類農食網絡」的家庭/個人生活與社群參與的「性別決策」，檢視其中的決策與權力關係。在研究分析中帶入性別、政治、文化以及經濟從屬關係的女性性別經驗，以及性別的權力關係如何維持生計以與社群福祉。此外，分析性別的「體現互動」以及「與勞動同在的情緒與情感關係」，並檢視照顧、情緒、身體、健康、環境健康的議題(Harris, 2015; Harcourt, 2017)。這個興趣建立在環境中的掙扎(生命的相互連結與權力相關性，包含了有關環境決策中的性別關係)中身體的良好狀態、社群與文化。

三、紮根理論研究分析

理論取樣(theoretical sampling)(促成理論產生的資料收集流程)是我在研究中主要抽樣的方式。使用理論取樣時，研究者同時收集、紀錄、分析資料，使用這個時序的流程，判斷接下來要收集什麼資料，以及去哪裡找資料。配合理論取樣，我根據訪談內容、參與觀察以及二手資料來挑選參與者。

紮根理論的研究者需要從資料中歸納概念，和傳統上資料的詳細描述與受訪者的引述不同。需要從概念化「身體/情緒療癒」、「培力地景/社群」、「例行性的季節勞動」等，需要持續比對資料和新出現的類別與屬性。

訪談編碼上，包含了屬性類別與理論概念的分類。前者如：「生計組合」、「社群網絡的協助類型」、「移居前的拉／推力」、「學習型態」。後者則有：「現代化制度與都市的傷害／療癒」；「性別分工與技術」：父權體制的鬆動、性別分工與任務、性別與體力；「在地人情的利弊」；「身體、情緒與生活」：自然與人的連結、農耕實作、農作物的生命力、療癒等等核心類別與屬性。

3-2-4 訪談者的類別

在 2012 年一次與賴青松的農場換工、拜訪聊天中，他除了跟我說說了宜蘭新農夫們的特色，還提及了女性移居者在鄉村裡的高比率，因此也開啟了我對與女性務農者的興趣。以下是 2014 年起曾經訪談的女性移居者，以下將分別簡述之。

田野中我訪問了 28 受訪者，最後取 23 位的訪談做為本研究分析依據。這些返土歸農的女性移民裡面有「友善農業的倡議者」、「移居社團的管理者」、「租借友善農業耕作者的地主」、「水稻代耕業者」、「農產品食品加工者」、以及最重要的「移居女性」。一開始的訪談並沒有細分性別，後來在宜蘭倆佰甲、松園小館的聚會中發現單身女性移居者踴躍參與社群聚會與公共議題，因而把研究對象轉向移居女性。

在訪談對象上，大部分移居者在搬到宜蘭居住前，是所謂的知識工作者，並有大專以上、研究所甚至是博士的學歷。每位經過 2-3 次左右訪談、參與觀察，每次約進行一個小時以上的訪談，偶而在受訪者工作中進行。時間進行上自 2012 年開始進行(詳見表格 2)。

表格 3：訪談者資料



受訪者	參與 農耕	務農前的職 業/今	移/居住 地	年齡	家庭狀 態	身份/社群	作物
A	2009	政府部門約 聘人員/農	台中-台 北-宜蘭 大湖	40 左 右	女同	獨立小農 (生產夥伴 2 位)、 守護宜蘭 工作坊、 蘭陽溪友 善耕作生 產合作 社、農委 會 2017 年 百大青農	稻米、果樹
B	2010	電視公司/ 農	桃園-新 北-礁溪- 員山	50-60	單身	獨立小農 (有生產組 織夥伴 3 位)	稻米、雜 糧、釀造等 加工
C	2014	NGO 工作 者/農與兼 職	苗栗-屏 東-宜蘭	38	已婚	倆佰甲/現 已獨立	稻米
D	2013	NGO 工作 者/農	台南-高 雄-泰國- 桃園-宜 蘭員山- 台南	36	女同	土拉客 現已獨立 離開	稻米、雜糧
E	2011	NGO 工作 者		35	女同	獨立小農	稻米為主
F	2013	社工/農與 兼職	台中-宜 蘭-新北 市	31	單身	獨立小農	稻米、雜糧
G	2008	農/家庭農 業	宜蘭-台 中-宜蘭	40-50	已婚	家庭農業	稻米、蔬 菜、農產品 加工
H	2011	農業	雲林-台 北市-宜	32	已婚	家庭農業	稻米、蔬 菜、農產家

			蘭				通
I	2013	醫/醫&農	台中-台北-宜蘭	41	單身	倆佰甲、華德福、女農社群、宜蘭社大	稻米、食品加工
J	2013	設計師、記者/攝影師&兼職農	高雄-屏東-台北-宜蘭	30-40	單親母親	友善小農、倆佰甲	稻米、蔬菜
K	2016	出版業(書店)/農與兼職	宜蘭-台北-宜蘭	40-50	單親母親	倆佰甲、宜蘭社大、華德福、	稻米、蔬菜
L	2016 與另兩人成為生產加工團隊	全職母親&麵包糕點加工	宜蘭	40-50	單親母親	宜蘭社大、華德福	食品加工
M	2016	資訊業/農與兼職	台北-宜蘭	30-40	單身	宜蘭社大、友善小農、倆佰甲	稻米、蔬菜
N	自家有田	政府員工&地主租田給移居女性	宜蘭	50-60	已婚	宜蘭社大、協助父母賣農產品	蔬菜
O	2013	設計/全農	宜蘭-澳洲-宜蘭	34	已婚	親戚、在地青農	番茄、蔬菜
P	2008	老師/社區工作者與農業媒合	苗栗-宜蘭	50-60	已婚	華德福、守護宜蘭友善小舖、女農、守護宜蘭、倆佰甲	柚子、金棗與其他蔬果

Q	2012	媒體工作者	台北-新北-宜蘭	約 40-50	單親母親	貢寮水梯田、南澳自然田、 倆佰甲、華德福	稻米雜糧蔬菜
R	2016	研究生/全職農業與老師	美國-中國-台北-宜蘭	20-30	單身有伴侶(女同)	友善小農、女農等等	稻米、蔬菜
S	2019	大學教師/代耕業者/社群組織者	台北-宜蘭	50 上下	男/已婚有家庭	倆佰甲/曼島生活	稻米
T	2012	NGO 工作者/程式工程師/農	台北-高雄美濃-桃園-宜蘭	40-50	女同志/已婚	土拉客、守護宜蘭工作坊、宜糧號、蘭陽溪友善耕作生產合作社	雜糧/各式農產加工
U	2012	物流業者/現為農	台北-宜蘭	50 上下	男/已婚有家庭	倆佰甲	稻米
V	2016	接案平面設計師	台北-宜蘭	45	女/已婚異性戀	華德福	稻米、食品加工
W	2013	政府研究員	台北-宜蘭	55	女/單親異性戀	老農、友善小農、土拉客	稻米

五、文本資料蒐集類型

受訪者所使用的社群媒體(Facebook, IG)、通訊媒體、網誌、廣告文案等等資料，以及內政部統計處⁴、行政院農委會統計與出版品⁵等量化資料，都是在進行紮

⁴ 內政部統計處人口遷移資料 <https://statist.moi.gov.tw/micst/stmain.jsp?sys=100>

⁵ 行政院農委會統計與出版品 <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inquiry/InquireAdvance.aspx>

根理論中用來佐證理論，也是研究流程的一部分。



第四章 宜蘭地區的永續農業的社群與脈絡



第一節 自然與人文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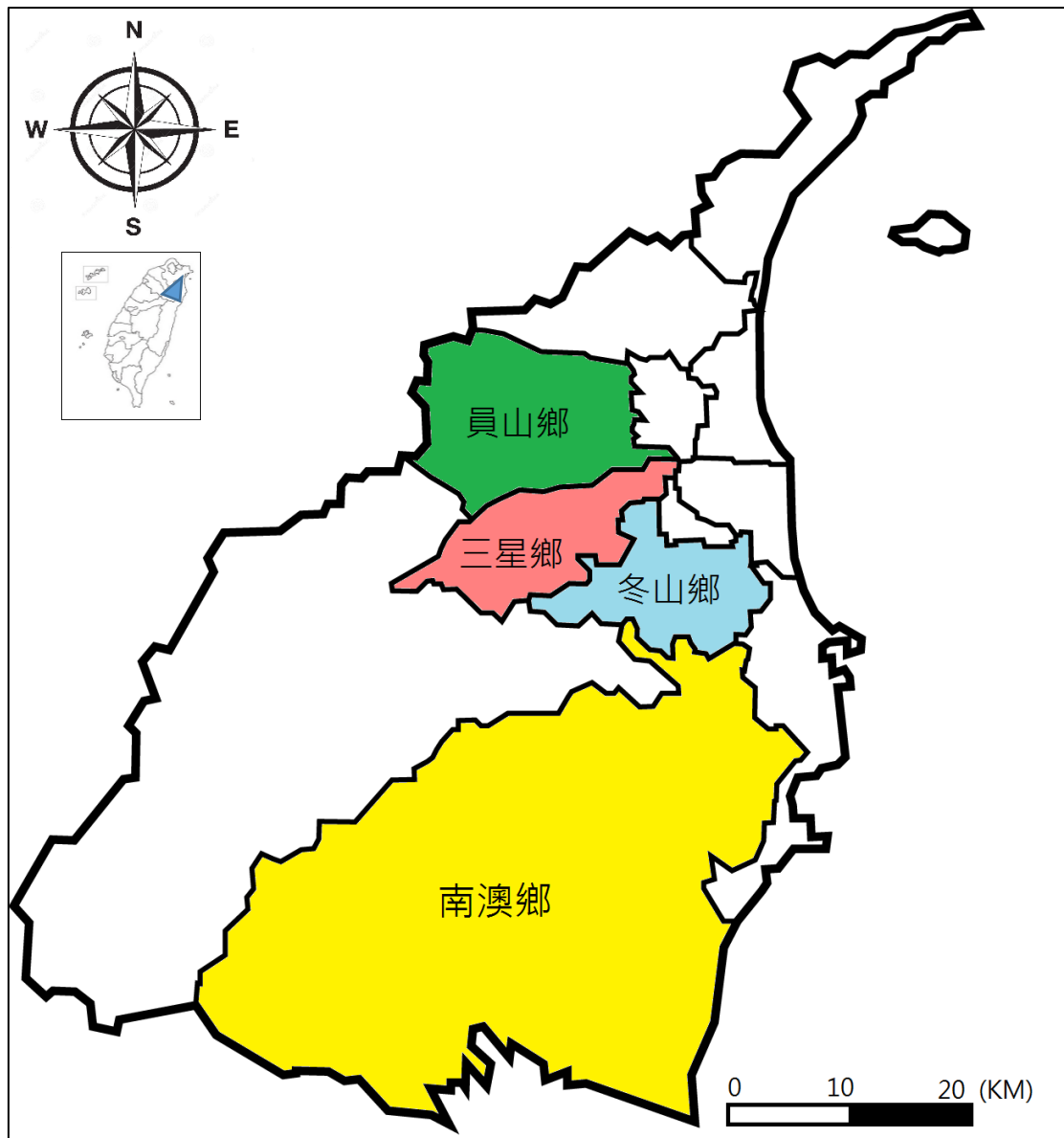


圖 2：研究對象移居範圍。

在早期，台灣國土計畫界定東部各縣市的發展定位異於西部各縣市。而在先天地形上的限制，交通建設連結大都會區不易，使宜蘭、花蓮乃至台東等三大行政區，

在發展初始皆以農業立縣。一直到觀光產業的推動，與國家政策的制定下，原先因交通建設不足，而保留下來的農業地景，成為東部各縣市發展觀光顯著之優勢。於 1991 年 7 月動工，歷時 15 年於 2006 年 6 月通車的雪山隧道(國道 5 號)，具有重要指標性意義。

在歷時十五年，雪山隧道於 1991 年 7 月動工，2006 年開通之後，大大拉近台北與宜蘭之間的距離，每到周末，大批的觀光人潮湧入，帶動宜蘭的休閒產業。而散落其中的有關永續生活與農業的組織，包括：小農友善聯盟、守護宜蘭工作坊、倆百甲(深溝小農)、土拉客(酷兒農夫)、華德福另類教育教育家長、宜蘭社大、南澳移入者、其他因素的遷移女性，則是研究中主要關注的族群。

宜蘭縣是台灣重要的農業縣之一，盛產稻米、蔬菜、水果，稻米是宜蘭的重要農作物之一，因受冬季多雨影響，大部分僅有一期稻作種植。本研究中的移居女性以選擇稻作最多，其次是菜園、果園，每個人的經營方式不盡相同，有全職的、兼職與當作休閒活動的，由於稻米已機械化程度最高，人力最少，因此最需要販售通路，並與在地代耕業者、僱工或是換工的形式合作，其餘的則大部分以人力為主，因此不以收穫農產品維生計的「女性移居者」則有其他職業或是兼職，維持生計。由於稻米為主要生產作物，下面列出有關稻米的耕種節奏為下表所示，而一年之間，友善耕作地各月節奏如下：

表格 4：宜蘭友善耕作之個月耕種節奏(引自：田文社「水稻家鄉」地圖)

月 份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工 作	育 苗、	打插補撿 田秧秧福 壽	撿草曬田	收割 曬穀 入倉	打 田	水田休耕、田埂除草 、補田埂、菜園冬季農 作						

項 目	施 肥、	螺		灑田菁	淹 水	
--------	---------	---	--	-----	--------	--

宜蘭縣 2016 年耕地面積為 27,539.45 公頃，站土地總面積的 12.4%，其中水田佔 62.7%。近年來因民眾逐漸關心食品安全問題，逐漸帶動有機食品的市場需求，2016 年有機栽培面積為台灣排名第三，僅次於花蓮縣與台東縣(宜蘭縣政府主計處，2016)。

第二節 另類農食網絡在台灣的發展脈絡

另類農食網絡的發展與農業工業化的蓬勃發展息息相關，農業工業化自二戰之後，1950 年代第一次綠色革命的興起，帶動了農業工業化的機械化與大量生產。由於其中的農藥在農業上的大量使用，1962 年瑞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因探討農業 DDT 的使用與自然生態的危害，使得有機農業因此逐漸受到世人重視。而台灣在 1950 年代發展出的「以農養工」策略，使用各種政策、稅收與金融手段，將農產品的價值，藉由人力、資本等補等價的交換政策，培育國家初級工業所用，這樣的擠壓策略，造就了鄉村的貧困化。到了 1970 年代，主政者提出土地鬆綁⁶，解決農工開發所需的土地問題(董建宏，2009)，並陸續訂定了 1973 年的《都市計畫法》與新訂的《區域計畫法》，讓工業廠房可以對使用中的農地就地認定，使農村空間直接接受汙水排放的衝擊；農業工業化的集中生產，也擴散到原先隸屬的保育區領域。也讓 1980 年代的環境運動因此風起雲湧，從 1979 年多氯聯苯中毒事件、1982 年鎘米事件…等這些具體的環境汙染事件，讓環境運動不再只是少數知識分子倡議的抽象理念，並

⁶ 董建宏，在《台灣農村規劃與再生的困境-台灣農業與農村發展過程的反思》中提到，1973 年蔣國在當時宣布了九項「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的目的，就是擴大個人生產面積、產量、減少勞動、力投入，來維繫農村存活方案。這樣的妥協，使工業在非都市土地擴張，造成後續農業上的弱勢，造就追逐資本與技術密集的商業，與仰賴國家補助的小農或糧食。



且進而帶動後續的消費者保護運動，以及有機農業的發展。

台灣農委會則在 1987 年開始試驗有機農法在台灣的可行性(請見表格 3)，相關永續性的農法則在 1990 年，引入日本岡田茂吉先生的「自然農法」推廣此農法，後來還有 1997 年「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成立」。相關的有機法規農產/加工品驗證法規，則到了 2007、2008、2009 年頒布公告。由於生產規範在近 2010 年左右才制定完備，可以看到其產業鏈相對於慣行農業是不完整的，有許多產銷模式，是循著歐美日的路徑發展。

以上是生產組織的推廣，而消費組織以「社群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型態在 1992 年之初由「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引入日本發展共同購買二十多年的「日本生活俱樂部」(又稱提攜)，由 1993 年嘗試米與葡萄的「共同購買」，為最早消費者支持有機農業的型態，並募資社員股金支持合作社的營運。而剛開始的經營範圍，只是在都會區的消費合作社支持台灣的有機農產品，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是比較疏遠的。在共同購買的過程當中，主婦聯盟為了讓社員與生產者直接面對面、增加對於農作物的理解，便效法歐美「社區支持農業」，推動社員投入「集體種植」。這樣重視面對面的消費模式，一方面是對於食物生產鏈中的加工流程與食安事件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則是提供消費者直接了解農業生產的實際困難，能夠理解物流中品項有缺陷與產量不足的問題，可以說是對另類農食網絡中最重要的精神：藉由中介的減少，希望解決其中生產系統的階層化與信任的疑慮。

這也是本研究中返土運動的重要原則之一。但「面對面」、「直接產地到餐桌」是否就能減少現實中擔憂的問題，這並非通則。當代新農運動實踐脈絡的其中之一是「安全飲食」與「在地消費」，確保食品的真實性，消弭假食物的疑慮風險，這種直接生產與消費的實踐，有其效力。但是若無考慮到這些機制如何組織與運作、消費者的動機，原先所擔憂的誠信與中介行動者過多的問題，很可能因為人情、同情等等因素而出現，或是價格定價太高，在招募階段遭遇困難。例如：因

為信任與同情生產者無法支付過高的有機認證費用，而未考慮鄰田農藥汙染或是無監督機制導致無法追蹤生產流程。因此在 2008 年政府開始

表格 5：台灣另類農食網絡發展組織、相關政策與年代

政府政策	年代	民間組織
農委會引進有機農業	1998 年	農委會引入有機農法試驗
	1990 年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推動相關農法與驗證
	1993 年	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推動共同購買
	2004 年	賴青松在宜蘭成立「穀東俱樂部」
	2002 年	慈心華德福實驗學校成立，是宜蘭第一所公辦民營的實驗學校，課程中十分注重食農教育，家長亦成為另類實農網絡的重要消費群體之一。
台灣有機農產品與加工法規制定	2004 年	穀東俱樂部-社群支持農場
	2007-	
	2008 年	北中南東出現農夫市集 5 家 宜蘭友善小農聯盟成立，
修正「農糧署輔導設置有機農夫市集補助原則部分	2012 年	並在 2011 年成立大宅院友善市集
農地休耕補助從兩期改為一期	2013 年	倆佰甲(新農協助社團)成立，增加農地租賃機會。



施行有機農業的驗證，也使有機農業正式進入市場化的階段，使其從理念的實踐成為政府介入管理且設立規範的新農業型態，做為台灣「另類農食網絡」邁向市場化中重要的實踐面向(金惠雯, 2018)。會有這樣的走向，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無法有這麼多時間與精力，進行面對面的溝通買賣並建立信任關係。金惠雯 (2018)必須透過標章系統來減少食品安全，因此出現了第三方驗證系統與參與式保障系統⁷ (PGS) 來開始施行有機農業的驗證，也使得有機農業正式進入市場化。除了邁向市場，另類農食網絡另一個發展實踐，是在國中小、高中、大專院校所推廣的「食農教育」以及在不同公私部門場地舉辦的「農夫市集」。前者以環境教育、里山倡議、認識農耕過程以及烹飪，帶入學校課程，增進學生們對於農業在環境與營養上的學習(鍾怡婷, 2018)；農夫市集則成為小農拓展的行銷管道、拓展消費者對於生產地認知與農產品品質的疑慮。

宜蘭地區的另類農食社群的發展早期，受到上述主婦聯盟的影響，其中的倡議者與教育組織則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上述提到的有機農夫「何金富」在 2004 年，協助兩位對有機農業有理想的農夫，其中一位便是在宜蘭員山管理「穀東俱樂部」的賴青松，其農場運作第一年，就找到百位以上的支持者，共同承擔天災風險。在這個精神的運作下，農夫是受僱於穀東的田間管理員，支領固定薪水，巡田種稻、詳細記錄種稻過程，是台灣首次出現經營社群支持型農業的農場組織。這個模式後來廣泛受到農業新手採用，賴青松早期的穀東支持者，也有部分成為

⁷ 「參與式保障體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簡稱 PGS) 是由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 (IFOAM) 所建構的一個有別於傳統驗證體系的策略，它的主要理念在於和以第三方驗證系統在為消費者尋求有機生產提供可靠的保證有共同的目標，不同的是在方法，顧名思義，在驗證過程中不僅是鼓勵並要求農民和消費者的直接參與。參與式保障體系會優先考慮對生產者及消費者的知識和能力的建設。一個重要的因素，這種直接參與讓參與式保證體系方案減少了繁瑣的文書工作和備存紀錄需求，因為參與式保證體系方案必需包含小農戶，並促使小農戶進入有機的生產體系。

移居宜蘭的新農夫，並採用相似的方式經營。並且有愈來愈多人受到賴青松營運的感召，因此移居到宜蘭鄉村返土歸農。賴青松也因此擔任老師的角色，三不五時成立水稻生產讀書會、台語學習讀書會等等，讓由外地移居宜蘭鄉村的人更能融入這個地方。

研究者自 2008 年以「另類農食物網絡」為碩士論文，探討其中的通路組織，像是農夫市集、共同購買的平台，在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角色與功能。當時認識了兩位原來是在社區大學與主婦聯盟消費者合作社工作的兩位女性，幾年後輾轉得知她們前往宜蘭鄉村，學習自然農法農業並移居當地。當時，腦中出現了疑問，怎麼這些女性都到了宜蘭學習農業，雖然兩位待的時間都不超過兩年，當時則生出宜蘭有組織性的自然農法社群，並有部分移居者的猜想。因為當時研究的是另類農食網絡的平台，農夫市集、共同購買等，對於其中參與的消費者，後來成為宜蘭鄉村的生產者，這件事對研究者而言非同小可。由於鄉村大多充滿了異性戀規範，財產繼承權也以男性為主，這些高學歷的女性因為對於這種生產消費關係的認同，進而移居鄉村、以農為生，這使得當時的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

大約在 2007-2010 年之間，另類農食網絡的聚集平台還以農夫市集、有機商店為主，有許多小農參與其中。但因為這個模式的宣傳，也愈來愈多農場採用「社群支持農業」的方式，招募會員並進行產地旅行與體驗耕作等等。在這樣的脈絡下，檢視宜蘭鄉村，可以發現其中另類農食網絡的運作方式：農夫市集、社群支持農業、學校的農食教育、自然農法社團、社區大學等等，在 2010 年後有愈來愈蓬勃發展的趨勢。其中有幾個重要組織組織，在此介紹。



第三節 另類農食網絡社群組織在宜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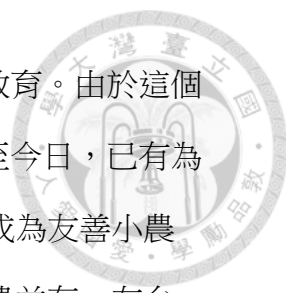
4-3-1 友善小農聯盟

此組織自 2009 年成立「友善小農聯盟」，召集人之一是 1999 年在梨山專職果樹耕作，把農事經歷寫成「女農討山誌⁸」的梨山阿寶(李寶蓮)，一方面為了照顧日漸年邁的母親，在宜蘭租了間小屋，提出「吃當季、吃在地、支持友善耕作、支持多元社會價值」的想法。隨著友善小農聯盟的形成，與「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取得協議後，與賴青松、女農游麗花在 2011 年轉型為「大宅院友善市集」。其中包括了共同廚房、援農制度的運作，後來也在學校旁邊增加了常態的據點「友善生活小舖」。而大宅院友善市集一直營業到 2013 年 12 月，由於市集幹部漸漸感受到宜蘭的農村正在急遽的變化，許多新移民，或追逐理想的居住空間移居至此，帶來更多環境的衝擊與壓力。為了擴大到整體農業環境的關懷，市集工作團隊無法兼顧市集營運，因此畫下了休止符。但小農不因此而消失，冬山的「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反而因為其教育理念，學校師生與家長，甚至發展出更多農食教育、農場、餐廳、課外活動、商店等等。

4-3-2 華德福另類教育社群

慈心華德福中小學是宜蘭的另類教育中公辦民營的學校，華德福教育的理論源自於奧地利神祕主義哲學家魯道夫·史代納 (Rudolf Steiner, 1961-1925)，他是有機運動的思想先行者，風行於歐洲的生機互動農法，他在 1924 年的農

⁸ 《女農討山誌：一個女子與土地的深情記事》：此書探討人與自然間的關係，有如 19 世紀中葉，亨利·梭羅在《湖濱散記》中詳細記下他的材料支出和農田總收入；21 世紀初的台灣「討山」女農阿寶租下梨山果園，以照顧生態的方式，栽培果樹，希望最後能將土地買下，或租下更多的果園納入合理化經營。



業講座以及人智學「靈性科學」為基礎，發展出相關的華德福教育。由於這個脈絡，宜蘭慈心華德福小學開啟臺灣校園農耕課程的先例，時至今日，已有為數眾多的老師與學生家長投入友善耕作(學生人數 3000 多人)，成為友善小農聯盟與大宅院的農友(蔡晏霖, 2016)。華德福教育社群與友善小農並存，在臺灣城鄉關係的改變下，雪隧的興建、體制外另類學校在宜蘭的興起，為農業帶來新的意義與投入新血。

上一段所提及的「宜蘭友善聯盟小農與宜蘭友善大宅院市集」，參與者有許多是宜蘭新移民與返鄉新農；她們為了環境理念與追求生活相對自主性而選擇務農、或為了讓兒女就讀慈心華德福學校而遷居宜蘭。有不少家庭是所謂候鳥夫妻的形式，一方在都市或是中國工作，另一方則暫居宜蘭，或是家庭成員全部移居到宜蘭，在華德福教育的影響，與舉辦華德福師資培訓的影響下，投入於食物息息相關的農業場域，並貢獻不同專長與職業訓練的專長在此農食網絡當中，扮演協同者、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色，為宜蘭鄉村帶來新的人才與城鄉連結。

4-3-3 倆佰甲

2012 年成立的「倆佰甲」成為新農夫育成平台，以協助新農介紹承租農地等等，提供租地、田間管理技術、倉儲服務以及統包機械代耕業者等方式降低友善水稻耕作的入門門檻圍主。2014 年超過 30 戶家庭加入，此組織的成立與 2013 年農地休耕補助由二期改成一期有重要關聯，使地主願意承租土地改小農，並由倆佰甲作為農地出租的介紹人，吸引不少有意耕作的新農夫。

當時的擴張以 2016 年達到最大的耕作面積 50 甲，而隨著參與人數的增加，發展出友善自然農法專屬的碾米廠、工具間、小農廚房、農業應援團等



等，至今仍持續經營。而到了 2017 年 4 月為止，倆佰甲在臉書上宣布終止⁹在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協助新進務農者進入農村的任務。回過頭來看倆佰甲的成員與背景，他們大部分稱自己為「新農夫」，這個「新」指的是大部分倆佰甲的成員在務農之前長期是農產品的消費者，並都缺乏農業生產者的相關背景。「新農夫」投入農務做為一位生產者的動機，都不是為了一般消費市場的需求，而是為了掌握自己可以信任的友善耕作農產品，並將這樣的農產品分享或銷售給自己的親朋好友。這種生產動機與狀態，截然不同於長期為大眾消費市場生產自己不敢吃的農產品的傳統農夫。在這個認識下，網路是這群參與者主要的溝通媒介。這個新的產銷模式，為友善的新農村打造了一個全球在地化的經濟基礎。這個新的農業經濟模型，是以新農村為核心，連結居住於全球各城市的消費者，並吸引著嚮往同樣生活理念的人，來到兩佰甲這個節點學習或生活，時間有長或短。

而在去年 2017 年 4 月，倆佰甲暫停了對於新農的服務，目前如果有住宿、餐廳、務農需求，則可以找先前在宜蘭安居茁壯的先行者協助，暫時卸下階段性的任務。

4-3-4 宜蘭社區大學

宜蘭縣政府自從 2014 年起，在宜蘭社大開辦「夢想新農」系列課程，一直到 2016 年已辦理 100 小時友善耕作的課程 4 次，其中包含：水稻班班、蔬菜班，結訓學生有 120 多人，內容包括友善耕作理論、實作、產銷合作、食品加工

⁹ 請參考倆佰甲臉書：自 2013 年開始到 2017 年 3 月春耕完成，倆佰甲在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協助新進務農者進入農村的工作，已經正式劃下句點。想要來此地務農的朋友們，仍可透過參與以下更多元的平台活動，逐步實現你的農村夢：宜蘭社區大學夢想新農班、小農應援團、月光莊，宜蘭、小間書菜的農村小旅行等等。

<https://goo.gl/WJA5is>

及農業綠色就業機會等等課程。有許多新農開始在宜蘭進行友善農業耕作，是以社大開設的課程作為敲門磚。



完成的學員裡，有從事工作有農業相關工作人員、獨立小農、以半農半X方式與同學共耕、加入倆佰甲等友善小農組織、經營友善食材店鋪、推廣環境教育、食農教育、有機農業等。在這個課程中有需多從事有機農業的前輩，像市賴青松、賴燕嬌等為其中講師，並且農業實作課程的操作地點，就在倆佰甲社群據點旁的員山鄉內城國中小學旁新農園地為訓練基地，可以說是一邊上課一邊熟悉當地的務農環境。

4-3-5 蘭陽溪友善耕作生產合作社

雖然前面有新農社群「倆佰甲」位新農移居者介紹土地與協助農業耕作，但是在 2017 面臨了轉型的需求。這其中所碰到的問題在於消費稻米的市場不大，一班家庭對於米的需求以被麵食取代，小農的稻米銷售愈到瓶頸。由於台灣市場對於加工產品或是雜糧反而有更多的需求，於是在 2020 年三月，有大約 20 名的青年農民，加入蘭陽溪友善耕作生產合作社，運用原先經營水稻「友善耕作」的模式，開發大南澳 14 甲土地，以栽種雜糧為主，包括了花生、黑豆、黃豆等，開發新的種植品項。

除了種植之外，合作社也申請農機具的補助。象徵了友善農業機械化的需求愈來愈多，雖然友善農業並不標榜大規模產量的耕作。但是在先前水稻工作的操作下，保持友善農業與機械化並行，並不衝突。而產值更高的雜糧類作物，也更需要農機具的操作、節省人力。從這些組織的出現，可以發現理念型的農業型態，目前一部份走向市場，透過機械化耕作、行銷包裝，尋求更多的利潤。這似乎代表著烏托邦的返土歸農，在現實上不僅有經濟考量、更需要產品開發與創新，才能讓移居者安居樂業。



第四節 女性移居者在宜蘭歸土移民的類型

都市邊緣的非都市地區土地，因為都市化的擴散，時常成為房地產開發的土地。同時，這些新移民帶來了對自然的新態度，可能改變當地對於土地的使用方式和保護環境的法規。

本研究中關注的對象以進行歸土移民的女性為主，但是宜蘭的新移民者眾多，在此依據第二章中的類型進行分類依據。

- (1) 教育移民：主要是因為考量宜蘭的實驗學校、體制外教育型態以及鄉村的戶外空間大與都市，大多是母親考量小孩的需求而移居宜蘭。她們大部分是所謂的候鳥家庭，家庭中的男性父親在城市工作，假期中才與家庭成員相聚。

在華德福學校的所在地冬山鄉，可以發現有許多餐廳、瑜珈教室、食品商店、便當店等等為華德福實驗學校的家長所開設，圍繞著食物、環境教育、課外學習等等性質的自營產業。隨處可見相聚再一起的母親們，在學校周圍活動。照理說，家長應該隨著孩子的成長，在過度過義務教育階段後就會離開宜蘭，但許多家長在此置產，並出現相關的房地產市場，甚至因為在此居住，買下農地自行生產的現象。另外，由於實驗學校人數達到 3000 多人，此地對於有機農產品的購買需求很大，除了是主婦聯盟在東部區域最大的取貨站之外，也有許多母親，熟悉在地農夫，並另用食材，進行加工品的創業與行銷，在學校社群中販賣。

- (2) 純粹的返土者：與 Jacobs (1969)提及的移居者類似，將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土地的種植，以全職的方式種植農作物，以獲取足夠的現金收入，在市場經濟中生存，關心自己的利潤盈餘，雖然以友善農法經營，但關注市場的

偏好、產品品項的開發，積極使用大型農機具，減少人力的耗費。



- (3) 緬懷田圓夢的移居者：大多從事專業性質的兼職工作、遠端工作，剩餘時間則從事與農相關的事務或是休閒。
- (4) 退休人士：大多是抱懷著鄉村生活有益於身體健康與讓身體勞動的想法進入，也十分關心在地的環境生態。或者，依靠自己財產資源生活，對於生計上較無壓力，可以進行生產力更低的農法方式，例如：樸門農業等需要增加農田多樣性作物的型態。
- (5) 學習友善農業的實習生：由於宜蘭地區有各種友善農業的實驗型實踐，吸引歸園田居的實習生(apprentices)，在其他人的農場上學習歸園田居的生活技能，並在未來規劃移居鄉村。

以上的移民型態與在地居民的交往在不同程度上有其影響，例如在土地租賃上，就吸引了一批願意實施友善農法，但是土地疏於照顧的地主，願意出租給這些友善農業的新移民。另外，在地的農業型態，也受到這群人對與保護自然生態理念的認同，因此改變耕作方式。而對於性別分工明確的鄉村地景上，女性出現在水稻田中，甚至使用大型農機具等等打破原先傳統社會的土地使用原則，在這個層面上，新農民在長期年復一年的施作上，漸漸改變了當地土地使用的性別分隔狀態。



第五章 移動/居與性別：多層次的分析

這個章節中所要關注的在移居女性，不管事在國外工作、都市就業、人生過程中，移居對於他們的重要性，不僅涉及原生家庭與成年後自我與他人的互動，也包括了在生活中的感知情緒、食物、身體與疾病的經驗。

第一節 移居推/拉力的類型

搬移、搬遷對女性來說是一件大事，除了工作、求學、結婚之外，遷移到非出生的宜蘭，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非常有可能舉步維艱，尤其是在這個大多為家庭、家族為單位，以異性戀父系為居住單位的台灣鄉村。

從 2011 年到宜蘭參加「友善耕作援農團」至今，研究者認識了無數來自台北、台中，或是西部都市的女性。透過訪談宜蘭的新農社群-倆佰甲與土拉客成員，了解到移居者的性別裡，女性在這樣的父系社會為主的鄉村中，數量上不比男性移居者少。

研究者：倆佰甲這邊是很多新農的第一站，想知道你們曾經協助過的女性比例？

S：我這邊是百戶裡頭有一半是女性。單身或是家庭裡的女性女同志很多，但基本上女同志，不在我倆佰甲這邊。因為茶是倆佰甲的共同發起人，後來離開了，同時帶了 5-6 戶的女同志家庭或個人離開，第一年也在倆佰甲，第一批就離開，但還是在附近自成社群。另外，還有像是土拉客，或是部分沒有加入社群的女同志……(S:2018/11/)

研究者從一開始訝異移居的性別上女性青年的數量與男性平分秋色，到理解女性在自主移居的學習與自我療癒的過程中。她們在宜蘭鄉村的現身，不全是時



代的偶然。在我詢問新農社群倆佰甲的發起人之一楊文全性別比率的問題時，他解釋了這樣的狀態：「女農他們是獨立於原生家庭之外，也沒有小孩這件事，她沒有那個壓力，又有點專業，在網路時代，也可以接到一點 case，沒有家累才能夠進來。有人問我有家累的話，怎麼進來？不過也不是沒有經濟，我們在探索新的經濟 model.....」在楊文全的詮釋裡，她認為「單身女性」沒有家累，導致她們可以輕易離開都市職場。

實情是我在訪談時，移居女性反而極少陳述到「家累」這點，反而大多是從自我感受到工作環境貧乏、自我價值與工作失去連結的情形為多；甚至在身為母職後的女性，「家累」並不阻礙他們移居鄉間。

5-1 角色

在過去幾年來，研究者透過換工、課程參與、演講、農村旅遊的參與中，發現到自主移居到宜蘭鄉村的女性中，除了身兼母職與妻子，因為有了孩子後，希望小孩有更寬廣的生長空間、另類教育環境的女性外；單身女性在我的訪談裡大約佔了 1/3，他們大多擁有不同專業，像是獸醫師、軟體工程師、遠端工作者、攝影師等等，參與務農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生計的主要來源，是來自於原來專業訓練的工作，而其他剩餘的時間，則隨著作物的生長季進行著農務或是食品加工，其中包含了單親媽媽、有同居伴侶的女性與單身女性。另一個族群，則是非異性戀的 LGBT。他們的生理性別大多為女性，包括了女同志、雙性戀以及女跨男的跨性別者。這個族群是我訪談中較難定義她們身分的族群，因為有些人是三五年前是女同志但在近期卻與男性結婚的雙性戀者，也有在訪談中不便表明身分，但



私下出櫃的女同志，更有性別認同是男性，但未動手術的跨性別者，也納入了我的訪談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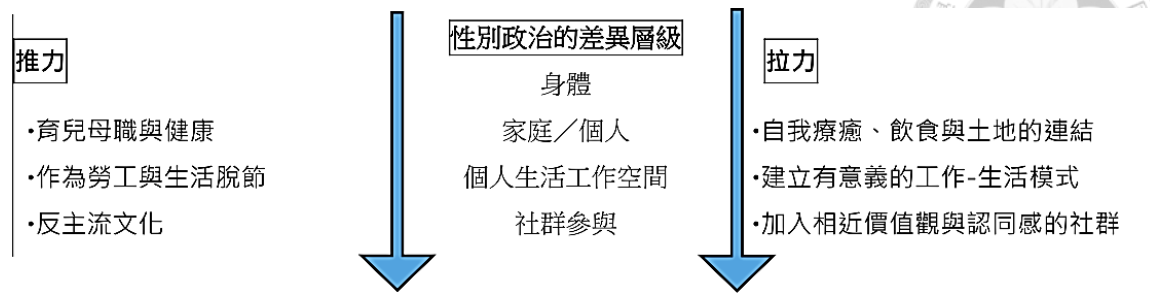
在這樣的組成裡，我們會有一個疑問，就是她們移居到鄉村後，在一個土地擁有者大多為男性的鄉村。她們可以住在哪裡？是要買房買地，還是租借？或者，如果要找土地來耕作，種點蔬菜稻米自家食用，那需要怎麼跟地主作交涉租借？在 Leslie, Wypler, and Bell (2019)的《Relational Agriculture : Gender, Sex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US Farming.》提到了美國女性農場經營者獲得土地的方式主要有三種：透過結婚，與丈夫共享土地；利用丈夫的非農職業收入來購買自己的土地；透過儲蓄或離婚，獲得自己的土地。而沒有異性戀伴侶的女性，則處於不利地位。

我所訪談到的台灣女性移居鄉村者，她們使用農地與房子的方式，大多是靠著參加當地社群或社區大學，透過人際關係承租到土地與房舍，擁有土地者極為少數。在這樣的現實下，對於鄰里關係的維護、在的社群的積極參與，成為她們移居宜蘭鄉村時的必備功課。實體的鄰里關係以及與移居生活有關的實體與虛擬社群，成為了她們踏入鄉村的敲門磚。

5-2 移居鄉村的推/拉力

在移居過程中，可以看到這些女性因為各種原因離開都市，有個人的抉擇，也有台灣社會結構下的推波助瀾。以下是透過紮根理論分析，整理的兩大面向。

表格 6：推／拉影響因素



在下面的小節中，依循著女性政治生態學，在推/拉力因素對於性別政治中的差異層面：身心感知－家庭－局部環境－社群參與，分出幾個面向作為討論。在移居的推力因素裡，從個人的身分出發，討論個人健康與作為母職的需求，皆與身體的發展與維護有關；接著分析作為勞動者，在工作環境中對於自我意義與生活脫節的失序與脫節；最後是討論對於主流文化的抗議。有關移居宜蘭的吸引力上，本研究會討論身體、食物、日常活動與土地、環境的重新連結；其中更進一步探討對於個人有意義與反義的生活模式建立；最後將探討個人參與社群中所進行的協商、學習與支援。



第二節 體現與感知：透過食物與鄉村療癒所需

台灣這波返土歸農(back-to-the-land)的浪潮中，為什麼這些人移居鄉村後，會想要透過耕種農作物，作為他們生活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是住在別墅裡叫外賣，享受著跟都市一樣的物質享受？這很顯然地，這些女性移民透過移居鄉村、租賃土地、種植農作物，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從事或實驗這些永續農業生活的女性，也因為永續農業的性質：資本投資不需要太多。尤其是在獲得土地，機械和資本方面有困難而初來乍到的女性，更容易在經濟上進行，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身心上的需求。這樣的需求，體現女性在移居中食物與生產食物的重要性，並且在「性別飲食模式」和「身體政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5-2-1 健康意識中的育兒母職、疾病與農業療癒

願意付出財力與心力移居到宜蘭的原因繁多，在移居的受訪者裡，很明顯地發現身為撫養孩子的「母親」移居者，往往具有非同常人的執行力。這樣的執行力，以「女性餵養他人的責任」為中心，也透過這套「自耕自食」生產食用流程，消除了原先消費者對於食物來源的懷疑態度。因為現在的生產者變成了她們自己，或是他們熟悉的朋友。透過直接掌握生產的流程與農作物，確保了「食物」(物質)的本真性－友善自然生態，對於家人、朋友或自己來說，成為最佳供給食物者。

在我的訪談者之中有 10 位母親，其中 4 位是單親媽媽。媽媽們為了小孩而孟母三遷的故事，在亞洲文化的脈絡裡，時時耳聞，但是家庭中的另一位-爸爸的角色，卻常常在這樣的敘事脈絡下缺席。根據四位單親媽媽的訪談下，父親角色在育兒的階段中慢慢消失，母親們則從移動/居、選擇教育方式、餐點開始，甚至進一步自耕自食，這些抉擇，其實大多是他們與丈夫的互動協商後，一人所做的決定。在這樣的脈絡下，此處將分析其中兩位單親母親的移動史。選擇這兩位媽媽是挑中他們共同遭遇的現代化風險，面對疾病，進而化為行動力，影響他們的生命軌跡。



Q 是一位非常具有行動力的媽媽，在她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不只是透過自我對於身體「不明疼痛」的鏗而不捨的溯源精神，還有因此衍生女兒的教育方向。

Q 是政大廣電系畢業，任職過許多傳播媒體、與公關宣傳的工作，但是在 2011 年的時候身體產生不明疼痛，找了數位醫生卻絲毫不見效，嚴重時腹部腫脹無法如廁，一直到做檢測後，才發現到自己身體中汞跟砷含量過高，這幾年透過有機飲食才漸漸復原。

經此大病之後，為家人慎選「食物」成為她的生命課題。曾將擔任過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有機驗證)的秘書，也因關心食品安全而參選了女兒學校的家長會長參選，改變了學校的營養午餐，提供的基改豆類製品，全面改成使用非基改黃豆的選擇。根據她對人生的安排，以及女兒的教育發展。在我經歷 Q 在 2014 年擔任綠黨基隆市市議員的選舉中，最想了解的是「什麼因素造就了明 Q 八年來積極尋找適合自給自足與教育女兒的生涯發展呢？」

在訪談中，Q 提起歷經生病與復原的過程，她分享：「我本來就喜歡種

東西，然後當我接觸土地的時候有一種心靈很平靜的感覺，然後在我中毒之後，我覺得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我覺得，體會到沒有食物一定會死，沒有錢不一定會死，所以我認為食物才是人類真正需要的。(Q 2014/06 & 2018/2)」在這段敘述中，不僅僅只是宣言，還是她行動後面的基礎。在這樣的自我定位後，因為與先生對於食物與育兒的步調不同，歷經離婚、擔任國小學生會會長、改革學校午餐，甚至擔任綠黨市議員候選人。這些行動，是她對與自我定位後的轉折，從一個原有的第二輪班母親，擴張到對於公共社群的第三輪班。

甚至在落選之後，在社區裡經營課輔的空間，想將自學的理念分享出去，

Q 自述：「有嘗試自學，然後我們在社區租了一個空間，也把自己的資源分享出去。後來我們發現，這件事有點衝擊社區內家教班...後來離開基隆，就是沒甚

麼夥伴。然後女兒之後也要升國中高中，後來想到宜蘭找體制外的學校。(Q 2014/06 & 2018/2)」但是發現不管是經營社區農場，或是成立社區學習空間，周遭的地主、家長或是社區居民都不能理解她的想法跟理念，後來則輾轉成為了華 X 福中小學的營養午餐秘書。

人生至此，跟興趣與育兒連結在一起，甚至因此透過學習農作與教育，擴展了人生的不同專長。對於明 Q 口中有共鳴的支持團體-慈心華 X 福中小學，她表示：「覺得有很多資源在華 X 福，尤其是教育有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關注，可以很放心的把孩子放在學校，心就放心下來。農業環境上，政府有這樣的計畫提供你的申請，而且到處有很多的有機會租土地，基隆沒甚麼機會，出租的租金也很貴。我在多年前就講說要推動食農教育，也嘗試把華德福教育的理念跟(學校家長)分享，發現他們很排拒。(Q 2014/06 & 2018/2)」因此，居住在基隆，除了發現家長們對教育的期待非常傳統，找不到共鳴，其他教育團體，也比較偏重某些議題的情況下，她帶了女兒來了冬山接受教育。

在 Q 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結構上對女性的不明疼痛與其國民教育的侷限性，藉由病症-重金屬中毒事件，將身體的折磨化為動力，打破了從傳統家庭進入公領域倡議的門檻，接受成為綠黨市議員候選人，並認識與學習各種農耕方式，以自耕自食確保食物來源的安全性。我們可以藉此感受到身體病痛而促成的各種相關的事業與生活型態，透過學習、實踐、移動/居、租田耕作、成為華 X 福學校午餐秘書。疼痛與疾病的力量，改變了 Q 熟悉的生活方式，以另一種方式跨越從家庭，擴展到社區、學校。

在身體政治生態學裡，可以發現經歷過病痛的經歷，讓女性在育兒的過程中戒慎恐懼，為食材與成長的環境精挑細選。這一小節中所論及的女性，皆有這樣的共通性：因為疾病，透過不同的機會與社會參與，Q 的情緒/情感能力不僅成為她賴以生存的能力，甚至讓她熟悉移動/居的地理範圍，從基隆移居到貢寮，接著又移往宜蘭。在這樣的自我定位中，她如魚得水般與各個農耕、教育社群交流，

來往於基隆、東北角到宜蘭這樣的移動/居中，進行自己人生中的旅途與創建。

另一位母親 J，在她的移居中，也歷經了疾病與育兒不同階段，讓她選擇了移居鄉村。J 從學生時代就喜歡登山、接近大自然，後來到 P 大的野生動物保護研究所念碩士，當時有個論及婚嫁的男友，因驟然檢測到罹癌癌症，在三個月內迅速離世。這件事對她的影響很大，甚至影響到她的學業中斷。男友的罹癌與驟逝，也是水牛開始接觸永續農業、關心食物議題的開始。後來在台北從事記者與設計產業，並結婚生子，歷經離異，最後在宜蘭暫居。

經過生子的這個過程的水牛 J，毅然搬離台北這個環境，希望在教育、飲食上給孩子更有品質的成長環境，於是來到了宜蘭。孩子的出世，成為她移動/居中，主要的動力來源。她在臉書文章裡表示：「一直以來都在經濟不寬裕的情況下，咬著牙幾乎只買無農藥化肥的食材，尤其是我們的孩子，從還在我肚子裡就徹底落實全有機的飲食，偶爾的一次外食就會讓我很有罪惡感，這樣一個從小吃有機長大的孩子，幾乎不生病、就算生病也不需吃藥只靠自己的抵抗力即可痊癒，我不敢說孩子的健康全然拜有機飲食所賜，我只是不想要讓他這麼小小的身體，就要開始承受農藥、化肥等不天然的物質。(J 2017/5 & 2018/8)」

在她的述說中，顯示的不只是一個母親對於自己孩子的照顧，甚至是懷抱著對於慣行農法的警覺，在母親這個角色的職責下，排除這些她所認知與學習到有害孩子健康發展的農作方式，而購買有機食品，但是在價格價高的狀況下，她選擇以自我勞動的方式確保與掌握自己可控制的食物來源，在這期間也因此學習、參與倆佰甲社群。

她在訪談中提到：「無法全然負擔有機商店的食品開銷，為了省錢所以決定自己種，我沒有錢可以供養父母親，但是起碼至少我可以讓親人吃得健康。小孩剛出生的 1-2 年，我幾乎每天都會在家跟小孩吃飯、做飯給他吃，我種的東西，



真的就會在餐桌上出現，就是一種透過生活而務農，那種務農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生活的品質。務農對我來說不是表面那個東西，我要的是這東西可以帶來情感上的支持陪伴，像我小孩。他也會想吃我煮的，我偶爾會帶他外食，但是會跟他說這食物怎麼樣，雖然很好吃，但有那些東西對我們身體可能不是很好的……(J 2017/5 & 2018/8)」在育兒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同於西方脈絡下，另類農食網絡的其它參與者。在過去另類農食網絡(AAFNs)的研究中，分析參與者大部分是受教良好的女性、白人、中產階級。但是在本研究的脈絡裡，許多育兒女性或是單親媽媽，在社經環境不如此充裕的情況下，移居鄉村，為了獲得安全與優良的食材，甚至扮演生產者的角色。這樣自耕自食的族群，時常因移居鄉村，職業選擇有限，面臨經濟收入不穩定的情況，以參與社群互助協力的方式，獲得對於下一代成長與飲食的保障。水牛 J 也在這個移居鄉村的環境中，透過種植、烹飪、養育小孩、經營網路銷售平台，有機會細心呵護小孩與自身，找到可以合作與生活的方式。就像水牛在銷售宣傳的文案中寫著：努力的接納自己的缺陷，努力的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努力的找到自己與這個世界合作的方式…

(J 2017/5 & 2018/8)

這個部分討論當中，可以發現疾病的陰影與風險，雖然在一開始在兩位女性的角色中，扮演很強的驅動力量，從個人擴展到建立家庭後的地點選擇與職業選擇，不同女性所投入的時間跟精力各有不同，Q 在這樣的脈絡下，甚至以此為業，所交往、協助的社群與朋友，皆與農法、食農教育有關。但是 J 就不一定如此延續，在小孩稍大之後，她又回歸自己的專業面向：攝影與設計，在農業上的心力相對來說比較少。



小結

上面提到的這兩位單親媽媽，搬遷到宜蘭的最主要原因是為了小孩的成长，從食物到學校的選擇。不只因為鄉村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提供孩子在幼年階段對於空間認知的探索，還包含了日後對於體制外與實驗學校的選擇(J 的孩子後來選擇了以體育活動為主的實驗小學)。在宜蘭認識的許多返土歸農的女性，不少是因為孩子成長過程中，在體制內的都市學校遇到一些限制與困境，輾轉轉學到宜蘭的實驗學校。而轉學過來，最先要考慮到的是家長自己的生計來源，有些女性的另一半，在都市或另一個國家有足夠家庭所需的有薪工作，因此大多隻身一人，甚至到了孩子 18 歲成年後，就辦理離婚。而本節所提及的單親媽媽，很大一部分需要獨立賺取生活費之外。對於社群提供的友誼支持與生活層面的協助，讓她們更大的層面上與在地社群互動來往，是本節採錄兩人訪談的主因。

5-2-2 自身的失連與再連結：與土地、農作物、食物的互動

我們在「另類農食網絡」出現的討論中，時常論及食物與農作在四種型態上的再連結：消費者與生產者在食物生產上與土地的連結；消費者、產銷通路在治理管道上的發聲；食物與自然性的連結；以及生產者、生產者與政治代理機制的連結。(Winter, 2003) 而在台灣「返土歸農」(back-to-the-land)運動的逆都市化的移居中，也呼應著自身對於生活空間、工作型態、自我認同的再連結。

在訪談者當中，相當多的人是「從工作、生活空間對於自身的失連」出發，透過工作價值與環境、身體、食物的重新連結，觸發了她們移居鄉村的強烈動機；甚至透過生產農作物的行為，支持公民社會中議題的倡議與參與。在有關人力資源管理、企業管理的研究中，可以時常發現運用「社會交換理論」來進行員工離職的討論，增強歸屬感、信任感等企業文化的營造，例如：謝琇玲，侯韋光，吳靜萍，and 施廣南 (2018)的研究中提到獎酬回饋並不能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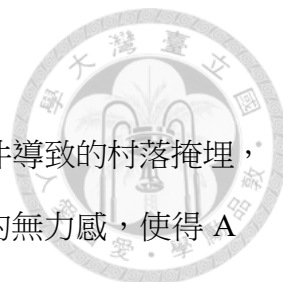
加員工的工作投入，反而是職場特性與文化，造成員工身心傷害，對工作無價值感，甚至離職。企業組織制度層面上的互惠在我的訪談對象中，少有提及。很多人是透過工作環境的身體感知、工作投入量過大導致生活匱乏等等因素，使我的訪談者踏出職場，尋找生活與工作平衡的方式。

我的訪談者當中，A 是最早進到宜蘭鄉間務農的一位女性，除了是倆佰甲的創始人(創始期的四個月後拆夥)，也是農委會第五屆的百大青農。在 2009 年之前，還沒成為全職農夫之前，她從事許多工作，包括：政府部門約聘員工、服飾店店員等等，小時候發覺自己的父親花了许多時間照顧原生家庭的姊妹，導致子女在經濟與教育上較缺乏關照；出社會後，反而發現可以把自己的心力貢獻在社會大眾身上，因此參加了一些公共團體的活動，像是莫拉克風災的時候，到南部協助災民，也參與台北「人民民主陣線」的社會運動，關注性別議題。

在這些社會經驗中，A 異常感受到深刻勞動異化的感受，像是在政府公部門擔任約聘人員時、或是服飾業的工作，感受到了這們工作只是換取薪資，對於個人職涯或是價值上，喪失連結：在這幾份工作中，不知道自己在哪個位置，是還蠻不舒服的，後來有愈來愈不舒服，就是你是小螺絲釘，你是哪一個位置的螺絲釘或許這個我好像不只是小螺絲釘，那是甚麼？這個東西之前沒有太清楚啦！就是會不太知道自己是什麼。一直到台北，就更明顯了，台北的那個生活空間。(A 2014/5)

在工作喪失意義的同時，當時發生了莫拉克風災，A 在災區擔任志工的過程中，感受到了原住民，為了配合政府防災措施，被迫離開山林與家的那份身體與土地間的剝離感。A 表示：

同一年發生莫拉克風災，也不知道誰先誰後，就是我有想要去鄉下種田，到莫拉克風災災區，會看到人的房子被沖走，會難過會傷心，會沒來由的傷心，雖然根本不是我的房子。風災有讓我說不上來，跟土地比較有靠近的強烈



欲望。(A 2014/5)

A 在歷經工作中的身心分離，以及原住民發展史上極端氣候事件導致的村落掩埋，撤村政策讓源村落的族人無法回到自己的土地。對於災難造成的無力感，使得 A 興起紮根土地耕作維生的念頭，把災民失去土地的失落，置換成自己靠土地維生的渴望，並化為行動移居宜蘭。

那時候就是想要換一個環境、工作，……這邊(宜蘭)遇到的人，會覺得人生不再是以一般傳統社會價值覺得你要有收入，去評價這些東西……還有每個人興趣不一樣，可以有很多交流跟收穫。

(A 2014/5)

這樣的過程並非僅限於 A 的服務業當中，在獸醫師 I 的身上、或是社工師 F 身上發生的是工作與生活的脫節、工作價值與自我的脫鉤。I 是獸醫師在工作七年之後，深深感到自己的生活在工作當中消失了。

I：我那時候想要離開台中是因為，我畢業工作 6-7 年了，然後我覺得我的工作，全部的時間都花在我的專業知識上，包含進修...一天大概要 12 個小時花在上面。工作通常無法準時下班，或許需要緊急手術，長時間下來我會想要有其他生活。(I 2018/8 & 2019/2)

在移居宜蘭之後，I 進一步地體會與生活相關的技能與學習，並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不少的啟發，跟著村裡的阿母學習了做臘腸、臘肉，以及各種節慶食物，因此習得各項製作食物的方式，甚至開了一間餐廳(現已歇業)。她表示：在這邊認識的除了專業之外，有些人發展興趣的方向，也許是自給自足。因為這個目標，他也許去學很多「生活技能」，比如說，我們以前的技能都是「專業技能、工作技能」，可是，這邊很多是學習「生活技能」，因為你想要什麼，而去學習製作東西，而不是去買。比如說，你有種菜，可以跟別人交換東西，或



者是作一個工具，

我：會跟其他人有互動連結。像是學加工品、木工……也會？

I：沒錯木工、編織、木工、因為耕作需要一些工具，或者是農業其實很多專業在裡面…… 比如說，你有種菜，可以跟別人交換東西，或者是作一個工具，會跟其他人有互動連結。覺得金錢的重要性沒有這麼高，……在城市裡沒有其他生活娛樂，你大部分看到的東西都要用買的，可是在這邊像是海邊、山上是不用付錢的。你去那邊得到心靈的療癒，可是那個不是你付錢才能得來的，用錢買的，我覺得對物質的需求比較少。(I 2018/8 & 2019/2)

在 I 的鄉間生活中，習得了許多她之前所提及的「生活技能」，以及因此而建立起與在地居民的友誼。因此種稻、種菜、學臘腸等等對她來說。更是與人群與生活連結的媒介。接觸土地不僅是自然，人際關係也因此開展。

我參與的研究田野裡，不少移居女性是對於現代工作對於身心的貧乏而移居鄉間，她們透過感知身體與環境的互動，而發出警訊與不舒服的感覺。因此對於周遭環境的感知，使得他們的身體亟欲在離開都市的鄉間開展。

在剛認識 M 時，曾經詢問她離開上個工作來到台北的原因，她隨即表明，離開台北都會區，跟工作地點有很大的關係。身為程式設計師的她，從事的是跟產品設計有關的程式設計以及網頁維護，每天都會接到不少客訴，客訴人員會將這些產品的意見，彙整給設計師，做產品上的調整。

在這樣的工作中，M 表示，這是個從身體到心智都極為痛苦的過程；尤其是工作環境上，因為有恆溫的空調設施，一年四季都要穿很厚的保暖衣物，就像是被封鎖在冰箱裡一樣。我一整天都在那個內湖空調大樓待著，待了五年，身體悶在那裏面不是很舒服，根本無法感受到春夏秋冬…我以前的工作其實是很痛苦的，可是其實那些事情看似其實一點也不辛苦，但是實際上是很痛苦。以前的工作，就是看你願不願意去做，人家要求妳，這個過程環節是很

痛苦的，還有那個環境。(M 2017/02&05)



除了空調影響了 M 的身體外，還有作為程式工程師，工作上的標準則是不斷由領導者判斷、消費者的客訴，作為她改進的產品的方向。M 她對於登山有極高的興趣、熱愛處於大自然的懷抱中，但是工作場所的冷氣空調、工作上要求的應對讓她有換個工作的想法。從旅遊開始，她接觸了許多「以工換宿」的旅行方式，像是去新竹永續農業的協助；到花東地區的國小伴讀從事課輔協助；透過生態登山學校的培訓，陪伴失學的青少年等等。她透過非市場交換的社會交往，慢慢選擇則以永續農業為主，邁向農耕社群的生活方式。

接觸永續農業跟永續生計，不僅僅只是與找回身體舒適的感受，「療癒」是另一個移居鄉村的原因，在療癒的過程中，鄉間的農作、農作物的成長、生活中的製作食物，在情緒跟身體上，皆成為移居者從受創而療傷的過程，在訪談的過程中 A 表示：農業可以療癒，農業的包容性極大！你不會覺得自己沒用。你想要賣東西就可以賣，想種東西就可以種，甚至你不想跟其他人講話也可以，你就在那邊拔拔菜都可以活，我覺得農業本來就...，我不喜歡就是有人在裡面獲得高額利潤，農業本來就是很棒的一個選擇，甚至還有人來做園藝治療，甚至是可以療癒的，可以生存又可以... 不該只是一個產業。

(A 2014/5)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現草木人對於農業所具有的包容性與成就感是相當滿足的，也讓她把對理想生活的想法可以實踐在移居當中，撫慰自己在務農前對於無法掌握命運，必須接受社會運作邏輯的無力感，透過農作物的生命力反而讓她找到自己的地位，這樣的體悟不只是草務人提及。鄉村環境與農作行動帶有療癒身心的功能，並促使了移居女性的前往。像是 J 就發現了農作帶給她



的穩定力量。接觸永續農業這個環境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它讓我的，它讓我認知到問題可能不會解決，但是情緒可能被解決，很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但是在那個當下，妳可以讓情緒過去。我覺得在農業這個環境，像我之前情緒不好的時候，大概就撿個福壽螺，我心情就好多了，到大自然走一圈，情緒就可以被解決了，到這個環境已是繼續幫助我撐下去，不然講白一點，誰不想放棄自我啊？...

(J 2017/5 & 2018/8)

在這樣的體悟中，農作中的撿螺、大自然的環境，成為一個轉換心情的媒介，在進行這件事當中，身體透過與生物的互動，轉移了人類本身的情緒過度，就如同 J 所說的，情緒隨著對於生物的分心與勞動的過程中，情緒反而離開了，雖然問題尚未解決，但是也解開了情緒藉由勞動與互動的過程中移除了。

前面所提及的連結，大部分是個人對於食物、農作物、農作勞動、土地的互動；是個人對於物質與身體互動體現的再度連結，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這些移居者也開始從社群中的連結，從自己原先在現代職場上找尋與人互動學習的開始。許多移居者在訪談過程中時常提及「一起、共同」學習、協助的過程，並認為在都市的互動上往往除了工作關係之外，很少有社群感。但是在一個有不同生活技能的宜蘭鄉村裡，彼此共同分享與協作同一件事，是移居新村前少有的經驗。在 I 社群網路中的文章提到了某年冬天學習臘肉的過程。標題是「試著煮一鍋石頭湯」，內文提到：莫約三四個禮拜前，村子裡就有一些要過年的輕微騷動，上禮拜終於火力全開大爆發了。雪球開揪，加上魚小姐，橘子，May，小心，我跟 YO，組成燻肉大隊，大家分頭到市場搶肉，借了燻肉教母王姐的爐子，找了干蔗的贊助者，經過三天兩夜的醃製入味，在上禮拜一開燻。莫約傍晚時分，第一爐進桶，算一算一桶肉大概兩小時上色才夠，在小佳的田寮外面，能掛的地方都被掛上待燻的肉了，看來要一路燻到半夜後，不如來煮個火鍋提早圍爐吧，可是



現場的料不多，只好干脆來煮個石頭湯。跟小佳討了昆布與紅蘿蔔、洋蔥，起了一個湯頭就要放上桌，橘子一看，跑回家拿了自己種的高麗菜跟切好的菜頭，還帶了一盒肉片回來。阿由說早先滷了豬耳朵，一起上桌。移居鄉村反而讓這些女性找到志同道合的學習夥伴，在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這樣的一群人做同一件事，也帶給了移居者在都市分工緊緊有條的秩序之外，更多共享相同價值觀的人際互動與連結。

小結

在這一節裡，我們可以發現有許多工作上的成就感無法激勵女性工作者、環境上的不舒適等等，在感知這些限制之後，她們透過旅行、農作的方式，發現工作意義還是有可能與生活連接的、工作環境也有可能選擇更與自我感受連節的戶外空間。更進一步的，從作物的發芽、收穫中得到了滿足與成就感，這些成就完全不同在公司領固定薪水又被多方要求的自我剝奪感。



第六章 另類農食網絡中的性別與永續生計

第一節 關懷/照護經濟與身體、情緒

隨著替代農業食品網絡（ AAFN ）和以身體為中心的分析手段的出現，將討論身體、情感、食品加工和農業食品相關關照經濟三個維度。作者試圖分析不同的性別關係，以比較實踐中的不同關懷／照護倫理。本節討論女性在農業、食品加工和護理經濟中的情感和體現。

6-1-1 身體、情感與農業

農業接近人類的「自然」技能，需要肌肉和對農作物、雜草、土壤微生物和環境的感知。然而，這項研究中的大多數城市居民都因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和缺乏與環境的接觸而迷失了方向。本節將討論返回土地的女性移民需要如何發展不同的身體功能、技能和感受才能在農村地區生活。以及他們如何參與或試驗這些可持續的農業生活方式。

對兩個案例進行了觀察和分析。農耕經歷改變了他們的身體形象。採訪記錄記錄了兩位接受這種身體變化的女性的話語，儘管她們的身體形象與流行的亞洲女性流行的身體形像不同：「白、瘦、乾淨。」

6-1-1-1 身體與農業

作為一名 LGBT 農民，E 透露，她在 10 到 30 歲之間保持著作為勤奮學生和白領的體型。由於不同的關係和媽媽的警告，E 不得不時刻注意自己的體型，從瘦到胖，再到胖到瘦。種田後，除草強健了她的手臂，種植水稻增強了她的盆底肌肉。每天在農田里幹活的她，逐漸擺脫了上班族脆弱的形象，變得更有力量在農村工作。在接受採訪的時候，E 還需要花一些時間來接受她的新身體形象，這與普通

的苗條女性和白領不同。

第二個案例是 M，在台北做了五年的軟件工程師，在這裡呆了大約四年。M 的身體對工作場所的條件很敏感，這是一棟 30 層的商業建築。M 特別提到空調的溫度讓人難以忍受。無論夏天還是冬天，她總是需要呆在那個冰冷的辦公室裡。M 幾乎感覺不到不同季節的自然溫度，因為她從早上九點一直工作到晚上九點。從事農業工作，搬到宜蘭後，她很快適應了農業勞動力的強度，儘管她的手更臟，甚至更經常受傷。

兩位受訪者都提到了母親對他們身體形象控制的影響。在搬到農村地區之前，E 記得她母親曾警告過她應該擁有的理想體型。M 告訴我，她媽媽見面時覺得她臟兮兮的指甲不適一個女性應有的整潔度。他們的母親對女兒身體的期望，在兩位遷移到鄉村後，都很少影響她們管理身體形象。相反地，即使是一些缺陷，也讓她們在務農方面感到堅強和專業。她們發現身心通過農業得到了更好的協調。儘管身心似乎比以前更加重要，但它們並不是農村生活方式多樣性的要求。

6-1-1-2 情感與農業

儘管人們可以通過醫療或鍛煉變得更健康，但有些人從自然環境和食物中恢復過來，特別是在農田和農村地區的可持續農業中。農業不僅是為消費者種植農作物，還為人類，尤其是單身母親和 LGBT 女性提供營養和心理健康。對於單親媽媽來說，孟母三遷的故事在亞洲歷史上屢見不鮮。它強調了生活環境對母親和孩子的重要性。同樣，對於 LGBT 農民來說，農業和農村地區為重建他們的生活和社區提供了能量。

該研究採訪了 14 位母親，其中 6 位是單身母親。研究人員發現，許多婦女為了孩子而遷移到農村地區。首先，農業生產最安全的食物，並為兒童的活動提供充足的農村空間。此外，農業在情感上安慰了單身母親的家庭。根據對六位單身

母親的採訪，移民涉及尋找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為孩子選擇替代教育方法。

為了更好地研究耕作與情感支持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員隨機選擇了兩名受訪者來分析相應的成績單。第一個分析是基於一位單身母親。Q 是基隆活躍的女性移民之一。由於身體原因，她多年來一直承受著“不為人知的痛苦”。她看過很多醫生，直到體檢，發現高濃度的汞和砷是有毒的。因此，她轉向有機飲食，最終從疾病中恢復過來。此外，Ming 開發了一種自學的方法來教育她的女兒，以實現可持續的農業學習。

為了說明康復的過程，她分享說：「我喜歡種東西，一摸土地，心裡就安寧。中毒後，我明白食物是人類生存的基礎。沒有健康的食物，人們可能死，所以我認為食物是人類需要的。」這個敘述不僅是對過去事件的記錄，也是她日常實踐的反映。2014 年接受採訪後，Q 擔任家長協會會長一所小學，改革學校午餐。之後，她被選為綠黨市議員候選人。

LGBT 農民 A 的採訪。作為宜蘭鄉村社區的創始人之一，Tea 於 2009 年移居宜蘭。她在颱風莫拉克的恢復中擔任志願者，在此期間 A 見證了人類的脆弱。此外，她意識到在自然與人類之間保持平衡的重要性。因此，A 決定成為一名土地保護者，一名可持續發展的農業農民。她說這片土地可以包容任何生物，包括她和其他人類。在通過農業維持自然循環時，A 可以幫助人們獲得營養。她被土地所感動，讓她願意為土地做貢獻。A 說，在遇到女朋友（他們已婚）和務農之前，她對原來的家庭和工作場所沒有歸屬感。在這種情況下，A 種植的農業和水稻，連接了更多的 LGBT 家庭和社區。

總之，兩位受訪者談到了農業和食物的治療效果。一方面，他們恢復了健康和歸屬感。另一方面，他們找到了理想的社群，並一直致力於永續農業，他們對生活質量的滿意度不斷提高。



6-1-2 在地社群的地方菜與醃製

季節性食品加工/烹飪在台灣文化和食品價值中通常具有特殊的含義。可能是二月的糯米糕，三月的酸梅，四月的潤餅，八月的腐乳，十二月的煙熏臘肉，依次是不同的季節和傳統習慣。在進行季節性食品加工時，它們可能包括一些條件，例如成熟的水果或農作物的數量、密集的勞動、食品加工的經驗和技能。本節將討論女性移民如何通過季節性食品加工參與鄉村生活和農業。

研究者對兩個案例進行了觀察和分析。他們都找到了講述他們在宜蘭的移民生活的過程。I 是一名獸醫，大約七年後移居宜蘭。農業是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她一直是一個愛好農民，並擁有大約五年的小規模企業。從 2015 年到 2016 年，她曾嘗試成為一名餐館老闆。向當地人學習食品加工和手工藝品是她對鄉村的興趣。I 特別提到，她的祖母在她活著的時候，通常會為家人做時令食品加工。在 I 的家庭中，這似乎是一種特殊的技能和文化，代表著她祖母去世後失去了家庭聯繫。

I 告訴我，她可以通過在宜蘭鄉村烹飪和製作季節性加工食品，重新與季節和人們建立聯繫。煙燻培根是她從居民那裡學到的季節性食品加工方法之一。莉莉回憶說，他們把一個煤氣桶做成了一個巨大的烤箱，並用甘蔗作為燃料來燻肉。由於「鴨賞」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她找了一些朋友來做這件事。煙熏食物工作讓她對與祖母有關的食物感到有成就感，甚至她可以賣給她的顧客。當她是一名廚師並經營一家餐廳時，她還將她的美味訓練到不同的有機農產品和多樣化的美食中。她發現大多數顧客習慣於速食，但有些人可以品嚐到對友善農法的食物品嘗差異。因此，她很樂意與顧客和朋友交換美味的食物。

節氣食品加工也與社群和友誼息息相關，同時它可能與家庭和當地文化有關。在第二個案例中，F 曾是台中市的一名社工。然而，她回到了宜蘭的家鄉，成為了一名可持續發展的農業農民和企業主。F 以她的新工作方式將社會工作和農業結合起來，為需要綠色護理的人開發了一座社會農場。在活動中，她對此並不滿意，



直到開始季節性食品加工，她才很難說服自己從事農業。

製作醃李子豐富了 F 的思想，使她決定繼續從事農業勞動。她的家人不喜歡季節性食品加工，尤其是三月份的酸梅。由於李子在三月成熟，於是她邀請朋友一起醃製李子，分別是 LGBT 農民和她的男朋友。她告訴我「他們在兩個桶裡搖晃著混合李子和鹽。為了讓每顆李子都沾上鹽分，他們把它們上下左右搖晃。水桶發出的聲音非常棒，他們對這項任務感到很高興。那一刻，F 表示，她能體會到農村生活和經營小事業的幸福是什麼。儘管在現代社會中，她的原生家庭對季節性食品加工並不重要，但她仍然可以與她來往的人一起創造樂趣。」

兩次採訪都表明，節氣食品既是一種文化遺產，又是一種催化劑，它讓人們在食品加工中找到記憶和安全感，讓自己沉浸在關懷和精力中。這兩位單身女性也反映了農村地區不同的世代和家庭風格，這取決於友誼和居民對當地的了解。它揭示了家庭之間可能不存在家庭繼承，而是在新居民或意向社區中發展。

6-1-3 與農業食品相關的護理經濟體的關懷／照護照倫理

女性移民來到宜蘭，享受自然和農業的理想生活；他們中的一些人在他們的新業務中將他們的專業技能與與農業食品相關的任務相結合。

V 是我採訪中的女性移民之一。作為一名廣告設計師和母親，她擁有一家與有機稻米農場合作的米餅食品工作室。由於她的孩子的特殊需要，即她的一個女兒需要無鹽調味料和無麩質，她在丈夫的鼓勵下生產和銷售米曲奇。她的產品成分來自 3 個當地農場 來自宜蘭不同年齡和有機耕作方式的企業家。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和全職媽媽，自從搬到宜蘭以來，她品嚐了 10-15 種不同的米飯 挑選最好的餅乾做餅乾，並建立了食品加工生產線。

由於孩子的教育和健康，V 搬到了替代教育學校數量最多的宜林，那裡有許多有機農場。 她利用她的才華和平面設計協助宜蘭新的農業食品相關業務。米餅



業務也讓 V 尋找到種植稻米並擁有食品加工設備的在地農夫與創業青年，這些人都成為了他的工作夥伴。大多數作為幼兒父母和注重健康的人的消費者，了解當地有機農場的重要性，並通過她的兒童米餅產品支持了在地的稻農。雖然 V 辭去了台北的工作，但她告訴我，她可以把精力放在糧食生產和孩子的教育上，對這裡的生活方式很滿意。

在我的受訪者中，T 是一位經驗豐富的 LGBT 活動家、農民和企業家。作為宜蘭當地 LGBT 酷兒農民社區的一員。她在台灣首都台北長大並接受教育，但在台灣不同農村地區的 NGO 和 NPO 工作了 20 年。由於一場災難的發生，T 的朋友們在颱風莫拉克中失蹤了；T 決定為她的朋友們耕種土地。農業之初，T 和三位 LGBT 女性於 2012 年建立了一個 LGBT 農場社區；他們與當地的老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繫，並為他們的努力租用了居民的農場和水果農場。

由於農民子孫遠離耕地，這一群體獲得了學習耕作技能的轉折點，得到了老農和父權社會的信任。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情況，越來越多的返鄉人正在為台灣的農村地區開發新業務。六年後，溫決定離開 LGBT 農民團體，加入一個更廣泛的公司，與想要種植水稻、養殖魚類文化和加工食品營銷的人合作。這一決定讓 T 接近了多樣化的農產品食品網絡，包括餐館、連鎖超市和海鮮店。

有許多關於女性為了身心健康、家庭、生態系統和農村發展而重返登陸者的小企業案例。他們的業務不是為了產品的利潤，而是從一開始就關心自己。它成為一個起點和網絡，女性將她們的專業技能，如設計、環境教育和翻譯的能力，擴展到與農業食品相關的工作和社區。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鄉村生活和學習的同時，找到了社區的力量來豐富他們的生活和保護農田，甚至通過改變他們理想的農田形象來影響居民，即乾淨，沒有除草劑的雜草區域。



第二節 性別氣質與勞動地景

鄉間的女性勞動力分配，在異性戀父權為主的鄉間，有哪些展演？我們知道台灣農業裡，機械化耕種的程度非常高，大多數的體力勞動已經由機器所取代，但是在農作習慣、對話交流上，還是脫離不了性別勞動的二分。這裡將分為異性戀女性與L G B T的討論，這樣的分法，可以看出兩者的性別角色中，對於自身性別氣質的察覺與勞動力期許上，因為社會性別的不同，而有特殊的視角與看法，並非單單只為了其性別認同而分類。

6-2-1 異性戀父權規範鄉村中的性別日常

那麼女性的勞動力，在鄉村居民眼中，又是甚麼樣的評估呢。在外來女性的移居經驗裡，鄉村裡的勞動力分工，往往呈現「性別分工」的牢固分配。例如：水稻田與菜園，就有不一樣的性別勞動分工；面積小的「菜園」，屬於女性的備守範圍；面積大的「水稻田」，則屬於男性的勞動空間。

我：那妳在這裡種田時看到的女性，會比男性的勞動力少嗎？

M：阿母級的，會出現在田裡的都是那種小小的菜園，或是，水田的話，基本上看到男生，很少看到女生，如果是大型耕作基本上都是男性，巡水田的話，也是男性，阿姨的話，比較是幫忙趕鳥啊！然後家裡旁邊的菜園種菜啊！

我：那這裡很多很多外地來的女生種水田？

M：對，所以他們當地人都會很驚訝，他們都會過來說，不要做這個，趕快找一個人嫁了，幫妳介紹男朋友啊！

(M 2017/02&05)

上面這個對話，可以發覺就算鄉村土地看不出來是誰擁有的，但是透過在土地上的勞動群體，很快就可以發現大面積的水稻田勞動者是男性(一分地)與小面積菜園

的勞動者是女性。而許多「返土歸農」女性移居者的加入，則打破了這樣的性別分工地景，帶來了性別鬆動的可能。



但是移居女性與當地不分性別的居民互動中，高頻率圍繞的話題就是「成家立業」這個異性戀父權社會裡最極度關心與焦慮的話題。訪談者們為戲稱「婚家調查三部曲」：第一、二步調查學歷與財務狀況，如：「你高學歷女性怎麼來這裡？」、「來這裡的有賺到錢嗎？」；接著是最重要的第三步調查：「結婚了沒？」、「我要幫你介紹對結婚對象(甚至不是男友)！」、「我親戚的小孩不錯喔！要不要認識一下？」這些問題通常每天輪番上陣，但是因為搞不清楚女方的性向或感情狀況，問了三到五年之後會漸漸放棄。有位 LGBT 女性移居者生動地描繪了父權社會裡對於女性移居者的重要期待：「單身女性來種田，一定要娶回家，但是要幫你配一個，叫我或我認識的小孩子(男性)給你娶回來，覺得是人才要帶妳回家，增加勞動力。老人家其實很喜歡，想要女生作他們家媳婦，所以看我們怎麼看都很開心。(T 2020/2)」 「但是問題到最後，就是有沒有辦法納為己有，大家就會不厭其煩幫你介紹婚姻。(T 2020/2)」這些好奇的探問，主要是鄉村面對了嚴重的青壯人口的外移。而移居而來的女性，通常是來鄉村「療癒」自身狀況，雖然雙方期待不一至，但是移居方有租地需求、與土地、生態互動的需要、學習在地知識的熱情；在地居民則有青壯人口的流失、地方知識與食物技藝傳授無人，下一代興趣缺缺的焦慮下，也慢慢互相習慣或是包容了雙放的存在。

不同類型的土地上有性別差異的勞動者之外，租賃土地的性別角色象徵，則是以一個家庭的男性作為主要的角色，在土地承租、生活上作為家庭的負責人角色，這樣的象徵，主要是以異性戀家庭中的丈夫作為象徵性代言人的鄉村社會中，時常出現慣例。像是 C 租地，在承租與租賃方，都會提到我的「頭家」，作為溝通的主體，但是實際進行的人是女性。

C 表示：我的一個地主是阿母(年長女性稱呼)，在傳統觀念上，她習慣老公是「頭

家」(家庭裡的領導頭子)。但這裡持續有女農出現，跟她溝通的時候我會順著她的話講，說我頭家 XXXX，但是租田的人是我，比較有差別的是這個部分。同時，已婚婦女也是個優勢，我站出來，旁邊有一個被認可信任的男人，所以他們或許不覺得我可以(種水稻)，而是覺得我老公可以。

(C 2016/11& 2020/2)

租地跟誰租，或是要透過那些中間人來承租土地，在鄉村中也是一門學問。C 剛開始從 NGO 的職員，轉型投入農業後，主要是透過倆佰甲的賴青松與楊文全先生，兩位做為集體承租土地的中間人，透過倆佰甲協助土地租賃的成員，是很難知道她自己所租的土地是屬於哪個地主的水田。這養的方式對於當時在剛剛進入水稻領域的新人來說，這是一種集體租地，也免去了找人、認識當地人際網絡的時間。但是這樣的方式，也造成新農夫在農業保險認定上的困難，也讓後來發展以水稻為主要生計的移居者，發現直接與當地地主交涉的重要性。因此，許多獨立經營水稻的品牌農夫，大部分會略過倆佰甲的中介，直接跟地主進行交涉。

6-2-3 性別多元化參與的鄉間勞動

在「性別氣質與性別的勞動差異」上，異性戀與 LGBT¹⁰的女性勞動者則略有不同。兩者在勞動力的描述，以及與在地居民的互動上，有稍許差異。

在 LGTB 女性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他們認為自己的勞動力跟在地農夫的勞動力相差無幾，強調女性的勞動力雖然不及男性，但是在水稻全面機械化的實際操作，女性在不同階段的勞動上，生理限制較以前少很多。例如宜糧號的社長 T 就表示：

「回應女生力氣比較小，這是真的，但是假設你在搬穀包（收割完稻米後，要趕快烘米，接著送到碾米場儲存，其中搬運中的稻米稱作穀包），你可以把它裝成二十

¹⁰ LGBT 族群，是由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等群體所構成的群體。此處訪談群體中不包含生理男性，也就是男同性戀與男跨女的跨性別者。

公斤，就不要弄成 50 公斤，這種風氣就沒有必要.....就是你可以調整、調整的你的負重。跟烘穀場明講，那我們大概會把自己訓練到差不多的負重力，滿 Ok 的吧，但是如果真的覺得太累，10 公斤一包也可以，不需要逼自己，不用這樣比。(T 2020/2)

這裡強調搬運的重量，可以自行依體力調整，不要逞強搬太重，否則請人搬運也是可行的方法。另外，由於水稻的高度機械化，農機的操作也是女性可以駕馭的，只是這些的農機設計大多以男性身型為考量，其實可以有更多輕巧型的選擇。

T：第二件事情也是農機具的部分，我覺得相較台灣，日本性別也是很僵固，可是他們就發展很多比較輕巧的農機，女生駕馭起來沒有很困難。所以我們也是一直在呼籲政府，就是你應該要多開放一些日本的小型農機。近來因為女性參與務農的很多，每一台都那麼大，搞得大家都好累。

我：大型機器，感覺像開車嗎？

T：是的，所以體力來講還好，沒有什麼問題。

(T 2020/2)

身為LGBT的T，自稱早年以為自己是女同志，但是到了四十多歲的階段，認為自己的認同其實是男性，自2013年以來在土拉客全心投入農業的一、二級、三級生產，目前離開土拉客創立宜糧號，並拉了更多人參與稻米、米醋、米酒、黑豆醬油、豆腐乳、花生醬，與季節生鮮農漁產品等等的生產合作社。

而另一位自2009年就進行水稻生產的A，其他人號稱是早期為女性勞動力立下口碑的她，則是以水稻生產量的豐收，打破了慣型農夫對於自然農法低生產量的看法，被在地農夫肯定為非常投入農業生產的女性農夫。

在異性戀女性的勞動參與上，則較為相似於前面「常規的異性戀父權鄉村」的日常生活展演。像是在與代耕業者合作時，由於這個產業大多由男性擁有農機，並

參於實際的育苗、打田、碾米等等各個階段。展現出來的性別是充滿陽剛類型的傳統男性代表，特徵是勤勞、踏實、協助女性。

C：與代耕¹¹大哥合作的話，女生是稍微吃香，他們會把你視為柔弱無力的需要照顧的人，他們願意付出更多，可是相對代價是她會把你視為沒有能力、無法判斷的人。雖然他認為這裡評比很好的有幾個是女生，她們早我三五年，已經展示了女性農夫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C 2016/11& 2020/2)

C這裡呈現出代耕業者(男)對於工作表現良好女農的相挺，另外，陽剛氣質裡面讓她覺得在農村務農的女性像是有特權一般。但在另一個性向上的女同志D，則表示代耕業者對她們這些女農，時有政治不正確的語言：「因為我們女農常常集體行動，跟代耕大哥接觸的時候，他常跟附近居民抬槓，說這群女農是我罩的，是我的女朋友們，歸我管啦！(D 2016/3 & 2019/6)」 而其他男性的觀察，則會認為女性在農村工作，其實是有優勢的。像是楊文全就觀察到：「女農在這裡也有優勢，這邊都是男生，像X加X（一位女農）啊！對代耕業者，撒嬌。相比之下，我們就輸了，只好自己去開農機。她也非常款待代耕業者啊！這些代耕大哥們就很喜歡跟妹妹們聊天，我們的田就隨便呼攏過去，她的田就很搞工！

但是我們在這個較多人從都市移居的鄉村中，可以發現，從事友善農業的男性，並不僅守著性別疆界，也從事性別越界的作為。比如 I 就提到：「有的人會是彼此幫忙帶小孩，交換帶小孩什麼的。可能今天是這個爸爸帶好幾個小孩，明天可能換另外一個。在員山，同樣有家庭的話可能會這樣，農務上會互相幫忙插秧曬穀什麼的。或是搬運東西。(I 2018/8 & 2019/2)」 這些像是帶小孩、執行學校農食教育的課程裡，大多就沒有甚麼嚴格的性別分野。但是許多人也提及，農

¹¹ 在水稻產業中擁有農機，包辦水稻耕作過程中育苗、打田、烘穀、碾米、收割的重要角色。

村基本上是賤斥男性從事像是帶小孩、烹飪這類型的事物等等的陰柔性質，很少有人會在性別二分嚴謹、不可越雷池一步的鄉村文化中進行性別角色與氣質的越界。恐怕也只有從都市地區移居來的移民敢做這樣對性別刻板印象的顛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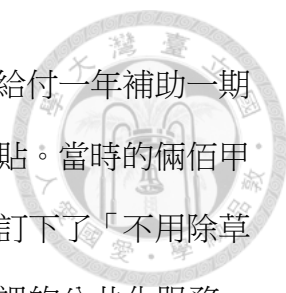
第三節 移居中的社群參與合作

6-3-1 女性移居者的社群與社運參與

這一節主要呈現裡面歸農社群中不一樣的路線與看法，有時互相合作、有時不時因理念差異所呈現的，其中自 2013 年成立的新農社群「倆佰甲」與其他社群的路線差異。

倆佰甲成立之初，吸引了許多青年農夫或是「返土歸農」前往移居，並鼓勵友善農業的方式耕作土地。這個新農社群的出現，跟許多友善農業、保護土地的倡議者有關。其中的推手之一是 2004 年引進日本「穀東俱樂部」的賴青松，這個模式也是歐美所稱的「社群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主要是在插秧前找一群消費者預付認穀，共同承擔天災風險，等稻子成熟收割後，就把收成的米分配給認股的人。除此之外，2009 年女農李寶蓮(女農討山誌作者，宜蘭歸土運動中最早在媒體對環境發聲的女性)發起「友善小農聯盟」，整合宜蘭在地小農，開闢銷售的通路，讓永續農業深耕，隔年在所相當重視農食教育的實驗學校「慈心華德福教育」，發起農夫市集，並在 2013 年成立「守護宜蘭工作坊」，針對宜蘭農地破碎化與農舍氾濫問題，提升大眾對於農地農用的重視。

從這樣的脈絡來看，可以發現移居宜蘭的「返土歸農者」深深受到上面兩位永續農業的先鋒，對於環境與農業價值的定位，「生態永續」是最大的公約數，強調農業與環境永續並重的價值。本研究的「返土歸農女性」也皆以永續農業的基本關懷施作農業。另外，由於宜蘭特殊的環境特性與地理位置，以水稻農業為主要技能的居民，以蘭陽沖積扇的湧泉，作為農耕的灌溉用水。進入此地的新移民也深知湧泉的重要性，因此大多接受友善農業的門檻。



當2012年農業土地休耕政策改變，從一年兩期的補貼，轉為給付一年補助一期(一公頃四萬五千元)，農民不復耕、不出租土地，就沒有休耕補貼。當時的倆佰甲社團因應出現。A當時有六年的務農經驗，作為創始人之一，就訂下了「不用除草劑、不撒苦茶粕、手工撿福壽螺」的公約，並約定了水稻田流程裡的公共化服務。可惜最後與S合夥人兩方最後在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以及「公田制度的收入回饋社區」未達一致，A分裂出走。而根據S¹²的說法，在A出走後，倆佰甲運作的最大公約共識只剩「友善農作」這個目標，其它對於環境生態的關懷，或是農業政策上對於農地農用的倡議、農業的生態價值，或是租地沒有農保、國土計畫、同性婚姻等等公共議題，皆不鼓勵倆佰甲內的成員參與這些議題的倡議。

對此，S對於倆佰甲的論述是：「他們(女農)關心的是農業、農地、農民、農村，我們(倆佰甲)關注的不是農民，我們這群人關心的不是農業、租地也很少、農民也不是我們的事，但是，農村這件事就跟我們有關了，半農在這邊很重要，裡如我們有埋髮的需求。有誰要來開？農村是個有社會，農委會都在談農業經濟，那農村經濟呢？不是要務農才能來，這個部分才是農業最重要的平台」因此，對於女農在農地農用、青農農業保險身分認定的發聲上，倆佰甲的創辦人S先生、還有推手賴青松先生兩位是順從目前傳統農村秩序。順從目前的以前沿襲的習慣，維持著農地不租契約的不成文規定，以及把租地耕作是為一種單純的田園生活，不涉及青年移民相關的社會保險及土地租用問題。

像是「守護宜蘭工作坊」、「土拉客」、「青天計畫 2.0 宜蘭反空污行動平台」則有不同的理念，因為背後的社群不同，有其多樣的公共訴求。例如：農地農用、青農因土地租約非契約的習俗無法加入農保、空氣汙染、同婚等等議題，大多是女農以及冬山華德福的家長積極參與其中，其他像是倆佰甲的成員在這些議題上相對比較沒有太多意見，但是邊緣的成員也會偶爾發聲。

¹²作為倆佰甲創始者的A與S，在第一年的前四個月S與希望倡議農地農用議題的A(LGBT 農夫)分道揚鑣，表現了同是 back-to-the-land，但卻包含了多樣的理想以及協力、競合、衝突的路線發展。



6-3-2 多元型態的社群經濟與合作模式

研究者大約在 2012 年底接觸宜蘭田野，當時所謂的友善農業農友，從事的像是花卉、蔬果、溫室番茄等等的種植。但是自 2013 年之後，由於倆佰甲的成立，許多返土歸農者進行的則是種植「水稻」。當時的研究者原先對此統一種植水稻的投入頗為不解，來才知因為技術門檻低、又有人幫忙介紹土地，所以選擇受限。反倒是外圍沒有加入的部分移居女性，嘗試著雜糧(黃豆、黑豆、紅豆、紫米、黑米等等)的種植，或是開發黃豆、釀造製品等等。但是這幾年過去，許多人發現稻米價格不高，也出現愈來愈多加工製品或其他產業。

目前在友善農業的經營上，倆佰甲提供的是與宜蘭員山鄉一帶與地主接洽 16 甲地，為投入倆佰甲的人承租土地，以及插秧與收割的服務。後來成員也漸漸發展出其他產業型是，例如：與附近學校合作的食農教育、製作與農業相關的廣播節目、農友刊物、甚至是青年旅館等等類型。

另外，還有像是「蘭陽溪友善耕作生產合作社」推動的是雜糧種植與加工，目前承租了 14 甲土地，專作花生、黑豆、黃豆等雜糧集體友善機械耕作，從播種、中耕除草到收割採取機械作業。其中有 9 家農場、1 家食品加工行與宜蘭大學食品加工系合作，推動大面積生產、共享機械、種植資材等等服務。

其他小型的生產社群則共多元性，像是有聯合銷售稻米、筊白筍、新鮮蔬果、加工製品(麵包、豆腐乳、醬油)的生產組合。

目前這些社群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不以單一作物稻米為主，隨著消費者的需求，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加工產品。



第三節 另類農食網絡的永續生計創建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和生物多樣性流失是全球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而返土歸農的女性移居者，正好因為有生產食物的需求，並採用像是自然農法、秀明農法、B D農法，及其它顧及水資源、土壤維護、鳥類、魚類等等所不同農法所關注的自然資源。原則上不使用農藥、化肥、不使用苦茶粕驅趕福壽螺、利用水位控制雜草等等。皆不脫為永續農業的範圍，雖然細節不盡相同，但各種農法的精神皆是為限度地運用自然資源，將其農業生產的成效達到最高(或不高)，以自然永續的精神發展與農相關的產業，這裡將其視為一種永續生計的創建。

6-3-1 照護自家親友的經營模式

移居女性當中，大部分的人是把自己先前的專業工作與生活結合，把務農當作生活的一部分來經營。多數人是以多工兼職的方式與農業有不同的生活組合；相較之下，以全職務農的女性，大多以在維繫朋友的方式經營消費社群。

6-3-1-1 多工兼職的生計組合

本研究終歸原田居的女性，大多並非我們印象中的青農，生活以農業收入維生。多數人是以「返土歸農」(back to the land)的方式到鄉村生活，接受永續農業作為生活與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收入可能來自非農產業，或是靠著先前的存款維持生活，有許多多元的生計組合。在這個脈絡下，研究者更專注的是探討這些移居女性對於自我、家人、社群、土地、生態的連結過程。

選擇多工兼職作為生計的女性，大多是帶著自己的專業進行移居的。像是 J 最主要移居的理由是因為懷孕，加上親友因為重大疾病過世。因此讓她對於生活的環境、空氣與食物相當重視。但是在小孩三歲之後她便以自然攝影、買賣手工燈飾與



農業作為生活方式。在農業生產上則仰賴與友人以工換工，例如他們有婚禮攝影、廣告影像等的需求，她也以需要人手幫忙水稻種植，作為她生產稻米的人力雇用。

「我：你的行銷都是怎麼進行？」

J：大部分是朋友買，或是他們自己公司團購，我只也只有兩分地，我八月收成，九月就賣完了。」

「因為從事攝影需要很多事前的準備，可能需要看很多作品、需要很多想法、也要行銷。小孩四五點下課回來，就是陪他。」

我：那你跟老公離婚後，在農業勞動力上會發生改變嗎？

J：一定會！剛好是因為有吳XX幫忙，如果她沒有幫忙，我今年大概不會種了，我是說米的部分，我幫他們拍照，他們幫我田裡的事情這樣，幫他們拍婚紗，他幫我**田裡的事**，就是用各自的專業去交換，以務易務，勞務的務。」

「我種的東西，真的就會在餐桌上出現，就是一種透過生活而務農，那種務農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生活的品質。我不是把務農跟家庭拆開，我覺得這兩個是一體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家庭是這個社會最基本的。」

(J 2017/5 & 2018/8)

另一位女性 I 則是獸醫師，自 2013 年以來就以兼職獸醫或是屠檢獸醫師的方式進行農業，獸醫的工作大約是每週 2-4 天，其他時間則分配在農務上的補秧、巡水田等等。目前對於自己的定位是把農業當生活在經營。

「I：但是我從之前的耕種到現在都沒有間斷，每年都有種一塊田，一方面是自己跟家人可以吃，二方面是，你去耕作的時候，會感受到人跟土地的連結。那個是沒有耕作，生活裡面就沒有那個東西，包含，甚麼時候做甚麼，或是對天氣的敏感，對農產品消費啊！這種東西其實是，如果沒有身在其中，是很難感受到的。」

其實賣米從來都不是我一個生計來源，或是我要做的品牌，比較像是給認識的人吃，也許是朋友或家人吃，因為我沒有這麼多產量可以提供給更多消費者，就像是如果

你有一個菜園種給自己吃，那這樣你不會需要一個品牌。就像運動，就像是你家後面有菜園，就是這種你不需要有一個品牌去賣東西。」

(I 2018/8 & 2019/2)



6-3-1-2 全職農業的生計創業

在移居者當中從事與農業生產相關的移居女性在訪談對象中大約一半，很多人是帶著很明確的使命感來從事農業的。例如茶 A 就有強烈與土地連結的意識，在生活上拋棄都市裡制度化的工作環境，來到農業。而她自己因為曾經在社運組織工作，對與女性、社會弱勢、反核環境運動的議題相當關注，強調以價值認同來經營消費者。

「我希望提供的事我朋友吃得起，然後，我希望是朋友，不希望很多外人來買，因為之後要寫一篇，你吃的米不是不灑農藥、不灑化肥、手抓福壽螺，你買的不只是這個，是我整個人的理念，包含，我反核，如果你擁核，你最好不要買……。你會投力氣在上面，你支持了我的生活等於支持了我的理念，我還關心環境議題、底層議題、永續能源，如果你都不贊成，你覺得經濟都是要開發、要炒房地產，那你還是不要跟我買。不要買你不喜歡的東西，

黃：那會來買米的都是朋友嗎？

A：台灣各縣市都有，只有花蓮台東沒有。我在台北認識的朋友都是作社會運動的，不太煮飯，所以消費量不多，大部分是我自己在蘆洲上養生的課，現在是種子老師，也有一些朋友，種子老師也吃習慣我的米會跟我買。」

(A 2014/5)

6-3-2 照護土地生態農場與教育

移居到宜蘭的女性們，務農的理由各有不同，雖然大多出發點是提供家人自己親手種植的農作物，農法上大部分是無農業栽培。其中又有幾位是延伸到對土地的情感，

以及生態系物種的照護。



C原來是宜蘭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的專員，早先在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學系擔任研究助理。後來選擇務農的主要原因是在於對於農田毒鳥事件、鳥類保育保育發聲，希望以農夫的身分討論特定的毒鳥事件。並以農事體驗的方式與台灣幾所大學，像是與台大生傳系、輔大的社會企業系所等等這些學校環境教育的課程，搭配農耕進行；另外，也創辦社團「小農應援團」：提供自己的工作室石頭厝作為接待農村交流實習生、生態研究人員、農忙時有意願協助農友的免費住宿空間。

「會賞鳥的不多啦！我是做環境教育，你有機會兼顧你的活動，跟你想要去發展的事情，別的地方的農友很羨慕宜蘭，一年一獲。宜蘭的地景樣貌主要是水稻田，水稻田裡的彩鵲是我的目標物，主要的棲息地。休耕加上候鳥的渡冬，因為大片水田的關係。」(C 2016/11& 2020/2)

Q是我在 2014 年參與綠黨社員入會大會的時候認識的女性，當時她還在基隆退動秀明自然農法，後來因為女兒的教育，輾轉來到宜蘭，前一章已有提及。她自己從一個從一個業餘的自然農法農夫，經歷了秀明農法協會秘書、宜蘭華德福學校午餐秘書等工作後，終於選擇在南澳進行她自己對於土地與自然的全職農夫的起點。目前經營 1.4 甲的農地，以農業兼顧土地上各種微生物與生物的照顧，作為經營方式。

「因為，這個我本來就喜歡種東西，然後當我接觸土地的時候有一種心靈很平靜的感覺，然後在我中毒之後，我覺得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根本。……在冬山田區。」(Q 2014/06 & 2018/2)」

6-3-3 照護社群的庇護農業

當我進行對返土歸農女性的訪談時候，很難想像 Jarosz (2011)、 Shisler and



Sbicca (2019)、Som Castellano (2016) 在談農業作為一種關懷倫理對於社群的照護，主因是維持生活生計的平衡都有困難了，怎麼在生活的另一個面向關心社會或是社群，因此我對於 Castellano 所談的女性第三輪班(The third shift)有所疑慮。在異性戀關係裡的第二輪班裡，女性如何再度投入公民參與？

幸好我田野中遇到的女性幫我解惑，他們之中有的是女同志、同居的伴侶關係、甚至是支持華德福教育的單親媽媽。在沒有了異性戀父權家庭關係的框架之後，對於社會弱勢團體、環境教育等的社會使命，讓他們願意投入社群的關照之中。

像是 A 就利用自己的農事場域，與一些社工團體合作。像是北投安家，住要是安置曾經遭受家暴孩子。他們與茶的月見學習農場合作，進行冒險探索和生活體驗。

「我跟AT也是用這種方式在接一些團體，前陣子有北投那邊有一個團體是安置有一些被家暴的情況，那他們機構跟這些小孩已經磨合很久啦！這次來這裡就有一起下田，這部是一個課程，是參與，他們會有很多情緒，摸土可能就會覺得很噁心啦！但主要還是看機構那邊，我們這塊也知道你們沒有辦法弄得很漂亮，會有折損，但是會開放給你，會講一些我知道的。」

(A 2014/5)

君 F 在務農之前從事社工，因此對於土地的環境教育有清楚的認知，把務農當作她社工實踐的場所。讓從事社會工作的朋友，帶著他們服務對象到田裡，體驗一些田間工作，像是抓福壽螺、補秧苗、灑田菁、採洛神花的任務。



第七章 結論：城鄉之間移動空間的串聯與分隔

第一節 疏離化的都市、親密性的鄉村：另類農食網絡中 自我關懷的重新連結

女性移居者從城市到鄉村移動當中，可以看到他們對於都市制度化、專業分工與階層制的疏離；在這個狀態下，她們前往事物不是那麼秩序化、科層化，甚至治理界線模糊的鄉村。

前面第五章第二節、第三節，提及了女性移民者與土地、自我、育兒的重新連結，第六章的第一節皆提及了在鄉村裡的生產行動、社群參與中實踐的關懷照護擴充。

7-1-1 進入「鄉村/自然」作為自我關懷的重新連結

我們在前幾章節討論到「女性移居者」離開城市的動機，包含了都市工作中的高度異化、健康修復、身為母職所需的養育與教育空間等等，這之中與自我關懷(self-care)有相當的關係。自我關懷的開始，在本研究中大多起始於「自我失控」，這是對於自己工作、生活、健康等失去控制，並且失去對生活及自我控制的過程。而離開原來的生活方式，關心自己的健康、飲食、與他人、自然、農業重新連結，並投入永續農業或社群支持性農業。這在「女性政治生態學」中，被視「關懷社群」並參與公共事務的開始。在這樣的脈絡下，關懷與照護自我(the

care of self)得以從女性的本質論分道揚鑣。透過自我照護，進而擴展至關心環境生態、照護社群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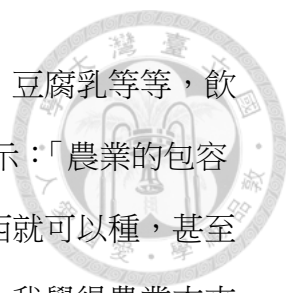


這個概念來自於傅柯(Foucault)晚期著作《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的「自我關懷」(care of the self)。他認為自我關懷是為了認識自我，而進行改善並超越自我。對於福柯來說，自我變得自主而自由，是一種生活和思考的方式，自由的自我則致力於「基進的責任」。這個責任透過實踐自我關懷，以及與他人合作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來改善自己。他認為一個人可以適當地關懷他人，因為與他人的關係和責任，是自我關懷的中心倫理。

7-1-2 鄉村是「自我關懷」中使自我與自然融合的重要媒介

鄉村空間何以成為「自我關懷」的環節？Little (2013)在水療與健身度假產業的研究中，討論現代人在「療癒性地景」(therapeutic landscapes)中修復身心與健身的行為。由於現代人，尤其是女性，身處在工作與家務等多種角色任務的空間中時常瑣事纏身；但在身處「自然」的環境中，遠離焦慮的生活空間，可以藉著乾淨的空氣與有紀律的健身計畫恢復健康。在傅柯「關懷自我」的討論中，認為「投入」關注自我需要一整套的技術才得以進行；而在女性政治生態學的關懷倫理，其中促進自我健康的過程則是這一套技術的「生存美學」。而這些行為不只是享樂主義或逃避，而應視為積極維持自我和照顧身體的策略，「自然空間」扮演了轉化與接通的作用。裡面討論到健身度假中的運動和營養進食等，這些實踐將自然賦予了關鍵角色，因此自然不僅存在於健身旅遊的空間和實踐中，而且存在於利用自然而達成關懷自我的人類身體中。

本研究中鄉村地景的稻田、雜草、鳥類、昆蟲、螺類、空氣、地下水，甚至是在地居民與鄉村社群的互動，就具有「療癒地景」的功能；宜蘭鄉村中一年四



季所生產的稻米、蔬菜、水果，甚至是季節性的加工製品鴨賞、豆腐乳等等，飲食上也甚具自我關懷的效果。像是訪談者之一的草木人 A 就表示：「農業的包容性極大！你不會覺得自己沒用，你想要賣東西就可以賣，種東西就可以種，甚至你不想跟其他人講話也可以，你就在田裡拔拔菜都可以活下去，我覺得農業本來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選擇，甚至還有人來做園藝治療……」在訪談當中，許多移居女性表示，在從事農活的過程中，透過實際的拔草、抓福壽螺、巡水田的過程中，當下的煩躁與沮喪感可以減低，甚至因為投入這個地景的生產，因而產生滿足。就如 Wylie (2005)在自我與地景實踐中所感受的：在漫長的徒步旅程中，地景不是純粹物質性，也非全然情感性的產出，而是以我們肉身的真正行動和其中感受到的物質性和情感性交織在一起的地景。這是地景對於人類具有「能動性」的原因，就如 Little (2015)在健身旅行所分析的，健身假期的「自然」非常重要，裡面的參與者不僅讚嘆與享受這個地點的風景，並其中感受到有益於身體鍛鍊的感覺。回到宜蘭鄉村，受訪者透過手部與眼力的協調，並依其生物運作的時令、日升日落進行勞動，也是一種身體上的鍛鍊。鄉村的農作、地景、自然，對於移居女性來說，則有別於都市緊張生活，帶來舒緩與穩定的效果。因此在城鄉空間上的不同利用，都市人則特別有感於鄉村地景的療癒與生產效能，是不同於「異化」勞動所帶來的耗損。

7-1-3 投入「農作物生產」是自我關懷倫理的實踐

Jarosz (2011)把女性投入社群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視為是一種自我關懷的倫理，而在本研究中，「返土歸農」的移居女性為了自己的幸福與健康，把精力投身在鄉村的農作、食物製作、維護農業地景、與他人形成社群的行動，她們在其中展演了這種自我關懷倫理的過程。例如在「接受(自然/農作物)關懷」和「給予(自然/農作物)關懷」的過程中，就有其參與及行動。



在這個過程裡，「我(移居女性)關心我的食物來自哪裡，以及食物的周遭的生產條件。我不僅只在表面上關心我吃的什麼，還以這種方式吃出食物的價值、營養細節和永續生產的理念。」這些「返土歸農」的女性，將農業融入自己的生活，透過農作技術的學習與實踐，將生產出來的產物收割食用。透過自然中的空氣、陽光、水等生物要素，得以自耕自食滋養自我。

移居女性在傳統鄉村裡，也同時扮演了有別於傳統的性別角色。在異性戀為主的傳統鄉村中，女性通常分派的固定角色任務，是扮演「關懷他人」，照顧他人身體、飲食的角色，他們通常是農夫的妻子，也非土地的繼承人。而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則較少傳統框架，就算是擔任母親，移居鄉村的決定，大多是以自己的意願或與另一半協商討論。在自我關懷的過程中，較有餘力跳脫傳統角色框架，擴散到關懷公共事務。

7-1-4「從自我關懷到社群關懷」中的另類農食網絡

「返土歸農」女性移居者在本研究中最重要特質，便是親近土地與將農業視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就算是受訪者，一開始是為了實踐「自我關懷」而進行的移居，定居後所進行的農業參與，便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傅柯「自我關懷」中很關鍵的一點，是主張這種倫理關係，是為了自由和對他人的根本責任，所進行的「自我關懷」已經擺脫了自我保護的觀念。也正好在農作的過程中，受訪者投入農業的技藝，並生產了多於自我滿足的產量，為了消耗與充分利用農獲，她們必須跨出個人或家庭，不僅投入心思關心生產的環境生態，例如：「礦業法」的通過，會影響宜蘭鄉村的水源問題；在社群之中，還需要相互幫忙在心理與實際上的支持互助，就像是農忙食的人手支援，經營直銷平台的圖像設計、加工產品機器的使用等等，自我關懷已經超出家庭的範圍，擴散至公共領域、環境照顧。



這樣的關懷倫理，在本質上並無女性與自然的關係，而是源自於這群移居女性，在經歷過有意識地追尋與思考生活的樣貌所致。性別在其中，並不與女性本質有直接的關聯，而是以社會建構為多。例如：女性在社會分工中，分配到照顧者的角色，因此在把全家飲食的來源上，有很大的決定權，也因此決定了她們與農業、農作物與環境的緊密關係。而移居者本身，因為不是生來就是農夫，也大多不是在鄉村中長大，因此她們是必須要經營各種社會資本，來得到移居後的生活技能與支援網絡，這也是從「從自我關懷」到「社群關懷」的重要原因。

7-1-5 另類農食網絡中關懷倫理的擴散與城鄉串連

都市作為移居鄉村女性的出發點，並非只是趕走無法安居都市之人。在另類農食網絡當中，都市、資本與市場是網絡中得以串連的重要因素，但是其中仍然包含了以物易物、以務換物的非經濟型態的存在。

鄉村一方面作為另類農食網絡的生產地，另一方的都市則是移居者的雇傭勞動、教育、消費者的主要來源地。使得兩地空間在資訊、人才、物流的流動上處於互相依賴的狀態。也使得女性得以從非傳統家庭的角色責任，移居鄉村。其中自組生產合作社、推動食農教育，乃至農地農用的公共政策等，皆使得網絡中的關懷倫理得以在鄉村中實驗與推動。移居者與都市的關係，連帶使鄉村或農業的價值跳脫單一糧食作物的價值，延伸出人們在異化勞動、資本主義市場之外，關懷社群、土地、生產加工組織方式的新價值。

在前面的訪談者裡，有的人是因為身體或為了下一代的健康而親自租田、鬆土、播種，希望培育出的蔬菜瓜果可以讓自己或自己的自己的子女享用，並且漸漸地關心起了在地的土壤、生物、空氣等等，願意以比較花費勞動力的方式(不撒農業化肥甚至是苦茶粕)，來維護土壤裡的生物多樣性；進

而在社會面，推動農地農用，希望地主能維護原有的農耕環境，而不是轉手買給都市人當度假別墅使用；或是不願財團開採礦產，破壞當地的水土環境等等。



許多行動是在陪伴農作物生長之後，進而關注在周遭自然環境中的鳥類、水生生物等等，從自我對於食物與營養的需求，推及到愛作物與土地。另外，也因為生產有剩餘，或是有生計需求，而展開了商業性網絡。在這樣的過程中，女性移居者隨著市場需求，不僅僅只是賣米，還更增加了高付價值的商品創新，像是針對無麩質患者的米餅、米食，或是各種加工品像是醬油、豆腐乳、米酒等等的開發與製作。

這些農業的創業，也配合著原先在都市的人脈、資訊與專業，在下面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另類農食網絡提供了資本市場或都市職場之外的潛力。I：「會覺得金錢的重要性沒有這麼高，如果你甚麼東西都要買的話，你就必須去賺很多錢來用，可是在城市我覺得經常被刺激消費，因為在城市裡沒有其他生活娛樂，就是逛街吃飯，你大部分看到的東西都要用買的，可是這裡的海邊、山上是不用付錢的。第一，宜蘭這邊的生活環境吸引城市人，第二，因為城市的工作薪水跟支出，不成比例，所以，這是一個吸引很多人返鄉的原因。我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城市的產業跟薪水已經沒那麼有吸引力了。他們就覺得不如去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I 2018/8 & 2019/2)

第二節 鄉村異性戀父權秩序鬆動的契機？移動空間帶來的性



別角力與挑戰

鄉村的外來者是逃離都市避難？還是在這個少子化、初級產業漸漸失去商品價值的當下，鄉村中和自然與文化相關的生活方式，透過相對都市生活經驗的移居者，進而重新發掘鄉村文化與自然的價值。這些移居者的初衷不管是：來到鄉村透過規律性的農作修養身心，或為孩子尋求更大的活動空間，還是在鄉村中找回一年四季的節氣與生活方式。鄉村中的農業文化以及與自然相處的方式，讓原有都市生活習慣的移居者，透過與農作勞動、與自然節氣的生長節氣互動與自我連結。以上屬於新鄉村主義中對於鄉村空間賦予新的意義，將農業從生產功能轉移為資源保育的認識面向上，將鄉村區塑造為療癒與滋養城鄉發展的重要空間。

雖然在地居民與新的移居者共享新的生活空間，但其中角力到處可見，例如土地租賃大多以口頭租約承租，由於沒有書面契約，使得承租的女農移居者難以擁有農業保險的資格，或是各種國家政策對於農業的協助。但由於移居女性對於國家政策的資訊掌握與溝通解說，使得有些土地擁有者了解政策對本身並無傷害，願與承租者訂定土地文書契約，讓承租者有機會獲得政府的補助。就以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的政府紓困方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農產業紓困振興)為例，移居女性因為不厭其煩的說明，使得地主願意成全，讓租賃行為給予法律上的有效性。

前面曾經提及，女性在異性戀鄉村的角色扮演，甚至是法律上大多是一個輔助丈夫的角色。但是當今的鄉村背景，是子女外出工作，大部分的田地留給 65 歲以上的長者守護。當這群都市移居者願實施自然友善農法與維護田地時，對於在地居民不啻是多了維護土地與農作地景的長工。並且在承租的過程中，過去鄉村承租地多以「一家之主」地男性為法律行為地行使對象，但是承租者由男性成為女性的時候，鄉村的傳統也慢慢受到改變。甚至從農機具的使用上，女性甚至成立「夢想農機」社團，向政府申請適宜女性使用的機具；在農法地傳承上，也

有年老的地主願意以系統性地栽培農法傳授給這些移居女性婦女農。這些作為，在人力不足的鄉村裡，因為下一代對農業興趣缺缺，而這群移民至此，追求自耕自食照顧家人與消費者的產業創立，反而讓農業與農作的價值，透過網路販售、招攬換工旅遊者或是教育學習者的參與過程中，這樣的農家生活的型態，經過不斷的操作、解說與傳播中，呈現其農業中文化與自然的重要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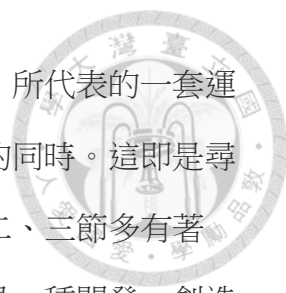
第三節 返土歸農中的女性政治生態學

許多女性移居者搬遷到鄉村的起因，是由於對於都市裡階層化的工作職位失去認同與價值、資本主義的極度商品化、都市空間的管制、健康等等因素移居鄉村，並希望建立在食物的自給自足，或是在價值相似的社群裡建立面對面或以務易務的互助關係，而移居宜蘭。希望在生活品質上能夠建立更多直接面對面的關係(而非加工、包裝、廣告、過長的生產鏈)，但要減少更多服務與食品業上的代理，必須花費更多的心力與情緒在生產、加工、烹飪，甚至是人際關係上。

在 A. Wilbur (2014); A. M. Wilbur (2012)的研究裡提到，職場的認同對女性來說，在男性主導的職場上，一直都是持續不斷的奮鬥。而女性移居者進到異性戀鄉村，理應需要與更多的鄉村傳統異性戀規範抗衡，若是從都市職場回到家庭或是家庭內，則有依照傳統性別分工的安排來劃分任務。這樣的結論，代表了研究中的女性大多扮演了「母親」的角色，既要忙於家務又須致力於務農工作的兩邊公私領域的狀態，忽略了更多不具備母親與妻子身分的女性。

本研究中的不同之處在於，移居者不一定屬於異性戀家庭組合，單身、單親、酷兒家庭的狀態在本研究中佔一半以上。這樣多元的狀態，讓他們更需要協助、分享與互動。因此，當我們檢視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中的「關懷倫理」是否偏向女性本質化的呈現。可以檢視這些移居者「返土歸農」的動機。其中以保護土地生態、維護健康、從農作、土地與自然中獲得的滿足與健康、人際互助的無私等等，並非單純以異性戀家庭做為出發，還有更多從滿足個人志趣，到貢獻社群的認同歸屬。

雖然研究中以女性為主體，但是有更多移居男性，是以照顧土地、生態為己任，不僅親手生產糧食，甚至進行加工與烹飪。以往「關懷倫理」放在對女性的「第三輪班」上指認為從照顧家庭擴散到社群關懷的同時，需考慮其出性別脈絡。在關注土地之愛、社群之愛之前，是如何跨越家庭來到公共關懷？這裡需要



透過先前提到的「自我關懷」來檢視，當他們願意離開「都市」所代表的一套運作體制，但是帶著先前的專業訓練，嘗試另一種生活風格組合的同時。這即是尋求不同資源來協助認識自我的挑戰，這個轉折在本研究第六章二、三節多有著墨，移居與務農在根本上已經不再只是家庭內的照護角色，而是一種開發、創造的過程。必須透過自我定位與認同，尋求外部協助與互助才得以達成，此過程中不僅涉及家庭，更涉及對與土地、空氣、水、農法、公共政策等各種對於與自然、文化技藝學習、協商，與國家公共政策的互動參與，才得以安居鄉村、連結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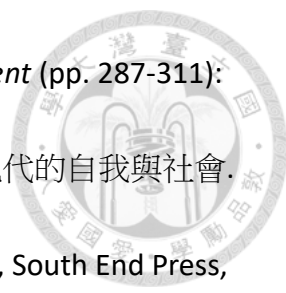
在本研究的移居女性，透過部分「自給自足」的農業生活型態，避免職場中的階層化，以及做為被動消費者的無助、建立有共同價值觀的互助社群。這種期望對於返土歸農者或已經採用這種生活方式的男性與女性都是普遍的。作為女性，在這樣的基礎下，有何特殊？

本研究中的女性並非皆為順從鄉村理的傳統異性戀規範；作為酷兒的女性，他們在此處建立了更為包容的生活社群與不落入性別角色分工的工作社群，並以農業為主要生計來源，發展出更多元的產業合作與連結外，以非傳統的分工組合建構農產業的合作社、性別友善農場；在異性戀的單身與離婚移居女性中，由於家中並無可供擔任陽剛特質的角色，一人分飾多角，既要處理土地與農務，另一邊則負責家中生計來源，可以發現她們相較於有家庭的女性，更投如在社群參與當中；此外，身兼母職的女性，在本研究中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在工作與家務勞動上，「照護倫理」對她們來說既是重要、也同時負擔過重。但在鄉居生活中，她們積極與都市資源串聯，一方面透過都市發展工作場域、一方面透過鄉村舒緩食物與健康方面的焦慮，「返土歸農」不僅增強了對於自我生活的控制力，也因為其創業與謀生產業互相連結，讓鄉村不只是安居，也創造了鄉村福祉上更多的公共價值。

參考文獻



- Adell, G. (1999). *Literature review : theories and models of the peri-urban interface : a changing conceptual landscape*. Retrieved from
- Allen, P., & Sachs, C. (1993).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agements, silenc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ransformation. *Food for the future: Condi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of sustainability*, 139-167.
- Allen, P., & Sachs, C. (2012). Women and food chains: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food. *Taking food public: Redefining foodways in a changing world*, 23-40.
- Barlett, P. F., & Conger, K. J. (2004). Three visions of masculine success on American farms. *Men and Masculinities*, 7(2), 205-227.
- Bauhardt, C. (2013). Rethinking gender and nature from a material (ist) perspective: Feminist economics, queer ecologies and resource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0(4), 361-375.
- Bock, B. (2017). 2 Gender and Mobility. *Gender and Rural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Rural Development*, 8.
- Bock, B. B. (2015).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the trivialisation of rural gender issues. *Gender, Place & Culture*, 22(5), 731-745.
- Bruce, A. B., & Castellano, R. L. S. (2016). Labor and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challenges for farmers and consumers. *Renew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1-14.
- Bruce, A. B., & Castellano, R. L. S. (2017). Labor and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challenges for farmers and consumers. *Renew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32(5), 403-416.
- Carney, J. A. (1992). Peasant wome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Gambi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3(2), 67-90.
- Corbett, M. (2007). All kinds of potential: Women and out-migration in an Atlantic Canadian coastal communi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3(4), 430-442.
- Creswell, J. W. (2013).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Sage.
- Dempsey, K. (1992). *A man's town: in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in rural Austral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 T. (2011). Memories of Mothers in the Kitchen Local Foods, History, and Women's Work.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11(110), 167-177.
- Elmhirst, R. (2015).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Gender and Development* (pp. 82-90): Routledge.
- Gibson-Graham, J. K. (2016). Building community economies: Women and the politics

- 
- of place.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ender and development* (pp. 287-311): Springer.
- Giddens, A., 趙旭東, & 方文. (2002).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 台北: 左岸文化.
- Gruen, L. (1992). Janet Biehl. Rethinking Ecofeminist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1. *Hypatia*, 7(3), 216-220.
- Halfacree, K. (1997). *Contrasting roles for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n: Cloke, P. and Little, J (eds.) *Contested Countryside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Halfacree, K. (2006). From dropping out to leading on? British counter-cultural back-to-the-land in a changing ruralit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0(3), 309-336.
- Halfacree, K. (2007a). Back-To-The-La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Making Connections With Rurality.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8, No. 1,, 3-8.
- Halfacree, K. (2007b). Back-to-the-la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aking connections with rurality.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8(1), 3-8.
- Halfacree, K. (2012). Heterolocal identities? Counter-urbanisation, second homes, and rural consumption in the era of mobiliti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8(2), 209-224.
- Halfacree, K. J. P., space, & place. (2012). Heterolocal identities? Counter-urbanisation, second homes, and rural consumption in the era of mobilities. 18(2), 209-224.
- Hambleton, R. (2008). Annie's project: An educator's thoughts. *Small farm digest*.
- Haraway, D. (1991). Animal sociology and a natural economy of the body politic: A political physiology of dominance.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Haraway, D. J. (2013). *When species meet* (Vol. 3): U of Minnesota Press.
- Haraway, D. J.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rcourt, W. (2017). Gender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linking gendered experiences of environment, community and self.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34(4), 1007-1019.
- Harcourt, W., & Bauhardt, C. (2018). Introduction: conversations on care i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In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Economics of Care* (pp. 1-15): Routledge.
- Harding, S. G.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L. (2015). Hegemonic waters and rethinking natures otherwise. *Practicing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ies: moving beyond the green economy*, ed. W. Harcourt, and IL Nelson, 157-181.
- Hassanein, N. (1999). *Changing the way America farms: Knowledge and community in*

-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movement* (Vol. 12): U of Nebraska Press.
- Hayes-Conroy, A., & Hayes-Conroy, J. (2015).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body: A visceral approach. In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log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Hayes-Conroy, A., & Hayes-Conroy, J. (2016). Bodily Well-being and the Visceral Geographies of the Rural.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Hayes-Conroy, J., & Hayes-Conroy, A. (2013). Veggies and visceralities: A political ecology of food and feeling.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6, 81-90.
- Jacobs, J. (1969).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 Jansen, K. (2000). Labour, livelihood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organic agriculture in Europe. *Biological agriculture & horticulture*, 17(3), 247-278.
- Jarosz, L. (2008). The city in the country: Growing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in Metropolitan area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4(3), 231-244.
- Jarosz, L. (2011). Nourishing women: toward a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Gender, Place & Culture*, 18(3), 307-326.
- Jochimsen, M., & Knobloch, U. (1997). Making the hidden visible: the importance of caring activities and their principles for any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 107-112.
- Johnston, J., & Baker, L. (2005). Eating outside the box: FoodShare's good food box and the challenge of scale.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2(3), 313-325.
- King, Y. (1989).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19.
- Kuiper, E., & Perkins, P. E. E. (2005). Introduction: exploring feminist ecological economics.
- Liepins, R. (1995). Women in agriculture: advocates for a gendere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The Australian Geographer*, 26(2), 118-126.
- Liepins, R. (1998). "Women of Broad Vision": Nature and Gender in the Environmental Activism of Australia's 'Women in Agriculture' Move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0(7), 1179-1196.
- Little, J. (2013). Pampering, well-being and women's bodies in the therapeutic spaces of the spa.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14(1), 41-58.
- Little, J. (2015). Nature, wellbe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self.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1(2), 121-128.
- Little, J., & Panelli, R. (2003). Gender research in rural geography.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10(3), 281-289.
- Mellor, M. (2006). Eco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



- Economics*, 1(1-2), 139-150.
- Mohanty, C. T., Russo, A., & Torres, L. (1991).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Vol. 632):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urdoch, J. (2000). Networks-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6, 407-419.
- National Statistics, T. (2018). Key Figures for Calculating Composite Gender Equality Index.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ender ey.gov.tw/gecdb/Stat_AnalysisReport_Content.aspx?s=yFNcGIMCFdG0nfsWPM7gSA%40%40
- New, C. (1996). Man bad, woman good? Essentialisms and ecofeminisms. *New Left Review*, 79-93.
- Parker, B., & Morrow, O. (2017). Urban homesteading and intensive mothering:(re) gendering care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Boston and Chicago. *Gender, Place & Culture*, 24(2), 247-259.
- Pedersen, K. B., & Kjærgård, B. (2004). Do we have room for shining eyes and cows as comrades? Gender perspectives on organic farming in Denmark. *Sociologia Ruralis*, 44(4), 373-394.
- Perkins, E. (1997). Special issue on women, ecology and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 105-185.
- Pilgeram, R., & Amos, B. (2015). Beyond “Inherit It or Marry It”: Exploring How Women Engaged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ccess Farmland. *Rural Sociology*, 80(1), 16-38.
- Rocheleau, D., Thomas-Slayter, B., & Wangari, E. (2013).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Global issues and local experience*: Routledge.
- Sachs, C., Barbercheck, M., Braiser, K., Kiernan, N. E., & Terman, A. R. (2016). *The rise of women farmers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 Sheller, M., & Urry, J. (2016). Mobilizing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Applied Mobilities*, 1(1), 10-25.
- Shisler, R. C., & Sbicca, J. (2019). Agriculture as carework: The contradictions of performing femininity in a male-dominated occupation.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32(8), 875-892.
- Som Castellano, R. L. (2016).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nd the Labor of Food Provisioning: A Third Shift? *Rural Sociology*, 81(3), 445-469.
- Sundberg, J. (2017).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 Trauger, A. (2004). ‘Because they can do the work’: Women farmer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Pennsylvania, USA. *Gender, Place & Culture*, 11(2), 289-307.
- Tsai, Y.-L. (2019). Farming odd kin in patchy Anthropoce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 60(S20), S342-S353.
- van den Berg, K. (2018). Environmental feminisms: A story of different encounters. In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Economics of Care* (pp. 55-69): Routledge.
- Walinsky, L. J., & Ladejinsky, W. (1977). Agrarian reform as unfinished business; the selected papers of Wolf Ladejinsky.
- Watts, D. C., Ilbery, B., & Maye, D. (2005). Making reconnections in agro-food geography: alternative systems of food provis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1), 22-40.
- Wember, C. (2018). Striving towards what we do not know yet: Living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in Toronto's food network 1. In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Economics of Care* (pp. 162-188): Routledge.
- WHATMORE, S. (1991). Farming Women: gender work and family labour. In: Basingstoke, Macmillan.
- Whyte, M. K. (2005).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rban Chinese family life. *The China Journal*(53), 9-33.
- Wilbur, A. (2014). Back-to-the-house? Gender, domesticity and (dis) empowerment among back-to-the-land migrants in Northern Ital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35, 1-10.
- Wilbur, A. M. (2012). *Seeding Alternatives: Back-to-the-land Migration and Alternative Agro-food Networks in Northern Italy*: University of Glasgow.
- Wylie, J. (2005). A single day's walking: narrating self and landscape on the South West Coast Path.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0(2), 234-247.
- 方怡茹. (2009). 我國農民對農地功能與價值認知研究-鄉村類型化差異比較.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學位論文*(2009 年), 1-117.
- 李承嘉, 廖麗敏, & 陳怡婷. (2009). 多功能農業體制下的農地功能與使用方案選擇. *Journal of Taiwan Land Research*, 12(2), 135-162.
- 邱元儂. (2013). 飲食革命正流行—大王菜舖子的認同實踐與文化生產.
- 金惠雯. (2018). 另類農業體系與團結經濟: 以 [部落 e 購] 為例.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 85-105.
- 孫治本. (2004). *個人化與生活風格社群*. 唐山.
- 徐于婷. (2011). 248 農學市集的實務網絡與運作模式分析.
- 梁炳琨. (2008). 農業食物在地化: 台東縣池上鄉米食產業的探討. *地理學報*, 53, 85-117.
- 黃仲杰. (2013). 臺灣在地食物網絡農夫市集的研究.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89.
- 黃紫翎. (2010). 全球化下在地食物網絡的實踐歷程: 以台中合僕農學市集為例.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葉虹靈. (2007). 異端的生存之道—台灣另類有機農業生產者的實作策略. *清華大*

學社會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151.

廖哲強, 蕭崑杉. (2010). 西方另類食物網絡文獻回顧及其地方意涵. *臺灣鄉村研究*, 127-150.

劉克智, & 董安琪. (2003). 台灣都市發展的演進—歷史的回顧與展望.

蔡晏霖. (2016). 農藝復興: 臺灣農業新浪潮. *文化研究*, 22, 2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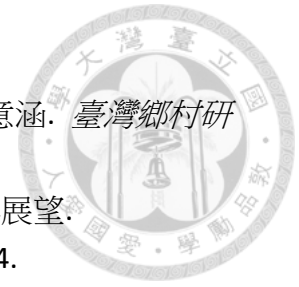
鄭鈺琳. (2007). *種出綠色生活圈: 志願務農者的生活方式選擇與農耕生活風格社群之形成*.

蕭崑杉. (2007). 聯合報漂鳥文化之旅座談會[線上資料].

賴鳳霽. (2011). 農民市集的形塑與發展: 以臺中合樸農學市集為例.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位論文*, 1-192.

謝琇玲, 侯韋光, 吳靜萍, & 施廣南. (2018). 知遇之恩, 湧泉相報? 社會支持的效應分析-中介式調節模式探討. *商管科技季刊*, 19(2), 223-255.

鍾怡婷. (2018). 永續轉型觀點下的食農教育: 以二個學童種稻體驗活動為例. *臺灣鄉村研究*(13), 35-55.





附錄一：田野筆記之一

紀錄日期 2018/1/19

訪談人：黃紫翎

受訪者：M

地點：宜蘭 M 菜園、小間書菜、郵局、市場

M是我透過小鵲接觸到的女農之一，以滾雪球的訪談方式(適用在被調查對象的條件特殊且不易搜尋情況下，僅能透過人際關係相互引介下，從一個人推薦找到下一個人，逐漸累積到足夠的調查樣本為止稱之)，這個方是對我這個有人群恐懼症的人來說比較合適，之前作研究的時候，是透過參與觀察的方式認識其他人，因此有些人杜研究來說非常適合當受訪者，但可能我個人的因素，跟他交情屬於普通，反而不好意思跟她說我有訪談的需求。

M大約是 2014 年第一次接觸來到宜蘭深溝，是透過有田有米換工，她首先接觸到農業跟鄉村是透過阿燈大哥農場打工換訴的方式。我們聊到她對於自然接觸的開始源自於她的工作。她從事於程式設計、活動網頁的維護等等工作，需要隨時修改網頁上的問題。平時在內湖的辦公大樓上班，每天早上十點到晚上七八點之後才下班，在上進去，下午摸黑出來。工作地點有恆溫的空調設施，連冬天都不會停止，一年四季都要穿保暖衣物在辦公室裡工作，這份工作經進行了五年。到了前幾年想轉換跑道，就恰好選擇了農業這一塊。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進行了與M一起除草、協助午餐(小間蔬菜隔壁)、跟小間蔬菜的狗玩躲貓貓(帶她洗澡)、M則計算小農直賣所的收入，她種的是蔬菜，今天賣的是萵苣。而社長 V 歐則製作以鯛魚為食材製作黑輪，菜刀聲漫天作響，隔壁則是在作美虹廚房的裝潢。吃飯前，在廚房裡準備的有新加坡來的



NaNa、M、V歐，另有三位男生與小間蔬菜的工作人員。

M忙完之後，由於年節將近，倆佰甲的成員最近瘋打毛線，他們則到宜蘭市打毛線，順便付一些帳單，像V歐要繳健保費，我也順便跟著他們繳錢。之後到了材料行買毛線，農友之間打毛線有很多原因，聽他們說，由於最近不是農忙期，前陣子是學習製作鴨賞，現在換成是打毛線帽子，V歐選了稻田、福壽螺顏色的毛線，鈺穎則選了稻草色的毛線。買了毛線、繳費、買一些生活用品之後，我才跟著他們回到深溝，年節將近，有一種過節日的氣氛。

紀錄日期：2018/8/1、10

地點：宜蘭、員山

內文：

8/1 在大俠市集碰到M，我剛剛好在他們對面的XX擺攤，這個市集有許多移居者(back-to-the-land)把他們平常自耕自食做的東西拿出來賣，像是把香草曬乾，做成香草茶，有很多口味，刺蔥、芳香萬壽菊等等，她幫室友賣的是法式鹹、芋園，等好吃的夏日甜點，室友是做設計的，之前也在兩百家租田，現在以自由接案為主。

8/10 我們約好到員山爬山，這個區域是比較靠山邊，田裡比較多礫石，因此在這裡租地大多免費，跟地主有口頭契約就好，這邊田有倆佰甲，也有宜蘭女農的田，我們沿著隘勇古道而上，走走停停，聊著有關她舅舅自己走這條步道的是，因為他是陽明山的解說員，所以跟M說了這裡有什麼植物，附近還有豬舍等等，跟M走著走著來到了員山地下湧泉，她有次跟朋友來玩，來著裡泡腳，附近一個阿伯，上衣脫光光，看來是附近常客，看了他們一眼，就閉上眼睛坐在水溝裡泡，一付老僧入定的樣子。



聊著話題，延續上次在市集看到的話題，我提到做鹹派現在變成你的副業了嗎？M表示，這是她新室友做的甜點啊，她每次做好都非常搶手，有人還會請她做甜點或鹹派，只是她最近很忙沒時間。

我問她：那你最近還有在直賣所賣蔬菜嗎？她說已經沒有了，在那邊賣東西，大家大部分會找小間書菜的店員，反而造成他們的困擾，她也不一定要成為社團頭頭建議的，那個負責賣菜的人啊！不是很想被指派做這個任務，「我跟 V 歐、SSH 也沒那麼親近了，主要是 V 歐很愛來跟我說誰誰誰怎麼樣，最近又有人跟他們鬧翻了，我不是很想聽。」

「每次他們要講的時候，我都說，等一下我先塞住耳朵，他們才開始講，有次在 XX 大哥那邊也是一樣，我不想聽他就勸我這是一種社會交際啊！怎麼能不聽！有時候會想到，我雖然離開了職場，但是哪個地方不是紛紛擾擾的呢？最近這幾年，我也在想要不要經營副業，顯然我真的沒有想要買賣，或許可以經營一座多樣化的菜園吧，我認識一位用樸門農業種菜的人，他的菜園裡有各式各樣的蔬果，利用高低落差的方式，種了一整片，我想我應該就要學習種一片菜園。」

「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瓶頸，因為宜蘭只有一穫，你其他時間是要去做一些兼職的，像是帶小孩、幫忙朋友農事、或是去餐廳打工、到認識朋友的餐廳打工這樣，我在想要怎麼發展自己另一個事業好？」

我問M今年年初聽你要種稻？M 表示：「對啊！我有種了，我們這裡的運作方式就是，會一起教機器代耕，社團裡有需要的人就會來登記，可是你知道有些從沒在現實出現過，這幾次，還是我們問那個 XX 大哥有需要收割嗎？他才冒

出來說好，真的是讓大家很無力ㄟ，別人真的沒有義務要為他做這件事。



附錄二：紮跟理論分析的理論編碼取樣之一



1.編碼項目：性別關係

1-1 性別關係：分工

H：所以像這種理念跟社群的推廣大部分是你在做？你老公負責的是？

K：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很多話的人，他是屬於安靜木訥的，他在田裏面，就是把田裡的植物照顧好。然後我很喜歡闡述夢想，還是有很多粗重的工作，是需要男生，像是作畦就需要男生的肌耐力，我通常弄到一半就要休息一陣子，我老公可以持續比較久。像我比較愛說話，我就喜歡闡述夢想，創造畫面，也不是每天講，就是透過自己喜歡的方式，在粉絲團上面說，或有一些比較好的邀請，一群人願意聽我說的話，我覺得蠻好的。(訪談 K 2016/10/10, 位置 42-43)

1-2 性別關係

S：那時候稻子還沒收割，COCO 就回台北了，甚麼都要種，給她五分地，但她要兩甲地，回來就罵我，為什麼不給她田，她有時候做麵包啊！各種東西都做，她如果停下來，在這邊應該很能發揮，可能在這邊老公有很大的意見，在這邊她很活躍，這樣會跟男生走比較近，老公就受不了，像是她晚上跟男生喝酒，像是代耕業者，混交情，這也是女性在這邊的一種狀態，(訪談 S 2018/11, 位置 14)

1-3 性別關係：女性優勢

這邊都是男生，像 WXX 啊！對代耕業者撒嬌。我們就是輸，只好自己去開機器，她款待他們啊！代耕的大哥們就很喜歡跟妹妹們聊天，我們的田就隨便呼嚨過去，她的田就搞好久！(訪談 S 2018/11, 位置 16)

1-4 性別關係：

新農友半農的問題，他們的問題，就是農村是一個傳統父權結構非常強烈的地方，那他們帶著強烈的意識形態進來，這裡面當然有女性運動的部分，她們是來蹲點的，把這邊當作反攻復活的基地，ZXX 就是在這邊取得一個女農的身分，她在學術圈就可以代表一個典範，講這什麼！

(訪談 S 2018/11, 位置 40)

1-5 性別關係：空間的性別區隔

我：那妳在宜蘭種田時看到的女性，會比男性的勞動力少嗎？M：阿母級的，會出現在田裡的都是那種小小的菜園，或是，水田的話，基本上是看到男生，很少看到女生，如果是大型耕作基本上都是男性，巡水田的話，也是男性，阿姨的話，比較是幫忙趕鳥啊！然後家裡旁邊的菜園啊！(訪談 M，位置 77)

1-6 性別關係

農業上的性別分工其實是非常明顯的，因為農業上需要勞動力，像是在水稻田裡，大部分是男性，很少女性，可能只有新農才會出現女性，因為像是育苗、扛脫穀的稻穀都需要力量，我剛開始務農的時候常常硬撐，結果搞到腰閃到，其實非常得不償失。像我們搬重物，最蹲下去搬，力量要擺在大腿，這樣才不容易受傷。(訪談 H 2017，位置 22)

1-7 性別關係：性別分工

雖然他認為這裡評比很好的有幾個是女生，這裡一直持續有女農在這邊出現，前面有很多女性農夫被看到可以做到甚麼程度，農業本來就是綜合能力的，T 需要多方

面努力，像村子裡莎草的是阿母組成的利害女農軍團，像我理解到打田機器很帥的。雖然是男人的是，但鄭個農業的過程中，除草、包裝、巡田水，這些關鍵的事是女生，村子裡開著貨車的也是阿母，我自己會覺得，沒有太大的差別，但也很能是我已經占到好處，那同時，已婚婦女也是個優勢吧，我站出來，旁邊有一個被認可信任的男人，所以他們或許不覺得我可以，而是覺得我老公可以。

訪談者：那妳老公就變成了一個擔保了？（訪談 2016 C, 位置 134-135）

2.編碼項目：鄉村/自然的包容力

2-1 鄉村/自然的包容力：育兒

原來兒子 YU 從 2 歲起就有情緒障礙和語言障礙的問題，表達困難時就會動手或咬人，專注力也不佳。帶去看兒童心智科，醫生也說不出個診斷，只有開藥。但服藥後的 YU 變得呆呆的，食欲變差、反應變慢，「好像沒什麼事情對他是重要的。」但後來搬到這裡，反而如魚得水。會有這麼大的搬家動力，是孩子的問題更讓我們迫切覺得需要換個環境。（臉書記錄，位置 12-14）

2-2 鄉村/自然的包容力：情感

跟以前的經驗完全不同，比如像以前的醫療訓練，它是很規律。比如像是治療計畫，這是很規律的，工作時間也是，在宜蘭學這些東西開始對環境、自然有不一樣的感覺，再來是真正自己種東西之後，因為是跟一群人一起耕作嘛！

（訪談 I 2018/8 & 2019/2，位置 2：61）

2-3 鄉村/自然的包容力：支持

那時候就是想要換一個環境、工作，一開始是這樣。對我個人而言，一方面是工作型態換了，二方面，工作步調比較慢，讓我比較放心，還有這邊遇到的，會覺得人生不再是以一般傳統社會價值覺得你要有收入，去評價這些東西，那時一開始在兩百甲，因為人很少，所以我們蠻親近的，可以認識不同行業的，不同行業的人，因為專業訓練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不同，還有每個人興趣不一樣，可以有很多交流跟



收穫。(訪談I 2018/8 & 2019/2，位置3：402)

2-4 鄉村/自然的包容力

這個我本來就喜歡種東西，然後當我接觸土地的時候有一種心靈很平靜的感覺，然後在我中毒之後，我覺得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我覺得，體會到沒有食物一定會死，沒有錢不一定會死，所以我認為食物才是人類真正需要的，（訪談 Q 2014/6, 位置 18)

2-5 鄉村/自然的包容力

H：你覺得農業的包容性很大？

A：農業可以療癒，農業的包容性極大！你不會覺得自己沒用你想要賣東西就可以賣，種東西就可以種，甚至你不想跟其他人講話也可以，你就在那邊拔拔菜都可以活，我覺得農業本來就，我不喜歡就是有人在裡面獲得高額利潤，我說農業本來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選擇，甚至還有人來做園藝治療，甚至是可以療愈的，可以生存又可以....所以本來農業就是不是專斷的技術或產業。這是福岡正信(一根稻草的革命家)說的，每個人都應該要有自己的田啊！我也贊成，非常贊成！（訪談：A 2014/5, 位置 62-66)

2-6 鄉村/自然的包容力：療癒

我覺得這個環境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它讓我的，它讓我認知到問題可能不會解決，但是情緒可能被解決，很多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但是在那個當下，妳可以讓情緒過去。我覺得在農業這個環境，像我之前情緒不好的時候，大概就撿個福壽螺，我的心情就好多了，到大自然走一圈，情緒就可以被解決了，到這個環境已是繼續幫助我撐下去，（訪談 J 2017/5 & 2018/8, 位置 88)

2-7 鄉村/自然的包容力：作物生命力

事隔幾天，我又看到一小區稻叢，歪斜地躺在狗腳印旁，這次我沒有立刻下田扶正，而是站在田邊想著，不扶正是否會影響稻子生長，我告訴自己，暫時別急著扶持稻株，觀察幾天看看其生長狀況。回家的路上，我想到A曾經說過，她的稻叢也被野狗踩踏過，稻株們數日後，仍然自行修復挺直。我問自己，願意相信作物們，是充

滿生命力的存在嗎？我沒有答案。接連下來幾天，巡水的時候我會特別蹲在，被踩踏的稻子身邊祝福他們。幾個星期過去，折損的稻葉，迎著陽光逐漸挺直生長，雖然依舊能看出受損的痕跡，可卻無法掩蓋稻株的生命力。原來，只要我願意，作物自然會教導我信念的重要性。

(訪談 F 2017, 位置 205)